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爵士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陳方案生議員，C.B.E., J.P.

財政司麥高樂爵士議員，K.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海泉議員，O.B.E., J.P.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O.B.E., 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曹紹偉議員

李卓人議員

缺席者：

劉皇發議員，O.B.E., J.P.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O.B.E., J.P.

潘國濂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立法局秘書處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1995 年撥款條例草案

恢復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提出二讀的辯論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告恢復，並繼續辯論 1995 年撥款條例草案。有沒有議員想發言？

司徒華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人生是一個學習的長途——活到老，學到老。幼兒教育，是這個長途的起點。良好的開端，就是一半的成功。第一印象，是永遠難以磨滅的烙印。在潔白的畫紙上畫出的第一筆，是最重要的一筆。由此可見幼兒教育的意義。

在一九七三年文憑教師事件當中，當時尚在籌備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和其他 12 個教育團體提出了改革教育的 4 項要求。其中一項就是改善私校教師（包括幼稚園教師）的待遇。從那個時候開始，22 年來，教協一直為爭取資助幼兒教育、改善幼兒教育工作者的待遇、提高幼兒教育質素而奮鬥。教協每年一度的會員代表大會，幾乎每一次都通過有關的決議。經過長期的努力，在九五至九六年度的預算案中，政府終於預留款項 8,000 萬元，促使「教師的薪酬必須足以吸引他們提高本身的資歷」，「更直接為幼稚園提供協助，以便幼稚園能聘請曾受訓練的教師」。

8,000 萬元，在整個預算案和教育撥款中，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與專上教育和中小學教育的撥款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不過，這仍然值得歡迎，因為這是一個轉變，是政府在政策上一個轉變的開始。

雖然很久以來，香港已經幾乎沒有一個未接受過幼兒教育而直接進入小學的兒童，但政府仍然以幼兒教育不是必需為借口，拒絕資助；更加以不能協助私營機構去賺錢，而對承擔了社會重大服務的幼稚園，加以誣衊。8,000 萬元雖然是微不足道，但我希望這是政府對過去錯誤政策的默認，是一個新政策的開始，從此繼續把資助幼兒教育的政策發展下去。

據透露，教育統籌司和衛生福利司正在擬訂方案，將於下月初提交行政局，然後作出決定。我希望在這次辯論中，政府能夠好好聽取各位議員關於這方面的意見，納入方案之內。

對正在擬訂的方案，我的意見如下：

- （一） 整個方案的最重要關鍵，在於改善幼兒教育工作者的待遇，使他們的薪酬得到有實效的顯著改善。

- (二) 方案不但要關注已經接受訓練的教師，還要兼顧到正在接受訓練以及尚未接受訓練的教師。這樣才可以全面遏止教師流失，吸引優秀人才加入這個行業，並長期留在這個行業工作。
- (三) 幼兒教育工作者至今仍未有職前訓練，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希望方案必須為解決這個問題創造條件。
- (四) 必須盡早公布方案，並在本年九月開始實施，使幼稚園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和適應，調整收費，續聘和聘用教師。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倪少傑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麥高樂先生在任內發表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我會將之比喻為一套「三件頭」西裝，「協調共識創繁榮」是外衣，配上首創「共識資本主義」的新款西褲，內裏再襯以《荀子》〈富國篇〉的背心，外表看來真是非常漂亮，但只要我們細心一看，即使包裝手法如何巧妙，華麗外衣始終掩蓋不了預算案平平無奇的一般內容。財政司不單未能為本港社會及經濟的長遠發展制訂明確目標，反而埋下重重隱憂。

麥高樂先生在預算案中多次為他所創出的「共識資本主義」而感到沾沾自喜，自豪地表示這是香港能夠締造今日繁榮成就的方程式。如果港府真是以全港市民的共識作為施政及理財基礎，着實值得我們稱讚，也難怪麥高樂先生引以為傲。但真正的「共識」，應該是社會各界人士透過交流意見，相互磋商，進而求同存異，最終目標是以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為重。可是，財政司心目中的「共識」，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捨正道而弗由，只是耍出公關技倆，作為他將財政預算案政治化的開脫藉口。

首先，財政司在預算案一開始便侃侃而談其「共識資本主義」的優點，強調必須鼓勵自由進取及競爭，同時促進公平及扶助需要者，並且透過在制訂財政預算案過程中徵詢議員意見來尋求共識。如果財政司能夠在不損害行政主導的大前提下，在預算案中真正照顧到各方面的需要，確是一件大好事。但遺憾的是，現在預算案的本質已出現根本變化，不是按照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勾劃出政府在來年度的收支藍圖，反而淪為一種政府藉派發福利來討好政黨的工具，變成一個政治性濃厚的理財方案。

主席先生，我必須指出，香港所需要的是一套穩健、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公共財政政策，絕非一套為了安撫政黨的不同需要、支離破碎的、政治化的混合體。作為財政掌舵者的財政司，首要任務是如何最有效地掌握社會資源分配，然後加以適當運用，為社會帶來最大效益。

我相信香港人對財政預算案的共同願望是政府要量入為出，善用公帑，財政司在預算案中亦認同這觀點。只不過，翻開預算案的開支部分，我們看到的卻不一樣。九五至九六年度公共開支總額達到 2,030 億元，較本年度激增 19% 之多。即使扣除通脹後仍實質增加了 9.3%，遠遠超逾本地生產總值 5.5% 的預測增長。面對社會人士的批評下，政府辯稱公共開支在一段時間內仍在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的範圍內，但一向自稱謹慎的財政司應該明白，公共開支在短期內膨脹，經年累積起來，便會成為長期的惡劣後果，可能令政府開支居高不下。到將來政府發現此危機的嚴重性時，在開支易加難減的壓力下，恐怕為時已晚。

政府開支的不斷膨脹，更可能帶來一個經濟虛浮上升的繁榮假象。財政司在預算案中多次強調有信心香港經濟會持續增長，聲稱預料每年增幅達 5% 已是保守估計。作為一個香港市民，當然很高興見到這個預測能夠成為事實，但如果本港的經濟增長，只是由於政府不斷增加公共開支所吹起的泡泡，這種經濟繁榮是不健康和沒有根基的。為我們社會帶來只是短暫的歡欣，接着卻是長期的重重憂慮，這並非理財之道，亦非港人之福。

主席先生，香港真正需要的繁榮安定，應該是建基於經濟的均衡發展上。香港市民心目中的經濟共識，是希望各行各業均能夠蓬勃發展，使社會上具有各種專長的人士充分就業，大家各展所長，為社會創造財富。只可惜，財政司並沒有照顧到港人真正的經濟共識，沒有提出任何令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的具體策略。

說到本港的經濟轉型問題，本港的經濟體系由過往倚重工業逐步過渡到以服務業為主。但不要忘记的是，現時製造業仍直接養活了 45 萬名工人，這不是一小數目。只要本港的工業能夠穩步發展，逐漸推向高科技的高增值路向，這群工人的就業便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生活質素亦得以進一步改善。長遠而言，工業向這方面轉型發展，才可以令本港的經濟根基更加穩固。

令人遺憾的是，預算案中對工業的扶助只是聊備一格。新財政年度將動用 5,000 萬元設立應用研究和推行研究撥款計劃，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我希望這是政府致力提高本地工業競爭力的第一步。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擺脫以往認為扶助工業發展，等同干預自由市場運作的錯誤思想，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使本地工業科技能夠與時代並進。然而，觀乎財政司在今年預算案中，只用了一段短短文字概述政府在支援科技發展的角色，對比起他對財經行業及服務行業的繪形繪聲的描述，真教人懷疑政府是不是已放棄了扶助工業發展的決心！

主席先生，對於維多利亞港的填海工程，我的同事已經有所論述，不過我亦想趁這個機會發表一點意見。開闢土地配合社會發展是對的，只是財政司一方面說中區填海計劃是為了提供更多土地，配合住宅和商業樓宇的需要，以紓緩樓價壓力，但接着他又告訴我們，填海所得的 1109 公頃土地，實際用作商業住宅發展的只有 27%，其餘 72% 是撥作休憩用途，這真是前言不對後語。我們這一輩的老香港都知道，維港這個天賦的優良

深水港口，是本港經濟發展的發源地。我們憑此一躍成為舉世羨慕的經濟大都會，擔負起中國大門的重任。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加上一個天然良港，是我們子孫世代的寶貴資產。如果政府罔顧填海計劃所可能帶來的各類負面影響，只是為了在中區取得 72% 的土地作為休憩用地而將大好美麗而又充滿經濟活力的良港毀於一旦，在我看來，這樣才真正是短視和愚不可及。

總括來說，本港能夠有今日的繁榮成就，有賴過去很多持之有效的因素，包括政治和法制的穩定、社會和諧，加上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香港要繼續吸引海外投資者，我們必須首先鞏固各種既有的優勢，在此基礎上再加強我們的競爭力，未來持續繁榮才有保證。

最後，在政治上，港人現時的最大希望，我想恐怕是盼望中英雙方能夠在過渡九七的問題上共同合作，這對維持本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有莫大裨益。我期望港府就任何有關跨越九七的重大事情，包括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的制訂工作，與中方真誠地磋商，而非事事單方面先決定然後通知對方，這才算得上是真正有誠意的合作。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撥款條例草案。

陳偉業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在他任內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了「共識資本主義」這個有趣的名詞。這詞在內容上比以往的「積極不干預主義」更為空洞，它反映出九十年代政府在管理香港經濟和政府財政方面的思想和政策，實質上，並未比七、八十年代有任何明顯的改進和革新，因此，他現時只能用一個空泛的口號加以概括。

從財政司的預算案發言來看，他似乎想利用「共識資本主義」這一詞去反映他任內所貫徹的原則和他在變動的政治環境中保存「傳統共識」這項成就。他所指的原則，是所謂「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奉行競爭，以及利用本港日趨繁榮的成果，提供種種的社會服務」。有關這一點，恕本人對財政司的說法不能苟同。

在管理經濟方面而言，我們當然不能忽視香港政府這幾年在改革金融制度和監察金融機構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政府對支援在經濟轉型下深受困擾的小資本家和工人這一事上，則沒有任何正面的工作表現。相反，政府不斷擴大輸入勞工，提供廉價勞力，保障大資本家的利潤，剝奪了一群正處於壯年而又具備純熟技能的勞工的就業機會。惡劣的勞工市場狀況，造就了年齡和性別歧視。30 歲以上的女性勞工不能找到合適工作，已經成為了香港社會現時的哀歌。同樣地，在發展基礎建設方面，很多升斗市民因得不到保障而被犧牲，最典型的就是以養魚、捕魚為生的漁民，他們因公共工程或工程所帶來的污染，備受經濟損失，甚至有部分漁民更要放棄本身的行業，但所得到的補償卻是極之微薄。受到

類似影響的，還有那些被收回租用農地的年老農戶。概括而言，港府管理經濟的工作，不但並不如財政司所說，能令「人人可憑自己的本領力爭上游」，相反，他令部分基層市民的進取力量受到很大打擊。

至於社會責任方面，我不明白財政司怎能在否決廣大市民要求將綜合援助金額提高至 2,300 元的同時，宣稱政府所提供的社會服務，能「確保面對困境的人受到保障」。如果財政司稍為留意傳媒的報導，相信他無理由不知道領取綜合援助金人士所面對的困境，除非財政司已經被數以千億計的財政儲備蒙蔽了，失去了觀察民情的能力。如果是這樣的話，財政司的演辭結尾引用的話應該是：「足國之道，裕國中富人，而無視民困」。事實上，財政司所看不到的民困還有很多，包括二十多萬居於簡陋寮屋、四千多居於籠屋，以及數以十萬計擠迫在舊區房屋內的市民。看見這些困苦的人，還有哪一位官員有理由沾沾自喜呢？

關於財政司所說的「傳統共識」，本人也有不同意見。在制訂財政預算案的過程中諮詢立法局的意見，是財政司任內的一項進步表現，但並不代表立法局議員支持麥高樂先生所說，在經濟政策及決定工作先後次序方面的「傳統共識」。在工作先後次序方面，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民主黨早在 3 年前已向財政司要求政府在斜坡勘察和維修的工作方面增加人手及資源，但政府一再拖延，直至發生如觀龍樓般的慘劇後，政府才在九五至九六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增加這方面的資源。難道這方面的分歧可以說是共識嗎？另一方面，立法局內很多議員也顯然對如何管理本港的公共財政有不同意見。難道財政司忘記了稅制改革和調低差餉徵收率這方面的要求嗎？

總括來說，本人對「共識資本主義」一詞的回應，認為它最多只能表達殖民地官員對「積極不干預」時代的戀慕和對本港現存各種背離人民權益的社會現象的漠視。這一個名詞可以成為香港政府將在香港當道的官商勾結模式合理化的工具。

關於本人向來關注的工務工程。我期望斜坡問題的例子能促使政府官員日後在建設撥款方面有更前眼光，不要等到發生悲劇時才作出回應。在具體的工程項目方面，政府至今仍然對青山公路的全面擴闊工程未能作出承擔，我對這感到失望，因為這問題將會繼續加劇新界的塞車情況。

另須一提的是有關機場和機場鐵路的工程。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已差不多批准了所有對臨時機場管理局和地下鐵路公司的注資，但是對這兩個機構的監察問題，仍然令人感到憂慮。政府必須確保兩個機構切實執行員工本地化的政策，並確保有關員工所得到的薪酬待遇與職責相稱，亦要善用資源。由於政府至今仍遲遲未能將機場管理局條例呈交立法局，負責機場工程 and 管理的機構至今仍不受立法局監察的情況，我相信仍然要拖延一段很長的日子。

主席先生，此外，我想談談有關廣播政策的問題。廣播事務是本人今日評論的另一個重要政策範圍。縱觀過去 4 年，文康廣播科在廣播事務方面的支出，一直遏抑在約 1,200 萬元的水平。回顧廣播事務的開支，可以給公眾一點啓示：九五至九六年度，用於廣播事務的開支只有 1,270 萬元，比九四至九五年度下跌了 10.6%。如果與九二至九三年度 1,230 萬元比較，今年預算只比九二至九三年度增加了 40 萬元！

這種開支狀況，明顯反映出兩個問題。首先，用於廣播事務的開支沒有固定的增長。其次，中央政府對廣播事業並不重視，每年的撥款並不足夠。

如果本港的廣播環境仍然是九零年以前的局面，我相信現時所撥的平均 1,200 萬元的開支，或者可能足夠。但試想想，經營衛星電視的財團、有意參與有線電視市場的投資者，以及致力發展多媒體服務的機構，正急於發展本港及亞太區的市場，本港的廣播事業正處於一個變革的階段，要適應這個新環境，政府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如果政府在規劃廣播環境、研究市場動向、改善現行廣播法規、培訓廣播專業人員方面投下更多資源，廣播事業將可以成爲香港重要工業之一。

可惜，現實的情況是，文康廣播科在多項工作上的表現未如理想。在去年的預算案中，文康廣播科已表示研究收費電視的開放問題，又表示會草擬一項綜合的廣播法例。結果今年的預算又舊調重彈。多項工作的延誤，令人質疑文康廣播科用於廣播方面的開支，究竟有何成果！

同樣令人失望的是，政府這次亦沒有在廣播開支方面撥款設立「公營頻道」或「公眾頻道」。如何利用九倉有線電視 3 條免費頻道的訴求，已於九三年年初提出，但迄今文康廣播科絲毫沒有承擔這事的決心。至於香港電台的開支增長，今年則只有 4.7%，增幅連通脹亦跟不上，更遑論改善和發展港台的服務。

令人憂慮的是，在文康廣播科缺乏廣播專業和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再加上蘇耀祖先生提早退休，令公眾擔憂文康廣播科日後的工作方向以及繼任文康廣播司的人選。本人希望，財政司、文康廣播科及其他負責官員，能具有更大魄力和前瞻的眼光，投入充足的資源，致力籌劃未來的廣播政策。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夏佳理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過去四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每次都提到兩個主題：其一是維持充足的儲備，其二是遏抑通脹。但是，何謂「充足」或「龐大」的儲備？大家曾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可是，直到目前，無論是財政司或庫務司都未能就此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也許，麥高樂爵士不願作出明確的答覆，是不想代他的繼任人作出承諾。無論是基於甚麼原因，財政司在四年前首次發表財政預算案演辭時預測，到了一九九七年三月底，香港將會有 716 億元

的儲備。按當時麥高樂爵士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個合理的餘量，應付未來五年的突發事件所需」。四年後，麥高樂爵士預測，到了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的儲備將高達 1512.6 億元，較四年前的預測高出兩倍以上。財政司以「鉅」字和令人「極為安心的緩衝」這句話來形容這 1512.6 億元的儲備，實在非常貼切。連同土地基金，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有為數達 3600 億元的儲備。即使沒有土地基金，這 1520 億元的儲備肯定是足夠有餘的了。因此，政府理應實行其一貫的主張，即是把納稅人所賺的錢留在納稅人的口袋裏，原因是政府只應徵收應付其開支所需的稅項。

基於以上背景，自由黨對於政府仍然未能接受其建議，把薪俸稅和利得稅分別由 15% 減至 14% 以及由 16.5% 減至 15.5% 感到失望，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估計，倘若自由黨的建議獲得接納，根據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預算計算，這會令政府減收稅款大約 35 億元。不過，在假定收入方面會有所減少之前，讓我們回顧去年利得稅減少了 1% 所帶來的結果。減少利得稅的做法是正確的。雖然利得稅是減少了 1%，但是政府去年從利得稅所得的收入實際上卻增加了近 80 億元。再者，香港已逐漸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以百物騰貴見稱的城市，因此，減低薪俸稅與利得稅在某程度上能夠令香港吸引到一些國際和本地投資者。

自由黨感到失望的第二方面，是我們建議設立一項最多達 2 萬元的房屋免稅額，以減輕須分期付款供樓或交租人士的負擔，但政府卻不予理會。財政司表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要維持簡單的稅制。但是，既然可以新增一項弱能人士免稅額，那麼財政司就不能以要維持簡單稅制為理由，拒絕增設房屋免稅額。

遏抑通脹是財政司談及的另一個主題。但是，過去四年，通脹持續高企，只會一度下降 1%，即從 9.5% 降至 8.5%。導致通脹高企的成因仍然一樣。港元與美元掛鈎，使我們受美元弱勢拖累。如果政府真的要堅持港元與美元掛鈎，那麼唯一的出路便在於處理緊張的勞工市場。勞工市場緊張必然會令薪金上升，因而引致通脹加劇，通脹加劇又導致出現加薪的要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政府有需要制訂一項公平、合理而又切合實際的政策，確保勞工市場的需求得到滿足，同時又能保障本地工人的利益。自由黨從來都沒有主張毫不考慮、不加限制地輸入勞工。我們的一貫立場是要紓緩在勞工不足的行業出現的樽頸情況。

至於我所屬功能組別內的選民所關注的，是由土地供應及物業價格專責小組建議在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引進的一些措施原本擬為短期措施。自從實行這些措施以來，物業價格已下跌了 14% 或以上，這點已有很多人談過了。我亦在多個場合說過，這些措施實在太過苛刻，同時也實行得太遲。我們不可忽視在私人物業市場之中有 85 萬名業主，這些業主透過購買私人物業的單位，表現出他們對香港的信心，我們不可以打擊他們的信心。因此，我歡迎政府的立場，認為應該由市場力量來自行調節。事實上，如果政府能夠取消這些短期措施，便會有利調節。例如是讓銀行自行決定按揭成數；另外，政府亦可解除有關預售樓宇、預售樓宇的時限、在業權轉讓前轉售樓宇等的限制。主席先生，短期措施，顧名思義，應該是短期的。

財政司在其演辭中特別強調，這份財政預算案會就總督在施政報告內宣布的目標提供所需資源。不過，政府會否爲了急於達成總督所承諾的政策目標，而在未肯定是否可行的情況下倉猝提出建議？在過去一年，大家都十分關注工作安全的問題。雖然我完全同意工人的安全極爲重要，但是只加重作爲僱主的承建商的責任，而沒有預期讓僱員參與其事，並非上策。政府加重了僱主的責任，例如要求僱主提供安全裝備、聘用更多安全主任等，但卻沒有同時理會僱員在保障其本身安全方面應有的角色。工作安全是雙方面的，政府越早確保僱員的參與，便越能確保工作安全。

主席先生，我想提出我認爲預算案較富娛樂性的一面。我相信日後提到麥高樂爵士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時，大家都會記得這份預算案似乎是鼓勵納稅人飲用劣酒，因爲財政司沒有調低佳釀的稅項。他這樣做，大概是爲香港引入有關呼氣檢查酒精測驗的法例鋪路。另一方面，財政司可能認爲納稅人如果多喝了酒便可能會有多幾名子女，從而可以因第三至第九名子女的額外免稅額受惠。

主席先生，最後，我要與各位同事一同祝福麥高樂爵士榮休之後生活愉快，並祝福麥高樂爵士夫人事事如意。我要向麥高樂爵士指出，其實大家都非常感激麥爵士多年來對香港作出的巨大貢獻，縱使有時候我們給他的印象可能並非如此；不過麥爵士的貢獻，實在不僅限於其擔任財政司一職。我們尤其記得財政司透過諮詢本局，開放了政府制訂財政預算案的過程的這項功勞。我們渴望與麥爵士的繼任人曾蔭權先生合作，我們深信曾先生會繼承這項由麥爵士始創的諮詢過程。

謝謝，主席先生。

梁智鴻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謹代表醫學界功能組別恭賀財政司提出一個全面、務實兼平衡的財政預算案，尤其是他能在財政預測外維持穩健的儲備水平。

在過去兩天內，我們聽過各政黨及議員就財政預算案的評論及意見。當然，其中不少意見值得欣賞，並且值得當局認真予以考慮。

我擬集中討論健康護理撥款的問題。我希望政府再作保證，研究健康護理撥款的政策，我不會要求政府在這方面動用更多金錢，因爲我肯定很多同事會提出此項要求。我希望政府的政策可在未來 10 年也是適用的。我促請政府擬備一套計劃，壓抑以指數速率增長的健康護理成本，藉此不容政府逃避其對健康護理的責任，這須視爲不可或缺的福利服務，亦沒有市民不需要該項服務。我呼籲政府繼續承擔健康護理方面的責任，同時，仍須提供各種方式及方法，有效地壓抑不斷上漲的醫療成本。

我冒昧提議政府應立刻從三方面積極行事。

首先，訂立「健康指標」，旨在減低某些常見疾病的發病率，或可透過健康教育並加強基層健康護理予以預防。

其次，找尋額外來源，為公眾衛生服務提供大量經費。

因此，我再次呼籲設立一項全港強制性供款的健康護理保險計劃。經過一段時間後，此項計劃會大大增加公眾健康護理的經費。此項計劃會確保設有一個跨年代的經費匯集制度，在該制度下，今天的年青人會供款照顧今天的老人，而當他們年紀老邁時，他們需轉而受到年青人的照顧。我一直提議將此項計劃附加於一項中央公積金。雖然此事現為夢想，但沒有理由不能將此項有關經費的健康護理保險計劃，附加於政府準備實施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其三，政府應確保醫院管理局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我相信當局會表示，醫院管理局是一個獨立機構，透過資源分配，業務計劃及機構計劃，受到政府適當監察，而市民亦透過參與醫院管理局大會、區域諮詢委員會及各醫院的醫院管治委員會，公開參與審察醫院管理局的運作。

然而，近期兩項問題引起了關注。有人質疑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是否需要僱用這麼多職員。醫院管理局只得舉行公開會議，使市民不但得悉有關人手的需要，亦可實際看見該等職員如何執行職務。

其次，由於公營醫院的環境及服務態度有所改善，越來越多病人到該等醫院求診。當然，此點顯示醫院管理局的成功程度。不過，倘公營機構的健康護理資源的需求持續上升，從而取代了可運用在私營機構的資源，這樣是否最符合成本效益？醫院管理局須提出促進私營機構與公營機構之間合作的方案，才可避免成為本身成就的犧牲品，私營機構的醫療資源亦可開發。

基層健康護理

主席先生，可惜，財政預算案中給予基層健康護理的撥款，難以令人增加對政府致力作改善的誠意的信心，更不用說政府致力改革基層健康護理的誠意。鑑於衛生署的財政預算只見些微增幅，我要求有關部門完成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所載的建議；我亦要求有關方面有效執行總督施政報告內就健康服務所作的承諾。

我們須清楚一點，倘要有效對付糖尿病及心臟病等疾病，並非單靠設立四間糖尿病診療所及作出特別撥款每年只額外治療 200 名心臟病病人即可。此事須詳細訂立「健康指標」及目標。此項工作必須進行廣泛及全面規劃，以確保今天健康年青的一代可接受全港性及持續的健康教育，令他們日後不會患上該等惡疾，該等惡疾佔了衛生方面財政預算的一大部分。事實上，當局將 8,000 萬元撥入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不過，即使展開一項長久健康指標的持續計劃，此筆款項也不敷應用，更不用說維持此項計劃。

主席先生，當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獲總督會同行政局通過後，衛生署迅速回應有關要求，並提供地區健康服務。此舉令人感到自豪及興奮，足以成為聯繫公營機構、私營機構及各社區機構，令人人保持健康的典範，而該例子亦應擴展至全港。自此，整個概念卻不幸被遺忘，在設立該項服務的最初迴響後，似乎整個概念已湮沒無聞。政府在這方面須向本局及市民作出充分解釋。

牙科護理

雖然政府明顯的不聽從民意，再三拒絕向市民提供牙科治療服務，但總督已承諾至少為有特別需要的某些人士提供服務，然而此事的進展如何？當局曾作過不少改善老人護理服務的承諾，但政府會否預留款項以解決老人的口腔問題？

統計資料顯示，在年齡尺度的另一端，兒童在學前時期得到適當的牙科護理，對日後擁有健康的牙齒很有幫助。一項學前牙科計劃已經設立，由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提供經費。此項計劃已取得可觀的成績。鑑於三年的經費資助快將完結，我敦促政府繼續設辦此項重要計劃，並立刻尋求必要的財政撥款。

職業健康

主席先生，工作人口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保持工人的健康，使他們遠離職業上的危險，不致因工業意外而受傷，是很明智的。雖然本地工作人口正在增長，但是職業健康科的規模正相對縮少。直至現時為止，當局只設立了一間職業健康診所，而當局已確定不會設立更多職業健康診所。這樣看來，我們已到達一個死胡同的盡頭。

至今，沒有跡象顯示政府有誠意擬定規則，要求員工數目達到某一水平的工廠及工業必須聘請工業安全主任或職業健康專家。這一切均顯示政府在改善職業健康及防止工業危險方面故意拖延。

「醫院」界與「衛生」界互相協調

主席先生，昨天我的同事兼同窗林鉅成議員細談衛生署與醫院管理局之間的合作或缺乏合作問題。他列舉例子，指出如非競爭提供服務，便會出現工作重疊的情況。林議員亦提出有需要成立一個特級管理局，以協調醫院及衛生服務的運作。

當局須確保「衛生」界與「醫院」界之間達致更佳的協調情況，以及有關方面須負責此事，我支持林議員在這兩方面的要求。各位議員猶記起臨時醫院管理局所依照成立的斯科特報告書，以及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確實提議可能有需要成立一個特級衛生管理局，將醫院及衛生服務聯合起來。現在可能是適當時候研究此項提議。最終，透過在衛生福利科下設立新的管理局或經改革的衛生福利科，又或甚至將現時決策科的職務一分為二，成立衛生科，達致更佳的協調情況。主席先生，我提出此事，並非不尊重有關司級官員，亦非懷疑其職員及決策科的工作成效。不過，衛生福利的政策範圍已經擴大，達到可能需要不只由某一個決策科處理的地步。

跨越一九九七年的健康護理策略

主席先生，在這兩天內，議員已多次提及中國參與決定一個財政預算案的問題。我不打算進入這個討論範疇。鑑於距離主權移交之日只餘下大約 800 天，現在是適當時候考慮一九九七年後的衛生及衛生撥款策略，三個範圍須予處理：

首先，我們預計會有多少人會越過中港邊境接受治療，我們會根據這些資料決定關於健康護理服務需要的方向，有關需要指人手或醫院病床。

其次，統計資料顯示，大約 300 名香港人誕下的兒童目前正在中國。基本法列明，他們在一九九七年後會有充分資格，成為香港公民，擁有香港的居留權。在設施及健康護理的財政預算方面是否作出準備，為他們提供健康護理服務？

其三，我們不要忘記，雖然香港目前超過 97% 的公共醫療均受當局資助，但中國的醫院充其量只得到大約 10% 的資助。無疑聯合聲明承諾實行一國兩制。由於中國仍然缺乏健康護理服務，除非此概念不受來自中國任何程度不斷上升的需求壓力所動搖，否則很多人會南下求診，而本地健康護理制度將又再度成為其成就的犧牲品。

逃稅

我現在略談逃稅這個敏感題目，醫療業人士均直接或間接因此受到批評。首先，沒有人會容忍逃稅。不過，當提及出示紀錄，以便接受評稅，滿足稅務局的要求是極為困難的，而在這方面，我所代表組別的成員會感到內疚或受到騷擾。因此，我們歡迎制定法律，指明所有業務所須保存紀錄的最低數目及種類，因為屆時我們會得悉當稅務局職員到訪時，實際上應出示甚麼，而不會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滿足該部門難以滿足的需要，因為該部門的職員經常會折返而索取更多的紀錄。

現在也是適當的時候讓政府研究規管有關醫療業人士成立法團（或法團公司）的規則及規例。一名醫生只可以單獨形式執業，以獲得財政收益。當數名醫生合組一個法團時，他們則受到診療所條例所規管，而該條例禁止牟利。可惜，當一名醫生單獨執業時，他在任何形式的稅項寬減方面均受到歧視，因為他無法就海外醫學會議，甚至醫學書籍或醫學專業雜誌申索寬減，但是這一切可改善其治理病人的專業技能，並可同時推廣其業務。另一方面，其他專業人士只要可證實旅程或多或少與業務有關，則可透過法團將其假期扣稅。

善用盈餘

最後，主席先生，一方面，我們讚揚財政司令我們的儲備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除非錢財得以善用，否則便是毫無價值。去年，我呼籲政府利用儲備去進行一次過的計劃。今年的儲備仍然充裕。我會再次作出類似呼籲。在健康護理的範疇，政府倘將盈餘投資在興建新的普通科及專科門診診療所方面，或至少改善及翻新診療所，從而令其迎合目前市民不斷增加的需要及意願，此舉不會有何錯失。取之於民應盡量用之於民。這是我們絕對不容忽視的金科玉律。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鄭海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和很多同事一樣，想向麥高樂爵士致意，表揚他三十多年來服務香港的熱誠和貢獻。公務員制度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基礎，而能夠招聘到像麥高樂爵士一樣的公務員替本港工作，實在是本港之福。過去四年來，我有幸在工作上與麥高樂爵士有密切接觸，並目睹他如何工作。他所堅守的理財原則，歷經時間考驗，而且令香港的公共財政管理，成為人所稱譽的典範。同時，在如何把資源再分配予社會不同階層的問題上，財政司對本局提出的建議都能耐心聆聽，而且很多時都予以接納。

主席先生，正如很多同事一樣，我對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財政預算感到滿意。一些議員批評預算案過份謹慎、欠缺想像力及有欠體恤。不過我必須指出，我並不認同這些批評。沒有任何一份預算案可以毫無遺漏地照顧到社會一切的需要。過去四年來，麥高樂爵士已為財政政策帶來了不少新意。薪俸稅已見大幅寬減；政府在各個經濟領域上的開支都有增長，例如福利開支和好些大型的基礎建設工程等。除非我們否定量入為出的原則，否則就必須同意開支總要有個限度。我們亦不能期望每年都有重大改變。良好的課稅制度應是一個穩定而可測的制度。如果稅率或稅制每年都有所改變，社會人士想必會感到不耐煩。再者，就算要進一步推行其他重大的革變，我們亦要先行完成過去幾年所提出的新措施。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只作出了有限度的改變，而大部分改變其實都只是爲了因應通貨膨脹而作出的調整。這倒不是壞事。我們經已到了過渡期的最後階段，所以財政預算的策略應首重謹慎，無論是今個財政年度或未來三年都一樣。政治現實經已排除任何大型革變的可能性。香港政府每提出任何重大的建議，都會惹來中國方面的疑心和顧慮。假若我們大幅改動我們的財政政策，我們極有可能再次陷入爭拗和激烈辯論。現在時間是這般寶貴，可不能夠這樣白白浪費。

因此，在未來兩年，任何改變都應該可免則免。我們一向珍而重之的原則，亦應該維持不變，因爲這些原則，成就了香港舉世欽羨的地位。

我們必須維持平衡的財政預算。

我們必須維持簡單稅制、低稅率。

我們必須維持適當水平的儲備。政府必須聽取本局的意見，以決定各項開支的緩急先後。

違反這些原則，會削弱香港財政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我只想集中討論兩項問題：經濟事項和社會上較爲需要幫助的一群。

本局認爲通貨膨脹仍須關注，這點我同意。雖然通貨膨脹沒有惡化，卻也沒有好轉，箇中原因是經濟體系中供應量始終未能大幅突破。我不知道是否有快捷有效的解決方法。由於我毋須肩負起打擊通貨膨脹這份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我唯有捨難取易，跟隨別人一起吶喊，叫政府找出一些具有創意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我自己實在並無良策。

將財政司的薪俸跟通貨膨脹以反比掛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以我所知，新西蘭試過這個方法，而通貨膨脹亦確實回落了，不過我想只是純屬巧合，也不認爲兩者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當然，我們也可以透過需求管理的方法去遏抑通貨膨脹，可是我們是否清楚要付出甚麼代價呢？如果要透過大幅遏抑需求去打擊通脹，我們便免不了要忍受短期的痛楚。假若我們真的決定遏抑需求，代價便會是經濟衰退、大量人失業、盈利驟降及業務失敗。我們真的想在過渡期內見到這些景象嗎？

沒有快捷有效的解決方法，並不表示政府可以鬆懈。我認爲公共機構增加收費的申請，每一項都要十分仔細的審議，以確保不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

儘管通貨膨脹持續，我們亦應該注意到，香港的實質收入其實正在不斷增加。有人評論說，據堅尼系數顯示，香港的收入分配日趨懸殊。不過，堅尼系數並不能充份顯示實際情況，因為麥高樂爵士在過去三年來均有大幅增加免稅額，但該系數卻沒有計及這方面的影響。堅尼系數亦沒有考慮到較低收入階層透過不同方式所得到的資助，例如龐大的房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計劃和各類其他資助等。如果將這些因素列入計算之內，所得出的香港入息分配實際情況，可能大有分別。

此外，我也關注到在香港經營業務所涉及的成本。我說的不只是高昂的租金和工資成本。我更關注的是政府機構和監察團體無止境地要求業務經營者提供資料，令他們要負擔無形的成本。監察機構在提供報告方面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不過，我卻懷疑這些監察機構是否真的會去翻閱這些由財務機構提交的報告，還是隨手放在檔案櫃了事。我甚至懷疑這些監察機構做了這麼多工作，只不過是想證實他們自己的存在價值和擴展勢力。我完全同意鮑磊議員的建議，成立一個放寬管制小組，去研究那些各種各類的政府規條、規則以及提供報告的要求。我們要簡化越來越繁複的官僚程序，否則單是爲了應付這種種要求，各間公司便要花上許多人力。

有議員提到聯繫匯率。我相信像所有社會政治制度及金融體制一樣，聯繫匯率機制始終有消失的一日。不過，雖然一個人始終要死，但卻並不代表他現在就要去死，而我們更不應說他早該死去。聯繫匯率有好有壞，一如其他任何匯率機制一樣。沒有一套匯率機制是十全十美的，最重要的是，這套機制在香港確實行得通。自從聯繫匯率在一九八三年開始實施以來，經濟增長每年都達百分之七左右、失業率低、財政穩建、對外收支差額穩定。聯繫匯率又令香港成爲美元區；因此，以美元交收的投資者，毋須承擔匯率的風險，令香港可以吸納到更多資金。

問題是，聯繫匯率會不會永遠執行下去？當然不會。所以今日要求撤銷聯繫匯率的人，他朝就可以說自己是對的，又可趁機邀功，說自己目光遠大，藉此博取名聲。幸而中國政府較爲理智，認同聯繫匯率在過渡期間內及一九九七年以後都是本港財經體系的重要部分。

有人說應該取消聯繫匯率，讓其他機制自行浮現，然後互相比較一下。我也反對這種建議。我們不能說要取消這套匯率機制，又不提出其他代替方法。

主席先生，我想轉而談論一件我個人十分關注的事項。雖然本港繁榮興盛，但有好些人士不但未能分享我們財富累積的成果，生活水平反而每況愈下。我所說的是老人開題。由於這幾年來出現了實質負利率，今年資產價格又告下降，很多老人家的生活變得每況愈下，我們實在不能夠坐視不理。

我還聽聞有例子說有些老人家在政府醫院做手術時，醫藥費用花去了他們的畢生積蓄。風燭殘年的人還要身受此苦，可說是悲慘極了。我們要竭盡所能防止這類慘事。

另外，我希望政府能仔細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減免居住在自置物業的退休人士所繳付的差餉。由於差餉是按市值租金計算，租金上升，就連帶差餉徵款也告上升。但是，就算這些人居住在他們自置的樓宇，並沒有從租金上升中得到好處，卻也要因為估值增加而要繳交更多差餉。由於退休人士要依賴本身的積蓄過活，故在實質負利率的情況下，這會對他們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我希望政府能想出一些方法去紓緩這些老人家的負擔。

主席先生，我只談了幾項問題，因為我認為言辭精簡實際上反而更有效。我心目中還有其他問題，不過我會在適當的時候才提出。在結束致辭之前，我預祝麥高樂爵士萬事如意，退休生活美滿。我亦謹祝繼任財政司的理想人選曾蔭權先生履任後一切順利。不過，我希望他能研究如何分攤稅務重擔，因為目前的情況是，有錢人避稅有方，生活較差的人則可領取各式援助，而稅務的重擔，實際上卻落在中產階層的人身上。

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張文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今年的財政預算，由於財政司麥高樂先生離任在即，使我有着依依不捨之情。我必須承認，麥高樂先生在本屆立法局會期內的幾份財政預算，制訂的過程愈來愈開放，議員和公眾的意見，的確在他考慮之列。儘管我們有很多意見未被採納，但對於麥高樂先生的努力和耐心，我必須致以衷心的感謝。此外，對於曾蔭權先生繼任財政司，我甚表歡迎，希望我們能夠合作愉快。不過，我在他上任前有一個小小的抗議。他只送花給女記者，男記者則連草也沒有一條，難怪他到中國時，當地的人只讓他坐「麵包車」，並且還是坐在後座。

主席先生，財政司今年的預算案中，引入一個新名詞去總結他的理財哲學，就是今天每人都說的「共識資本主義」。他說要建立一個自由而公平的市場和完善的福利安全網。在大方向來說，共識資本主義並不是問題，但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之上，我們看到共識資本主義就是偏向於資本家和工商財團的利益，而對構成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廣大勞工階層和生活在底層急需援助的一群，卻沒有足夠的關懷與扶持。這種讓財團、地產商高度積累財富，讓小市民生活日益艱難的所謂共識資本主義，只會為香港在邁向九七的過渡期內，埋下嚴重的、社會不穩定的種子。

今年的香港經濟已經開始呈現衰退。製造業收縮，服務業停滯，工人失業和半失業大幅增加，一個最簡單的民生證據，就是工廠區開工不足、的士在街上大排長龍、酒樓食肆空檯增加，整個社會的消費力正迅速下降。政府剛剛公布新一季的失業率是 2.5%，就業不足率是 1.5%，這是自八九年以來最高的水平。即使以政府極保守的失業率計算，也有 75000 人的失業大軍，和 45000 人就業不足，這 12 萬人牽動著 12 萬個家庭，數十萬人的生計，當中可能引發的社會不滿和矛盾，足以使財政司引以為傲的共識資本主義亮起紅燈。

但政府對這盞紅燈視而不見，更加要衝紅燈，讓輸入勞工的直通車橫衝直撞。現在，充斥在香港勞工市場上，有 25000 名外籍勞工和即將到來的 27000 名機場外勞，更有數以萬計的非法勞工，以及迅速增長的移民回港人口。這近 10 萬入侵的外勞大軍與超過 10 萬的本土失業大軍，構成一個極為荒謬的局面，就是「港人失業冇工開，外勞搵食越山來」。對於外勞不斷搶去本地工人飯碗的現象，政府非但不加以阻止，反而沾沾自喜，說輸入勞工可遏抑通脹。財政司先生，你所說的共識資本主義，說穿了不過是犧牲本地工人利益及工資的合理上升，讓大老闆可額外賺得更多的資本主義。因此，在廣大工人與財政司之間，在輸入勞工的問題上，有的只是矛盾，而不是共識。

主席先生，本地工人在促進香港經濟的繁榮方面，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使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計算每年達港幣 17 萬元，在全球位列第十五。但是，這幾年來，基層勞工既不能分享每年 5.5% 的經濟增長，其工資增長也追不上通脹。要形容這些失業、半失業和低工資的工人這幾年的處境，可以概括為：「一身大汗，但換來一殼眼淚。」但在汗和淚之外，還有血。九四年，香港的工業意外繼續維持在高水平，受傷人數達 44000 人，平均 100 人當中，便有 28 人受傷，死亡人數更達 67 人，其中單是建築業，就已經有 51 人，佔整體死亡率的四分之三。在繁華背後，在高樓大廈之間，真是血淚斑斑，使人震驚，也使人心酸。

這是一個絕對不能接受的數字，政府也承認，地盤意外發生率「高得難以接受」。面對這高受傷率、高死亡率，政府做了些甚麼呢？每三個月才對地盤巡查一次；每宗違反地盤安全的個案，僱主平均罰款只是 13,000 元；16000 宗的地盤意外，只檢控了 1055 宗；下年度增加 8 個工業安全的督察，但全部用在機場核心工程，現有的工地上並沒有增加任何人手。主席先生，財政司所說的共識資本主義，是否包括容忍工人的高受傷率和高死亡率呢？如果我們在意外枉死生命面前，無動於衷，讓其繼續惡化，只能反映資本主義冷血的一面。而這一面，正是我們必須徹底揚棄的。

主席先生，財政司的共識資本主義包括了一個完善的福利安全網。總督彭定康先生自上任以來，亦多次強調「老有所依」。但這美麗的承諾，隨着老年退休金的夭折，變成失望的碎片。當人們對退休保障不存寄望之後，注意力又再集中於提高老人綜合援助金。理由也很簡單，即使全面保障退休遙遙無期，我們也不能因而忽略了生活在最困苦環境之下領取綜援的老人。在這個問題上，立法局是有共識的，就是按通脹將老人綜援金額提高至 2,500 元的人道水平。

面對這共識的要求，政府首先是「靠嚇」，說這要求會帶來 80 億至 230 億元的額外開支，稅率因此而提高 3%；其次是「靠呢」，說老年退休金一出，綜援老人就可即時受惠；最後是「靠拖」，現在我們又要等接近一年的時間，去研究及檢討。一嚇二呢三拖延，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盡失。其實，政府完全有能力提高老人的綜援，因為，去年的盈餘有 77 億元，九七年的財政總儲備達 3,610 億元，是本港有史以來最高的。更重要的一點是，財政司根本沒有按這幾年來平均 5.5% 的經濟增長，增加我們的社會開支，使綜援開支不能調整到 2,500 元的人道水平。在綜援這個問題上，提倡共識的財政司，卻揚棄了立法局和社會的共識，揚棄了他所鼓吹的，一個完善的福利安全網，實在是自相矛盾。讓老人望眼欲穿，是不道德的。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提倡「節用裕民，善藏其餘」的荀子，大概也會大罵財政司不理老人死活，是錯讀古書的孤寒財主。

主席先生，政府在很多場合都強調教育投資的重要性，提高教育質素亦是全港市民的共識。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全力擴展高等教育的同時，對基礎教育的投資長期偏低。基礎教育佔整體教育的開支，由過去的七成下跌至今年的六成左右。如果以今年的增幅來作比較，大專教育的增幅較小學多三倍，較中學多四倍。這樣使基礎教育的投資和改革步伐非常緩慢。當中最可憐的是幼稚園教育，只佔整體教育經費的 1%。即使增加了 8,000 萬元直接資助幼稚園的撥款，也是杯水車薪，將 1% 提升至 1.3%。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增長的嚴重不平衡，是三年來財政預算在教育方面最大的缺失。

但無論如何，政府終於願意直接資助幼稚園，是一項值得歡迎的措施，也是教育界和社會人士長期爭取的成果。遺憾的是，這 8,000 萬元的資助方案，至今仍未公布，更遑論落實執行。這種不明朗的局面，替幼稚園帶來更大的疑惑和不安。夜太長，夢必多。因此，我要鄭重向政府提出警告，請不要失信於民，令一項受歡迎的政策，由希望變成失望，由失望變成憤怒。

主席先生，對於政府全力發展高等教育，並在未來三年撥款 270 億元，我表示支持。這反映政府高度重視培育大專人才的政策。不過，大學急劇擴展，也暴露了很多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包括大學學費大幅提升、學生質素普遍下降、教職員服務條件、晉升和解僱的紛爭日漸增加，以及大學撥款可能出現的浪費與監督，都令到立法局和公眾更加關注大學擴展的「陣痛」。政府必須在尊重大專院校學術自由的同時，維護公帑的合理使用和監察，以尋求學術和社會的最大利益。

主席先生，麥高樂先生的共識資本主義社會中，提出一個「大市場，小政府」的理想。香港政府的確是一個小而有效率的政府。這個小政府，在過渡期內，卻要面對一個極大的挑戰，就是將一個殖民地政府過渡至一個回歸中國的特區政府。這個過渡，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維護公務員的士氣，並挽留公務員，在新的政治環境之下繼續為港人服務，使香港政府核心的行政體系能夠穩定跨越九七。

無可避免地，香港政府非殖民地化的過程必須展開。主席先生，我要在這裏公開讚揚公務員事務科，在短短一年內，實現高官本地化，開放和承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位，統一外地和本地公務員的服務條件。這三件極為重要而艱難的非殖民地化工作，得到全面開展，是極不容易的事情。

不過，主席先生，非殖民地化最後一個難關，就是要徹底改變殖民地政府重英輕中的語文政策，而實現《基本法》所規定的中英並重的原則。要留意到，全港佔 98% 的市民都是中國人，政府歧視中文，或是將中文當作花瓶，是絕對行不通的。因此，政府的公務員體系必須加速使用中文作為主要的溝通語文，讓中文在政府部門廣泛使用，而且通行無阻。我知道，這是一項更艱鉅的工作，但必須克服。政府必須帶頭走出中英並重的第一步，就是安排一個與民眾有密切接觸的部門，如政務總署、房屋署、教育署，作為一個實踐公事上使用中文的試點。總結經驗，為全面在政府所有部門廣泛使用中文提供有力的基礎，讓殖民地重英輕中的語文政策，隨着九七的來臨，走向真正的盡頭。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的最後一份預算案充滿謹慎的色彩，據財政司自己表示，這份預算案符合了東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財原則。他的預算策略、稅項建議和開支預算都受到蘇格蘭式的謹慎理財哲學所規限和控制。際此，九七將至，很少人會強烈反對財政司以謹慎之道處理香港的公共財政。但以本人來說，我卻對財政司那近乎不議不決的極端保守主義抱有懷疑的態度。預算案除了建議作出一些極為溫和的轉變外，可說是毫無新意，在增加香港競爭力和刺激經濟增長方面更乏善可陳，這樣的預算案可說是一個「看守政府」所編撰的預算案。

財政司談及香港「已為九十年代建立了一個穩定和持續的增長模式」。但香港的經濟環境瞬息萬變，現今的繁榮殊非倖致。香港若要創造財富和增加競爭力，政府便須採取更多措施，而不是單止是提供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的架構。世界性經濟衰退隨時打擊香港，「小政府」式的理財模式實在不能應付突如其來的轉變。經濟增長放緩可說是逼近眉睫，單是謹慎從之絕非良策。

經濟環境逆轉

雖然財政司作出肯定而令人安心的預測，但一九九五年的經濟前景仍然受悲觀情緒影響而陰霾密佈。《明報》自一九八五年起一直進行一項民意調查。這項調查顯示，雖然港

人對政治前景的信心略有回升，但他們於本年初對經濟的信心，較一九九四年卻下降了 10%。市民對經濟前景普遍感到悲觀，主要由以下因素導致：

(A) 外來因素

去年美國利率多次上調，對本港的股票熊市有顯著的影響；在地產市場方面，物業價格亦下跌了 30%。這些負面因素，會進一步減低已經疲弱的消費意慾，而一些須償還按揭貸款的置業者的消費意慾將更為疲弱。本港的貨物進口增幅預測會較出口增長為高，因此貿易逆差的情況將會持續。本地生產總值預計會增加 5.8%，而今年開支的實質增長卻預計為 9%，箇中影響實在不言而喻。

香港能否保持繁榮，須視乎中國的經濟及對外貿易能否持續茁壯發展及其對資金和專業技能的需求而定。主席先生，據會計界功能組別的成員表示，他們的公司客戶愈來愈多出現拖欠款項、壞帳和過量交易的情況。在中國做生意的香港公司已開始感受到中國經濟放緩所帶來的痛苦滋味。香港在一九九五年的經濟前景，與中國冷卻經濟過熱的緊縮措施能否軟著陸實在息息相關。中國官方公佈去年的通脹率高達 21.4%。中國在應付通脹攀升方面所採取的措施，會對香港產生影響。香港亦正面對高通脹壓力，預計今年的通脹率為 8.5%。從中國入口的食品價格，對消費指數的影響至大，而這些食品的入口成本預計亦會增加。

(B) 內在因素

經濟增長的速度較預期為快，再加上國際間的競爭，引致全球商品價格不斷上升，香港因而可能需要面對通脹壓力，最終導致本地需求減少。除此之外，本港在一向已不斷上升的業務經營成本和運輸及服務等方面的開支，亦會因商品價格上升而進一步增加；商業及住宅樓宇的租金當然亦會持續上揚。與此同時，本港現正由著重製造業及貿易，轉而以服務業為主，在這經濟結構轉型其間，我們亦要面對人力短缺的問題。本港勞工短缺的問題，不單是由於就業機會移離本港所造成，訓練新技術人才的速度緩慢，亦是原因之一。這情況令部分僱主在未能確定香港有可用的勞工之前，暫時擱置他們擴展業務的計劃。財政預算案中報告說，本港的工作人口增加了 3.5%（即 10 萬名工人），這項增長實在太低，未能迎合本港對勞工的需求，亦無法遏止通脹攀升。再培訓及在職訓練不足亦令已然緊張的勞工市場更添負荷——據估計，到一九九六年，本港會欠缺 73200 名具備中學教育程度的工人（即工作人口的 6.7%）。

政府在基礎建設方面的支出是本港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而新機場工程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基礎建設加速進行亦會令通脹加劇及增加建築成本。同時，我們必

須顧及賣地收益減少的因素，亦要預計到一九九五年的政治形勢轉變會令公共開支有所增加。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預計赤字達 26 億元，這正是通脹可能持續的徵兆。

建議解決方法

(A) 公共開支

面對外來及內在壓力，政府必須積極應付消費物價飆升的問題，因為通脹會蠶食普羅市民的儲蓄，並會威脅他們的退休保障。要真正徹底解決物業價格的問題，政府除了藉填海供應更多土地之外，亦應精簡其市區重建計劃及加速重訂分區用途的計劃，以期能地盡其用。在解決辦公樓宇租金高昂的問題方面，政府應增闢新的辦公樓宇用地，以容納擬在港開設業務或擴展業務的公司。這些措施有助大大減少在港從商的成本，而從商成本高昂正是窒礙本港經濟增長的因素。在神戶地震之後，我最近曾前往日本，得知有些日本公司對於安全問題感憂慮，因而有意將公司的總部遷至東南亞其他地區。如非成本高昂，香港實屬不作他想的最佳地點。此外，鑑於運輸基建不足亦妨礙貿易增長，當局實應採取更多措施，鼓勵私人機構在過境設施方面增加投資。

要應付高昂的工資成本，政府應放寬入境政策，令中國及世界各地的技術勞工可以來港工作，以紓緩勞工短缺的問題。政府亦應以更大程度的彈性，從外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輸入合資格的專業人士。現時服務業所需的專業技能與勞工所具備的技能未能互相配合，要解決這個問題，便應積極擴展再培訓及在職培訓計劃。此外，當局亦應與中國及外國的大學聯辦更多非學位課程和深造及行政人員培訓課程，藉以教授香港在二十一世紀所需的專門技能。最重要的是，當局應找出方法，克服服務業生產力相對下降的問題。

主席先生，在維持香港於亞太區的競爭優勢方面，房屋、基建、教育及人力資源是關鍵所在。當局有責任以高瞻遠矚的目光，積極解決這些問題。

(B) 稅收建議

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財政預算案並沒有解決稅收和開支不平衡的基本問題，有關這方面，稅務專業人士認為，只有 2% 的勞動人口以標準稅率繳稅，實在匪夷所思。我們亦明白，本年度的盈餘較少，是由於物業交易印花稅收入減少所致。

主席先生，在香港經營業務的成本高昂，已令香港在與鄰近國家競爭時處於不利位置。新加坡最近頒布實施的額外稅務優惠顯示競爭的問題所在。香港會計師公會和其他商

務團體強烈建議將利得稅率減低最少 0.5%。公會的另一項創新建議，是廢除物業稅，並將原應繳付物業稅的人士納入利得稅的稅網之內。這項建議實在值得當局考慮，因為此舉能令稅務局有限的人力資源發揮到最高效率。公會其他建議尚包括為集團虧損提供集體免稅優惠，以鼓勵本地投資；從退休保障基金賺取的收入可免繳付利得稅；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在港經營業務的成本急升問題；以及就自行評稅制進行可行性研究。

(C) 小學教育

接着我想談談另一項公共開支範圍；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均受到公眾關注。學生質素持續下降，尤其是中小學生及大專學生的語文水平，逼使教育統籌委員會在第五號報告書中研究改善情況的方法。然而，根據報告書第十章顯示，教統會過往的大部分教育改革措施都只針對中學生及大專學生。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用於教育方面的公共開支總額為 340 億，而撥予小學教育的經費，只佔其中的 60 億元，亦即總開支的 17.7%。此外，在非經常開支方面，大部分經費均用以興建香港教育學院的校舍。小學教育仍然是本港教育制度中的「灰姑娘」—— 遭忽視的一環。

自七十年代引入九年普及教育以來，我們開始將注意力轉移至發展高等教育。撥予大學教育的資源太多，以至不成比例，形成一個倒金字塔式的資源分配制度，遲早會失去平衡。我們寶貴的資源很可能會花在那些程度未及接受大專教育的學生身上。如要促進自由進取和競爭精神，香港必須培訓具備專業技能及具競爭力的工作人口。我們須要改善每班人數、增加學生與老師的比例及慢慢擴展全日制小學，以改善小學教育，但我們更須要公平的撥款分配。財政司新近創造的詞彙是「共識資本主義」。讓在這裏作出一個闡釋——要維持香港的「競爭能力」，我們必須促進「公平」，並且「扶助」小學教育。

(D) 環境保育

最後，我想以環境問題作結。雖然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環境保護方面的開支會增加 24.2%，但卻只佔公共開支總額的 3%，更只會主要用於發展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及其他廢物處理設施方面。環境保護署及漁農處的撥款建議亦乏善可陳，例如，為環境保護工作引入新科技、推行自然保育計劃及培植人工珊瑚等具創見的建議均未見提及。此外，政府亦沒有在預算案中撥出款項，用以搜集有關香港自然資源的全面數據，亦沒有撥款籌辦課程，令環保署的人員能追上世界各地環境保護科技的最新發展。更重要的是，在推廣從根源着手將廢物分開處理的工作，環保署仍裹足不前，而該署亦沒有提供足夠的財政援助予環保團體，以進行環境教育工作—— 大部分市民對為數達 5,000 萬元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撥款申請準則，都一無所知。

在結束陳辭之前，我想重申我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中提出的一點，就是政府部門的營運基金要逃避現行的財務管制系統的審查實在易如反掌。要求各事務委員會全面而又有系統地審核營運基金帳目，亦不切實可行。我們應該設定機制，以確保本局日後可以在預算案的制定過程中，審核所有營運基金的財政狀況是否穩健。

總括而言，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只不過是以謹慎為名，弄些例行的稅收及公共開支預算而已。然而，我們必須問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永遠依賴香港的持續經濟增長嗎？我們的保守理財政策是否早應有所突破？我們是否應該開始花些錢來建設更美好的明天？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馮檢基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作為任內最後一份的財政報告，財政司可能不想在預算案中有太多新的改變，所以很多敏感的問題都沒有提及，例如：如何打擊通脹、差餉問題、汽車牌費問題等。財政司可能希望留待下一任財政司在接任後處理這些問題，而他自己則不想插手，所以不少進取的財務政策，在今次財政司的預算案內都沒有提及，或是被擱置，或是以保守的態度處理。我對財政司在這一方面的考慮很不以為然。一直以來，我覺得政府均以一套經濟哲學用於財政預算內，雖然我們期望政府在這方面作出改革，但直至今時今日，我們仍看不到這些改革，我對此感到失望。總的來說，我覺得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忽略了廣大基層市民的福利。

所謂「共識資本主義」是政府制定本港經濟發展的立場，亦是財政司總結其財政預算案的一句說話，本人質疑政府究竟有否取得中、下階層人士的共識。從預算案中所見，我覺得政府在考慮各項政策時多以大企業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因而今年貧富懸殊的情況沒有改善，我更擔心情況將較以前嚴重。顯示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由七六年的 0.43 增至九一年的 0.48，明確顯示本地貧富差距正在擴大。作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該通過公共財政政策以拉近及協調貧富之間的差距。或許，政府慶幸本地貧富之間的衝突和矛盾未發展到一個極端的情況，因而繼續容許這樣不公平的現象發展下去。如果這是真的話，本人懇請政府多做未雨綢繆的工夫和了解未雨綢繆的好處。

現時，香港有 290 萬勞動人口，其中 99 萬人從事批發零售、出入口、酒樓及酒店等所謂服務行業。在九一至九四年間，這些行業的平均工資增長率是 9.5%。另外，有 44 萬名僱員從事製衣業，在同一期間內，他們的平均工資增長率是 9.9%。兩者在扣除通脹率後的實質工資增長只是 1% 左右。最諷刺的是，財政司在預算案中表示，香港的生產總值在扣除通脹後的增長有 5.5%，一般工人的實質工資增長約為 1%，而全港生產總值的增長則是 5.5%。這是否反映出大部分經濟成果是落入大企業家及資本家手中，本地勞工究竟能分享多少經濟發展的成果呢？

基於上述情況，政府應在財政預算案中優先考慮中、下階層市民的利益。預算案第五段提及政府制定預算案時的考慮原則是「把金錢留在能夠發揮效用的地方（即納稅人的口袋內）。毋須多講，政府所指，我估計大多是指資本家及大企業家，政府一直採用這些字眼或字句隱瞞實際情況。所謂「低稅率」或「簡單的標準稅率」，其實正正是對中下階層、夾心階層及中小型企業不公平的。政府對這現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麥高樂先生，四年了，每一次當你諮詢我的意見時，我都提出同樣的問題，但仍然沒有任何改善的辦法和答案。我覺得長遠的方法是取消標準稅率及引用累進稅率。

政府偏袒大企業的另一個例證是維持公司利得稅在 16.5%。我們必須明白，吸引資金在港成立公司或做生意，最大的吸引力是市場本身有否吸引力、基建是否充足、有否健全法制、充足人手、社會是否穩定等等。因此，政府實在毋須在去年將利得稅減去 1%，變成今年的 16.5%，而今年又不願意將之調高至 17.5%，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將公司利得稅調回 17.5%，增加的收入可用在其他社會福利開支上，令普羅市民受惠。我仍然覺得，政府只願維護工商界大企業的利益，卻放棄廣大市民的福利，這實在令人失望。我剛才所說的話，只想證明港府在制訂公共財政政策時是偏袒了大企業家，對中、下階層的利益則有所忽略。

接着下來，本人想指出政府對中、下階層市民的照顧極為有限的地方。政府按通脹率 10%調高個人入息免稅額，由 82,000 元增至 89,000 元，對市民來說其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因為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市民實質得到的只是 *status quo*，即維持現狀。去年政府建議把單親免稅額提高 25%，由 32,000 元增至 4 萬元。這方面有比較大的增幅，本人表示歡迎。不過，政府仍要緊記，單親家庭面對的困難是多方面的，需要政府在其他方面提供服務以互相配合。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九三年本港已有 35000 個單親家庭，而隨著本港離婚率上升，我相信單親家庭的數目會出現上升的現象。因此，政府的單親家庭政策不單要提供稅項優惠，同時亦要撥出資源協助單親家庭，使他們在房屋、就業及教育等方面得到支援。

工作人口上升是有助對抗通脹的方法之一，但預算案中指出，九三及九四年的工作人口增幅分別是 2.9%及 3.5%，其中包括了回流的移民人士。政府亦預期九五年的工作人口將進一步增加，移民回流人士數目也將不斷增加。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可能會有一些衝擊，尤其是現行的入口勞工政策，我覺得政府更要小心處理。據政府統計處最新資料顯示，由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本地失業率為 2.5%，是近八年內同期的最高比率。明顯可見，近年政府擴大輸入勞工政策令香港本地人失業率增加，對本地勞工來說，是極之不利的。在工作人口上升、入口勞工人數又大增的情況下，我擔心本地失業率上升的情況將持續下去。本地勞工（尤其是教育程度較低的藍領勞工）的就業保障就得不到照顧。

本人強烈反對財政司在預算案中指勞工不足是造成本港通脹問題的主要和唯一的原因，並一直以此為藉口，施行輸入大量外勞這不適合的政策。我覺得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但令本港更多製造業工人面對失業或半失業難題，也窒礙了培訓計劃的有效發展。

我仍然希望財政司由另一個角度考慮控制通貨膨脹，包括運用財務政策，如利息政策及美元掛鈎的政策。當然我同意現時未必是與美元脫鈎的適當時間，但長遠來說，如果當局今天不考慮，時機一到我們便又會讓機會溜走。上一次的機會是一九八八年。

去年政府有 77 億元盈餘，按財政司估計，至九九年時，加上土地基金的結存，港府的盈餘會高達 3,700 億元。在坐擁如此龐大盈餘的情況下，我覺得政府在社會公共開支方面卻表現得「就住就住」。

較早前，立法局要求政府改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服務，但財政司只預留 8,000 萬元作改善幼稚園服務質素之用，至於幼兒服務卻隻字不提，只回應說教育統籌司及衛生福利司會就有關問題制訂建議。政府便這樣「無了期」地拖延下去。近日有團體向政府建議在今年九月起落實直接資助幼稚園的承諾，並同時改善幼兒中心的服務質素，包括工作人員的入職條件和薪酬待遇，本人對此建議表示支持。此外，本人促請教育統籌司及衛生福利司盡快作出協調，並向公眾交代有關資助計劃方案及統一學前服務的最新進度，不能讓問題無限期的拖延下去。

無可否認，財政司在任內的確為香港留下一大筆儲備，這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可惜，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中、下階層市民的利益往往成為經濟繁榮的「犧牲品」，他們不能同步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所以我覺得香港的中下階層在這幾年並沒有合理分享香港經濟成果的果實。對於這份財政預算案，我仍然以去年的說法，將之形容為一個「孤寒財主」式的預算案。這並不能令我投贊成票，我將會棄權。其實，我不投反對票是希望以此作為送給麥高樂先生的一份退休禮物。

本人謹此陳辭。

鄭慕智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對於財政司麥高樂先生在他任內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首次提出的「共識資本主義」，我有兩個感想。第一，我非常高興麥高樂先生對本港的成功之道確有透徹了解，他的經濟理念其實與自由黨一直所倡議的「經濟主導，關注民生」宗旨不謀而合。我們深信香港要維持經濟發展，創造社會財富，才能為市民提供完善的福利安全網，大家共享繁榮安定。

至於第二個感想，則是覺得財政司有點理想化，與現實環境脫節。隨著近年政治發展，我們過去和衷共濟的精神已經消失於無形，今天再要建立共識真是談何容易。民主發展無疑是一件好事，但目標不應是製造矛盾分化，而是讓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獲得照顧，求同存異。我深深期望香港人好好珍惜「協調共識創繁榮」這句麥高樂先生的臨別贈言。這亦是我對大家的忠告。

我曾經替麥高樂先生計算過，他出任財政司 4 年以來，為港府儲備帶來 460 億元進帳，使目前儲備總額增至接近 1,500 億元。政府財政狀況健全，可以有充裕資源投入社會建設，自然是值得高興的事。不過，很少人會問，政府所花的每一分、每一毫，究竟是否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對整體社會是否有利？抑或是大部分被增加職位這些行政開支所吞掉，甚至是白白浪費？

監察政府審慎理財，是我過去多年在立法局工作的重點。九二年我首次就財政預算案發言時，已經開宗明義指出，審慎地管理公帑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並建議引入現代行政管理的概念，提高政府部門及其他公營機構的工作效率，從而減省不必要的支出。

香港經濟有今日的成就，有賴我們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普遍地為國際投資者所信任。而一個具有高度效率的法律系統，在現今社會尤為重要。

還記得我最初加入立法局服務時，司法部尤如一個落後封閉的獨立王國，內部百病叢生，排期候審的案件堆積如山。或許由於司法效率不能用金錢來衡量這錯誤觀念，一直很少人敢於捋其虎鬚。當時我首先提出，司法部要推行現代化，必須對症下藥，從管理改革及提高效率方面着手，才能迎合現今社會的急劇轉變。

今日我很開心見到司法部在經歷過一場「沉默的革命」後，已經完全脫胎換骨，由一個暮氣沉沉的老人家變成一個朝氣勃勃的小伙子。隨著管理效率的改善，案件輪候的時間已經大為縮短，司法部現在有勇氣站出來，接受本局議員及市民大眾的公開質詢，滿懷信心地表示要致力達到新訂出的案件候審時間指標，今年開始他們要在地方法院內推行雙語審訊。這一切都是大家以前想不到的，但現在卻真真正正的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當然，司法部的成功改革，只是本港在法律系統管理改革的漫長道路上，開始邁出的第一步，但這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證明過去我所建議的引入現代管理手法，正是提高政府部門工作效率的最佳工具，我們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司法部獲增添撥款聘請多位法官。今年夏季法庭錄音及謄寫系統更會擴展至所有法庭使用，但要這些新添置的設備發揮最佳的經濟效益，政府必須相應增加法庭的支援人手，並且輔以適當的訓練，否則便會變成得物無所用。此外，如何解決長期以來法官人手不足問題，以及落實本地化政策，將會是司法部未來的最大挑戰。

主席先生，同樣是法律部門，司法部在管理改革上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律政署的表現卻瞠乎其後。在去年財政預算案發言中，我已經指出律政署在管理上存在着很多流弊，更特別提醒政府注意該署在聘請私人執業律師及有關專業服務方面的龐大開支，是否用得其所，可惜政府對此卻置若罔聞。

現在，我們終於發現納稅人爲此而付出的巨大代價。較早前披露出來的裕民財務案古勵志事件，律政署在兩年半內支付 1,700 萬元；石崗船民騷動案件則付出 410 萬元；另一宗石崗船民謀殺案又支付 360 萬元。我相信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這個教訓實在太貴了。

雖然下年度律政署將會重組檢控官職級，增加 23 個職位，藉此減少「外發」給私人執業律師的案件數量，但下年度在這方面的預留撥款仍高達 2.1 億元，佔整個部門開支的三分之一。其實，我要指出我並非反對將案件「外發」，而減少案件「外發」只是「釜底抽薪」的消極做法，由於近年案件數量大增，私人律師又擁有各方面的專長和經驗，我明白律政署是有必要將部分案件交由私人律師處理。因此，正確做法是制訂一套私人律師承接政府案件收費標準。我很奇怪，現時有很多私人機構甚至大學或公共機構的法律服務合約都是經過適當的投標方法，透過公平競爭而獲得最高效率而收費合理的服務，爲何律政署不能仿效這方法，在有效控制支出之餘，更可減少每宗案件需要與私人律師討價還價的情況。

另一點律政署需要改善的，便是從速設立一套內部專業職系員工考核制度，透過客觀的準則及制度，評估他們的工作表現。相信這樣做有助提高整個部門的士氣，從而使工作效率大大加強。

不過，律政署亦有值得我們稱讚的地方。爲落實本地化政策，去年我建議律政署擴大「見習律政人員計劃」的名額，吸引本地優秀的年青法律畢業生投身政府服務，爲律政署培訓更多未來接班人。很多謝政府再一次接納本人的建議，在下年度將此計劃的名額由現時每年 10 人增至 15 人。

主席先生，現在我想轉談社會福利範疇，下年度預算案中，我最欣慰的是可以看到人性關懷的一面，財政司將單親免稅額提高 25%，供養父母與祖父母額外免稅額增加一倍，同時新增一項供養弱能家屬免稅額。雖然這些稅項寬減涉及的實際金額不多，但總算能減輕有關人士在這方面的負擔，而更重要的是政府清楚傳達出一個訊息，就是我們的社會鼓勵年青人照顧父母，社會也沒有忘記那些需要幫助的不幸人士，我們關懷他們的困難，更願意分擔他們的壓力。這份關懷互愛的精神，才是彌足珍貴。

下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爲 149 億元，表面看來增幅非常之高。撇開這些數字不談，我最關心的反而是這些開支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直接用於有需要人士身上，而不是浪費在一些無謂的行政程序中。如果社會福利能夠貫徹落實審慎理財的原則，這方面的開支便能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監察政府給予資助機構的撥款是否獲得適當運用，是另外一項我長期以來關注的問題。近年資助機構獲得的撥款激增，下年度更多達 26 億元。不過，現行資助機制卻存在很多漏洞，港府一直缺乏清晰準則，監管資助機構的服務是否物有所值，也沒有任何機制

評定有關服務的優劣。有人形容資助機構取得撥款後，情況跡近乎「冇皇管」，或者這說法可能誇張了一點，但足以顯示出問題的嚴重性。相反地，有些資助機構員工卻向我投訴，現時社會福利署以服務成本計算撥款的方法欠缺彈性，未能照顧到實際需要。

在過去兩年的發言中，我曾經促請政府重新檢討資助機制，引入「衡工量值」的概念，將監管方式的重點由「投入」指標改為「服務」指標，來評估資助機構的表現。目標是透過良性競爭，促進整體服務水平的提高。很高興我的要求終於得到政府接納，在本月開始聘請顧問公司進行一項社會福利輔助行政檢討。

我希望今次檢討可以促使資助機構善用資源，因為他它們的經費同樣是納稅人的金錢。將來資助機構的服務水平有了優劣比較後，政府應鼓勵表現良好者擴大服務的層面和範圍；至於水平較差者，則應給予所需支援，幫助它們改善管理，釐訂明確的服務目標。

各位同事，作為一位立法局議員，在過去多年的工作中，我深深體會到監察政府審慎處理公帑開支，比較有些人只懂事事向政府需索增加支出，來得更有意義，亦更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今日相信是我在可見的將來，最後一次在立法局就財政預算案發言，我期望將來每一位議員都能夠將我的工作目標延續下去。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撥款條例草案。

馮智活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根據九五至九六年度財政預算案，用於環境部分的公共開支將達 68 億元，實質增長超過 24%，增幅居眾政策組別之首，民主黨對此雖然表示歡迎，但事實上，預算案對許多香港現時急需解決的環境問題，仍然未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同時，對於發展一套全面而長遠的環境保護策略亦沒有顯著進展，故整體而言，仍然令人失望。

空氣污染

首先要提到的是空氣污染情況仍然是每況愈下，在九三年，共有 5606 人死於呼吸道疾病，而患上肺癌的人數（雖然並不完全是因為空氣污染，但亦可以作為參考）亦達到 2834 人，這些數字實際上反映出香港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已經達到危險階段。而空氣污染物中超過八成以上是由汽車廢氣造成，預算案中雖然有強調解決汽車污染的問題，但情況並不樂觀。

首先，汽車污染以柴油車最為嚴重，但港府的一系列政策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例如港府打算收緊新入口汽車的排放標準，但路面上仍會有超過 10 萬輛現有的汽車未能達到新的標準，可是預算案中卻沒有提及會否增加人手及資源對現存汽車進行監察及提出改善的方案，而整件事件反映政府在這方面仍然是不夠決心。

另一方面，港府官員於九一年年底與立法局環境事務委員會開會時，因為當時通脹厲害，故堅決拒絕要求柴油車輛轉用電油，但經議員及環保人士不斷施加壓力後，才同意會研究強制要求柴油車輛轉用汽油以減低污染，但有關措施的進程緩慢，一拖三年多，至今仍未有具體的建議，缺乏積極性，而另一方面外界亦有學者及專業人士表示對此做法能否減低污染存有疑問，而環保署至今仍未有權威性的研究以作澄清，故有必要加快步伐，認真作出研究。

此外，現時香港的空氣監察站絕大部分均設於大廈天台上，所得的數據未能反映繁忙路面的空氣污染情況。但其實最直接影響到市民的正正是路面的污染物，故此，本人亦就設立地面監察站向環保署作出提問，但所得的回答實在令人失望。當局既沒有解釋為何不增設地面監察站，又不肯承諾會增撥資源進行此事，令人懷疑港府並不希望得知真實的污染情況，從而可避免尷尬及逃避責任。故本人強烈促請環保署應該作出檢討，增撥資源到有關方面。

廢物處理

對於廢物處理方面，港府打算投入大量資源，但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過往堆填區被濫用情況嚴重，其中尤以建築廢料最為普遍，以致大大縮短堆填區的使用期，而由於堆填區運作成本非常昂貴，故濫用情況會直接浪費公帑。事實上，政府曾於九二年打算禁止裝載超過 20% 惰性廢料的垃圾車進入堆填區，但卻因為沒有決心以致未能實行。當時雖說會實行收費制度，但仍有必要確保有足夠人手監管及作出定期檢討。如發覺情況並不理想，仍然有過多惰性廢料倒入堆填區的話，便應該提高收費或採取其他懲罰性的措施，以免我們寶貴的堆填區空間再次繼續被濫用。但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最近預備增加資源，處理海上垃圾，本人希望有關措施能夠切實執行，做出實際成果。

此外，現時新界有不少污染黑點，例如有許多土地被用作非法露天停車場及貨櫃場等，而港府亦曾於去年就此方面撥款增聘專責人手，以清理污染黑點。但至今而言，收效依然不大，而清理進展相當緩慢，港府有必要檢討有關措施及成效，避免浪費公帑。

水質污染

現時每日有 200 萬立方米污水流入海港，而港府對於將整個維多利亞港列入水質管制區一事一拖再拖，最終要到九七年才可以完成整個計劃，進展之慢，令人沮喪。

直至最近港府表示可以將部分計劃提前實行 1 至 3 個月，雖然這些並不算是大進展，但至少令人對政府的誠意回復少許信心，而港府亦應該引以為鑑，不應在污染問題上採取敷衍的態度。最近吐露港出現大量紅潮，使魚類大量死亡，其腐爛時所產生的臭味更影響到大埔區三分之一的面積。這事件告知我們，一旦對污染採取容忍態度，直至問題惡化時，要解決便要多花數倍的資源及力量，而最可惜的是被污染的環境根本不能回復舊觀。

與此同時，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的進度非常緩慢，而且問題百出，例如港府至今總共花費超過 3 億元作顧問研究及土木工程探土費用，但到現時為止，該計劃的具體安排仍然因為本身的問題而須再作研究，實有浪費公帑之嫌。本人促請港府就排污計劃的具體安排盡快作出決定，以解決日益惡化的水質污染。另一方面，市民對於排污收費一直的理解是費用會用以支付新的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而並非舊有的污水處理服務，但現在政府要市民支付舊有渠務署有關污水系統的開支。本人重申，政府有責任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污水處理服務，而並非將「污染者自付」原則曲解為「用者自付」，要市民承擔全部開支。

米埔濕地

早於一九九三年六月，港府已經表示有意將米埔及鄰近濕地劃為拉姆薩爾國際重要濕地，但正式劃界卻要到九五年中才可以完成。而因為政府態度猶疑，不肯就濕地保護價值作出詳細的研究，以致最近有發展商可以成功上訴，將南生圍發展為高爾夫球場及住宅區。到現在港府決定保護濕地，但答允投入的資源亦屬偏低，而且要等到九六至九七年度才會開始撥出款項作土地清理及設立遊客中心和教育設備，對於保育及發展濕地的措施及撥款則隻字不提，令人質疑政府對保護濕地的誠意。更令人驚異的是整個濕地計劃根本沒有從規劃方面提出任何指導建議，最終仍令發展商有機可乘，逐步蠶食我們寶貴的濕地。

正如本人在開頭所述，預算案環境部分開支增長在表面上而言是可觀的，但絕大部分的資源均用於廢物設施方面。這些設施一方面是既定項目，並無新意，另一方面，該些項目屬於事後補救措施，着眼於清除污染，其環境效益遠遠不如保育的措施。

較為值得一讚的是政府就減少廢物所作出的研究及草擬法例要求大型發展須提供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算是向正確的方向踏前一步，但仍嫌決心不足，例如包裝廢物佔都市廢物兩成之多，而政府暫時只能成功向 1500 個商戶推廣減少使用膠袋，這方面須繼續努力，可惜在預算案中未能令我看到政府對此有任何行動。

另一方面，港府用於環境評估及規劃的撥款只有 3.2% 的增長，反映港府並不重視長遠的環境規劃。但事實上，一個遠大而全面的視野對發展迅速的香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試想整個社會只顧進行盲目和不顧後果的發展，而沒有一套環境保育指導的政策，其結果會是災難性的。現時港府只着重對抗污染，但環境一旦被破壞，要修復便要花上好幾倍的努力，令政府疲於奔命，而效果亦往往未如理想，故本人促請政府認真檢討，要發展一套全面的環境保育政策，而並非只懂進行短視的補救行動。

婦女政策

主席先生，本人現在想轉談關於財政預算案中與婦女事務有關的開支部分。在未評價各項具體安排之前，我先提出一個觀點。政府就婦女事務作出的預算，以及促進兩性平等的政策，應該顧及女性在社會上各方面的需要。政策應該是全面的，各部門為女性提供的服務應該是互相配合和連貫的。政府如果對婦女事務重視，便不應以一種「割裂」的施政方針來處理婦女事務。

今年財政預算撥給婦女事務的開支，似乎有所增加。首先，政府將撥款 500 萬元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其次，約 100 萬元將用於促進兩性平等的活動。此外，約有 130 萬元將用於設立一間婦女健康中心。至於第三間婦女庇護中心，亦將於九五至九六年度成立。而在社會服務方面，資助家庭與幼兒服務機構的開支，約增加 19%，其中部分開支，會用作增加 1400 個日間託兒名額，以及 250 個育嬰園名額。

這些由不同政策科提出的預算開支，作為支援婦女在社會上爭取獨立、平等地位的第一步，我個人表示歡迎。但從全面照顧婦女的角度看，這些零碎的開支項目，卻有嚴重不足的地方。

首先，本人從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設立說起。委員會雖然要等待性別歧視法通過後，才會正式成立，但按政府的估計，每年將獲 3,600 萬元的經費。不過，按現時政府的建議，委員會只會處理因性別和婚姻狀況而受到歧視或受到性騷擾的個案。但是，現今婦女所面對的困境，並不限於這些地方。

在就業方面，婦女因年齡偏高而受到歧視的情況日益嚴重。此外，單親人士在就業及居住方面亦受到歧視。但是現今的法例，明顯沒有為這些受到歧視者提供保障。如果要為婦女提供一個法律和公義屏障，平等機會委員會以及性別歧視法，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故此，本人認為，政府要在法律的框架內，提供更多的資源，令婦女在多個層面上，得到全面的法律保障。

促進兩性平等，不是單靠法律手段就可以完全達到的，還須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三方面有連貫和完備的安排。政府花費 100 萬元在宣傳兩性平等的活動方面，只是短視的消費。如果政府不願意在教育政策和教育資源方面，發展一套促進兩性平等的長遠策略和計劃，這 100 萬元可能只是在電視上，多賣一兩個廣告，對教育公眾並沒有長遠的作用。

再檢視醫療及社會服務的開支，我們不難發覺支援婦女的服務，廣度和深度都不足夠。統計兩間婦女健康中心的服務人數，每年約為 5000 名婦女服務，相對於本港二百九十多萬的女性來說，它的功能實在渺小得很。而且服務對象是 45 歲或以上的女性，更加限制了受惠的人數。

至於託兒服務的嚴重不足，更加直接阻礙婦女在社會上發展潛能的機會。況且，現時每年增加 1400 個託兒名額的計劃，進展完全不理想。以現時投入的資源計算，每年約五千多個的託兒名額，我們要政府檢討一下究竟離實際需求有多遠。

從一個全面的角度來考慮婦女的事務，政府應該認識到促進兩性平等實際涉及多方面的政策。

現時政府的統籌工作，表現差強人意。本人仍然希望政府積極考慮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透過這個統籌機構，檢視現時婦女各方面的處境，及全面衡量婦女不同層面的需要，並協調各政府部門及其他服務機構，為促進兩性平等而努力。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夏永豪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這是財政司麥高樂爵士任內的最後一份預算案。一如以往，預算案顯示了平實及穩健的理財哲學。在收入方面，主要稅率維持不變，消除了納稅人憂慮，尤其可取，是值得支持的。但是「負責任的政府」除了須藏富於民及積穀防饑，還要善「用」其餘，照顧市民大眾在日常生活的各種需要。政府積聚了龐大盈餘（估計到一九九九年達 3,600 億元），未免過分謹慎。盈餘取自社會，亦應適當地用於社會。綜觀今個財政年度的各項開支，某些項目的撥款仍然不足，尤其是在教育經常開支方面，更為不足。

今年教育經常開支的實質增長只得 4.9%，跟去年相比，低了 1.6%，僅為國民生產總值的 3.3%，遠遠低於經濟的增長率。據負責教育的官員表示，教育開支已達總開支的五分之一，可算不少。但香港是極其倚重人力資源的國際商業城市，正如財政司所說：「市民是本港最大的資源」。為了保持香港在國際間的競爭力，提高教育撥款，肯定教育在培育人力資源的地位，應是「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做到的。

提高教育質素是總督在九四年施政報告中的承諾。但仔細看今年財政預算案中的各項教育開支，有些項目的撥款仍然不足夠。

改善幼稚園教育的質素已經是社會大眾長久以來的期望。但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承擔踏出的只是第一步，但仍然只集中於幼稚園的師資訓練方面。雖然提高師資訓練可以改善教育質素，但是如果沒有合理的薪酬互相配合，也不能吸引人才加入幼師行列。因此，資助幼稚園教育，使教師的薪酬得到改善，是相當重要的。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除了準備動用 3,000 萬元開辦幼師培訓課程，還預留了 8,000 萬元資助幼稚園計劃。本人對政府能夠正視這問題，作出具體的行動，深表

歡迎。但本人對政府從其他教育範疇節省開支而得來的 8,000 萬元用作資助幼稚園計劃的做法卻不敢苟同。因為削減其他教育的開支，必然阻礙其他教育政策的推行，最終受影響的還是教育質素。對資助幼稚園教育的形式，本人一向有如下的意見：政府可於財政充裕的年度，如目前這幾年，另外撥款成立學前教育基金，以後從基金收益中酌量增加對幼稚園教育的津貼，使資助幼稚園的財政預算可控制自如。其中一個可行的辦法便是按月向每名幼稚園教師發放一定數額的補助金，而這數額可由政府按其財力而釐訂。

最後，本人希望政府能夠盡早公布幼師培訓及資助計劃的詳細內容及方式，以供各界討論，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在小學教育方面，近年在提高小學教育質素方面，最為突出的政策是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建議所設立的小學學位教席。按照政府的政策，預計至二零零七年，小學教師中有 35% 為學位教師。根據現時的統計，全港的小學教席在二零零七年約有 18000 個，35% 即約共 6300 個小學學位教席。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將動用 500 萬元提升九四至九五學年的 180 個小學學位教師。這個做法應有助改善小學教育質素，但提升數目只得 180 個則未免太少，長遠來看，教育質素一定會受到影響。

根據統計，一九九三年小學教師中曾受專業訓練又擁有學士學位（或以上）的人數已達 825 人，佔小學教師的 7% 以上；而到一九九八年，在本地畢業的教育學士數目可達到 2500 個，但小學學位教席現在卻只得 860 個。由此可見，政策估計不足，以致小學學位教席出現僧多粥少的情況。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將會出現的是未被提升的教師被迫接受不合理的薪酬，或畢業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教師士氣均會大受影響。

因此，政府應正視小學學位教師供求不平衡的問題，盡早檢討政策，增加小學學位教席的數額。此外，本人建議政府在短期內應該將延遲批核而節省下來的九四至九五年度 180 個小學學位教師的薪酬資源用於增加小學學位教席，使上述的短缺情況得到些微的改善。

中學教育

隨著小學教師學位化的出現，中學教師全學位化亦是必然的趨勢。一直以來，中學的人手編制比例是 70% 為學位教師，30% 是文憑教師。據統計數字，學位教師實際的整體比例，在過去幾年稍低於 70%，分別是九三年的 65%，九二年的 64% 及九一年的 62%。要進一步提升師資質素，昔日政府制定學位與文憑教師比例的理據實有調整的必要。可惜在總督的施政報告內及今年的的預算案中，政府都未有正視這問題。對於三成非學位教師專業地位的提升，政府應該盡快制訂計劃，接着增加資源，落實政策的目標。

教師福利

其實，改善教育質素與提升教師專業地位有着密切的關係。因為在改善教育質素的各項條件中，以師資最為重要。如何吸引人才，挽留人才，使教師樂於將教育工作視為終生專業，除了加強培訓和進修之外，教師的薪酬福利也是很重要的。有關教師薪酬福利的建議，本人一向有以下的看法：

在薪酬和附帶福利方面，政府應該盡早實現津校教師與官校教師的「同工同酬」。以下是本人的建議：

在公積金方面，應該逐步拉近現時中、小學教師與大專院校和工業學院教師的公積金津貼的距離。首先可將現時首五年 5% 的僱主公積金津貼提高至 10%，而五年以上則提高至 15%，因為現時後者無論年資多少都一律享有 15% 的津貼，實在比較學校教師大為優勝。

在房屋方面，應該拉近津校教師與官校教師在房屋津貼的距離。現時為津貼學校教師而設的「供樓利息津貼計劃」可謂「聊勝於無」。本人建議政府在提高每月的津貼額之外，更應提供買樓首期的津貼。

在醫療方面，津校的教師完全得不到任何福利。政府應參照一些大專及工業院校的醫療計劃，由僱主替僱員購買醫療保險。

改善教育質素，提高教師專業地位，必須要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教育的規劃上作出長遠的承擔才能達到。長久以來，教育界已向政府要求解決基礎教育中未有處理的問題，如提高教師薪酬福利、取消中學浮動班制、全面推行小學全日制計劃等等。但一直以來，政府以需要擴展各階層的基礎教育為理由，對以上的問題採取拖延態度。直至現在中、小學及大專教育已經全面發展，政府又以近年出生率下降、小學及初中學生人數減少為理由，拒絕增加教育開支。教育的支出，不應該視為一種社會服務的負擔，而應視為對社會人力資源的一種長遠投資。今日的吝嗇，就是將來的欠缺。雖然有人認為對「夕陽政府」在長期規劃方面不應該有過高的期望，所以一切都可以「睇開啲」。但是本人絕不甘心，反而認為一個將近「到期」的政府更要善用最後的機會，把教育辦好，對歷史作出交代。所以，對於政府在教育規劃上未能作出更大的長遠承擔，本人非常失望。

我想藉此機會，謹祝財政司麥高樂爵士及他的夫人在麥高樂爵士榮休之後生活愉快。謝謝主席先生。

何敏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對於香港一般勞工階層來說，他們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共識(consensus)的資本主義，而是一個帶有壓迫性(coercion)的資本主義社會。政府所謂的共識，充其量只是一種符合工商界利益的共識。

香港的勞工階層，在面對經濟轉型及外地勞工的競爭下，工人的職業流動性出現下調情況，部分技術工人會轉為從事一些服務性行業中低下的職位，例如清潔和看更工作；而一般年老及缺乏技能的老工人，更面對被排擠於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壓力。

政府在整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投入大量財政資源於基礎建設，加速服務業的發展。而在面對高通脹的壓力時，政府則採用輸入外勞的方式，遏抑本地工人工資的增長。於是，本地工人一方面不能因經濟增長和大型基建的開展而獲益，而在轉職時，更須面對外勞的直接競爭。

當然，政府會辯稱這一切都是為香港的繁榮整體利益着想，香港經濟有好的發展，將惠及所有人。但政府有沒有考慮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甚麼人得益最大？甚麼人的利益受到剝削？

政府過去一年在勞工福利保障的問題上，例如反對長期服務金的修訂、阻礙立法機關對輸入外勞進行適當的監察，以至否決老年退休金計劃等，都只是站在維護工商業利益的一方。即使政府最近決定計劃推行的私人公積金計劃，亦罔顧低收入工人退休保障的需要。

在財政司的眼裏，勞工權益和福利可能只隸屬勞工處的工作，並不會與整體經濟結構轉型和發展連結起來。須知道本港不像外國，他們對勞工福利有多重的保障，例如有最低工資和失業保障，當本港工人遇到困難時，則缺乏任何保障。政府這種對勞工福利的短視態度，後果是直接犧牲一群缺乏集體談判權的工人的權益。

在後過渡期，政府的策略很明顯是盡量希望挽留資本家，千方百計為資本家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但這做法只會令社會貧富不均加劇，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下降，產生不穩定的因素。

如果要達到一個真正有共識的資本主義社會，政府應該切實聆聽勞工階層的需要，而不是美其名為共識，但骨子裏卻是赤裸裸的官商共識和摒棄了勞工階層的共識。麥高樂爵士作為財政司，開始與立法局建立一個良好的夥伴關係。由麥高樂爵士開始，是真真正正的與立法局商討，並與立法局議員討論有關財政預算方面的期望。在這方面，我們是非常欣賞的。但是綜觀財政司過往提出的四份預算案，起碼在勞工福利的保障上，仍然是乏善足陳。財政司在以往三份預算案中，都大談本港失業率偏低，已達到充分就業，所以政府可以採取輸入外勞方式來打擊通脹。在去年預算案中，更提出輸入中國專才的計劃，將人力政策視作經濟發展的附屬工具。追求的是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儲備總額，但對勞工工資大幅下降，以致通脹蠶食低收入工人生活質數等等的情況，卻一一袖手旁觀。我很希望在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可以看到政府確實對於輸入外勞的政策有明顯的改變。

在老人退休保障問題上，財政預算案在去年大談老年退休金的好處，但今年對這個問題卻隻字不提。政府對原來應該用於退休保障的資源，遲遲不肯發放，把從老人應得的退休保障資源壓榨得來的部分，用來加大儲備額，以便在中方面前誇耀一番。我們覺得非常失望。

有關醫療衛生事務方面，經過衛生界各團體多年向政府積極爭取，本人很高興見到今年財政司特別調撥一批資源開辦第一年護士學位課程，以提高護理服務的質素。其實護士人手及有關的服務問題已經累積多年，一直未獲政府正視，今年政府回應較早前衛生界多個團體的訴求，落實調撥資源開辦護理學位，本人希望這是政府關注有關問題的開始，亦期望下一任的財政司在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我的選民希望見到的不只是有議員提及的一套「西裝」，最好還加上美麗的「煲呔」。

醫療服務是人力非常密集的服務，故此在我們制訂醫院服務的財政預算時，其中少不得的就是人力規劃，可是現時有關當局並無完整的準則去處理醫護人員的人力計劃。醫院管理局未成立之時，情況一如現時的政府部門，醫護人員均有清楚編制。當政府要計算有關服務成本及作服務發展的規劃時，均按此編制做基準。醫療衛生服務既是人力密集的服務，人力資源的擴展亦必然影響了醫院服務的發展方向。但自從醫管局接管了全港公營醫院服務後，一直未有製訂類似的人力編制，只有不同職系的人手數字。且讓我們看看這一兩年有關的人手增長數字，從預算案我們可以看到醫生的增長率在九四至九五年度為 8.2%，九五至九六年度的增長則為 10.5%。至於一直喊着人手不足的護理行業，九四至九五年度的增長為 2.98%，九五至九六年度為 2.87%。由以上連續兩年的數字可見，人力發展已經有不平衡的趨勢出現，我很希望衛生福利司作為醫院管理局這項目的負責人，可以在這一方面進行更嚴緊的監察。

由於現時沒有編制去作人手規劃及財政預算，我們無從知道以上增長比率是否適合及代表均衡的發展。當然我們亦無從知道政府或有關當局是按甚麼準則去作出以上兩個不同職系的人手規劃。但是，在沒有編制的情況下，有這樣的發展，醫院管理局當會繼續訴說沒有護士短缺，但這不可能是事實。當然我們亦明白規範太多會造成僵化，令具彈性的醫管局變回以前的政府部門一樣。可是人力編制將影響整個財政預算及服務發展，若現時醫院的情況繼續下去，我們任由個別醫院作主導發展，我們會缺乏可靠的準則及有效的制衡，則醫院服務勢必受到幾年之後累積下來的直接影響。

立法局及公眾人士現時並沒有足夠的資料及數據去監察醫管局，醫管局一百七十多億元的撥款既佔總開支約一成，我們要求衛生福利科加強監察及制衡有關的機制。一個那麼大的機構，除政府之外，我看不到有哪些機構可以有效監察政府一成的開支。在過去三年，醫院管理局帶來很大的改革。隨着權力下放，在很多方面還未看到相應的制度開放，令權力下放後的制衡和監察可以相應有效地發展和執行。衛生福利司作為負責的官員，我希望政府的政策科可以負起這監察責任，和提供足夠數據給立法局和市民看得清楚，究竟我們撥出來的一成支出是如何分配、分配是否公平和是否有效率。

此外，我亦希望在此促請政府留意醫院管理局因着服務的擴展，會否影響其他資源的分配。在過往幾年我們已經見到醫院管理局的市場佔有率已從最初的 85% 增至 92%。換言之，公營醫院服務在整個醫院服務市場所佔比例一直增加，這點我肯定不是我們原先設計醫院管理局的目的。究竟整體的規劃和政策應如何發展呢？我很希望衛生福利科可以在這方面及早做一些工夫，以免醫院管理局繼續發展，而最後可能影響整個醫院服務的市場。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發言支持麥高樂爵士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很多議員已就各方面談論了不少，我只想用很短的時間集中談談兩件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政府能多加關注。

首先，我想談談許多，也不知是多少萬，由公帑養活的人士，第一批當然是我們 19 萬的公務員。主席先生，我相信大家都會承認，香港人對公務員非常好。他們的待遇優厚，薪酬福利相信在全世界必定是數一數二。與英國相比，香港總督以及司級官員的薪酬待遇遠較首相及內閣大臣為高，這是我們多年來任由公務員的薪酬「突飛猛進」的結果。也許政府在回應時，可以向我們解釋為何我們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其實，我相信市民都會覺得，我們多付些錢去養活我們的公務員也無可厚非，如果他們能很專業及很有效率地工作，沒有出現嚴重的貪污問題，又不是太官僚的話，也算是物有所值，我相信市民也同意這點。可是，最近政府也承認有些公務員屍位素餐。我極力支持政府盡力將那些所謂長期表現欠佳的人士請離公務員行列，因為我們希望公務員都能盡忠職守，在拿取納稅人的金錢後，真正盡力替我們做事。因此，我希望政府盡快在這方面展開行動，去蕪存菁。此外，對於政府宣布會簡化紀律程序，對付做錯事的公務員，我亦表示歡迎。我希望政府告知納稅人，它會打破公務員的「鐵飯碗」，令真正稱職的人才可出任這些職位，享受這樣好的待遇。

其實，主席先生，我們所說的公務員薪酬福利包括了些甚麼呢？有關這點，納稅人可能也未必清楚知道。簡單一看，這當然包括公務員的底薪、毋須供款的退休金計劃、年假、醫療及牙科福利，以及房屋津貼計劃等。以上種種福利，立法局議員當然不能過問，不少在私人機構做事的員工都不能享受得到。不過，我覺得政府應該馬上就一、兩項福利作出調節。第一項就是公務員子女的海外教育津貼。主席先生，政府建議在九五至九六年度動用納稅人 30 億元，以供這些公務員的子女到外國讀書。我相信已經答應了的事情是沒法改變的，因為這是服務條件。不過，我覺得這種奢華待遇不應繼續存在。我已請政府考慮將海外公務員及本地公務員的服務條件統一，就算未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我覺得政府應馬上考慮拒絕向新加入公務員行列的人提供這項奢華的待遇。納稅人的金錢是不可以亂花的。政府亦建議在來年動用 1 億元，作為海外僱員和首長級官員及其家屬的旅遊津貼。請問這些錢是否值得花呢？我知道我們當然應該善待我們的公務員，否則，就會給

人批評說打擊公務員士氣。其實，我自己預期明年會有很多公務員離開，在私人行業亦會出現同樣情況，這關乎九七問題，相信亦是中國政府須面對的問題，香港人亦須作出心理準備。不過，我不相信稍為調整公務員的福利薪酬就會打擊他們的士氣。因此，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三思，有些支出應「慳得就慳」，因為納稅人的金錢得來不易。事實上，一些公務員跟我說，他們決定九七的去留，又或會否在這一、兩年提早退休，最重要視乎行政長官的人選而定。因此，我希望中國政府在這事上要三思。不過，對於去除公務員的「肥膏」，減少各方面的津貼，我自己則大力支持。

主席先生，除了公務員之外，我們亦很關注另一批人。昨天我提出了一項有關醫管局員工的立法局提問。他們的條件和福利可能較公務員還要優厚，因為除了薪金之外，他們還可得到一項可以高達底薪 60% 的現金津貼。這筆津貼是彌補他們有些以往是公務員所得的福利。由於他們再不能獲得那些福利，所以兌現成了現金，這項開支絕對驚人。政府昨天在答覆我的問題時解釋說這是一項獨特的計劃，用意是鼓勵政府及補助醫院的人員加入醫管局。有些人說是獨特，有些公務員則說這是一個錯誤，不應永遠再錯下去。最近我很高興聽到醫管局說在未來三年會裁減人手 20%，我希望它能盡快進行，如果有冗員就應該立即剔除。政府說有很多事情定了下來就不可以再改，例如工作條件，但這是否屬實呢？我希望政府用心想想這問題，是否還要繼續給予新加入公務員行列的人如此優厚的條件。我相信納稅人並不希望政府過分慷慨。

主席先生，第三種人就是那些高薪厚祿，天之驕子，住在象牙塔內的高級知識分子。我說的是 6 間大學與嶺南學院，即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數間大學的教職員。這批人士，特別是教師的薪金亦在這十多年間「突飛猛進」，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薪金與公務員掛鈎。公務員的薪金升得比天高，他們亦然。我希望政府在回答時，證實本港大學付給他們的薪酬和津貼在世界數一數二。但很奇怪，本港大學的水準在國際上卻不是數一數二，所以出現了入息與表現不相稱的情況。從納稅人的角度來看，這樣就有些問題。如果付出了這麼多錢，為何我們大學的水平不及哈佛和牛津等學府呢？有關這事，我希望政府能三思。

主席先生，你也可能知道最近數間大學的公積金出現了財政困難。有關這方面，政府說這些大學的校董會難辭其咎，當中可能牽涉在座的一些同事，因為他們是各間大學的校董。在上星期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官員更指出，有關院校的校長或校董會成員可能會因此事而須入獄或罰款。我相信當本港的學生爭取加入校董會時，他們造夢也想不到要入獄，不過，現在他們如夢初醒了。希望大家「勒緊褲頭」，想想辦法解決這問題。不過，主席先生，有一件事，我的立場很清楚，我相信公共帳目委員會所有成員的立場亦很清楚，而政府亦知道，就是它千萬不可以要求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撥出納稅人的一分一毫挽救他們。我希望政府會與他們找出一個解決方法。這件事反映出這些大學的監管不足，政府一聽到這批評，就會立即回應說院校擁有高度自主，政府不會作出干預，其實我亦同意這點。主席先生，我覺得若政府不應干預大學，那麼誰人負責監管呢？這個責任自然落在校董身上。如果政府委任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作校董，他們只圖虛名，不做好實際的監管工作，那麼我們向誰人問責呢？因此，我希望所有接受政府委任作校董會成員的人士考慮清楚，否則，大學的校務就會任由一小撮人為所欲為，出現很嚴重的問題。不過，我重申，納稅人並不應該，也不需要承擔這責任。

主席先生，我想談論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頭號敵人——房屋問題。以往數年來，當財政司徵詢我們的意見時，我屢次跟他說，房屋是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財政司在今年或以往的財政預算案中並沒有很落力對付這問題，我覺得很遺憾。我的辦事處所接獲的市民投訴當中，有三分之一與房屋有關，我相信其他有處理市民投訴的議員辦事處所接獲的個案比率亦差不多。首先，我已多次提出，私人樓宇價格仍然非常高，遠遠超乎很多市民的負擔能力。房屋司上星期亦向本局說，現時樓價比去年四月的高峰期低了 14%，比九三年一月的樓價仍然高出 37%。因此，我希望政府了解到樓價仍然過高，並不可以接受。

此外，我相信最重要是有關公屋的問題。我們也知道，現時輪候登記冊上還有 16 萬人。政府去年作出承諾，說這批人平均須等候 7 年才可以「上樓」，至二零零一年，等候時間可能會縮短至 5 年。主席先生，這些香港人住在這樣惡劣的居住環境，要等 5 年或 7 年才有機會「上樓」，請問財政司這情況是否可以接受呢？此外，你們口口聲聲說要照顧高齡人士，但單身高齡人士入住公屋亦要等 4 年，我不知道你們覺得這樣是否可以接受。我希望當總督彭定康先生下一次出巡時，你們會帶他看看這十多萬正輪候公屋的人住在些甚麼地方。在那些居住環境下，試問總督是否願意住上 5 天或 7 天，更不要說 5 年或 7 年。

主席先生，最後我亦想談談居者有其屋計劃。我本人非常贊成居者有其屋這個概念，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在香港沒有物業。其實，我很支持出售公屋計劃，但由於各種原因，這計劃現已胎死腹中。我想如果可以的話，政府應盡量推行這計劃，否則，我希望政府能擴大居者有其屋計劃，將價格調低一些，令更多人可以受惠，當然亦可吸引公屋住戶退回公屋單位，遷進居屋。這個做法除了可以加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外，亦會令他們愛惜自己的物業，好好保護整個屋邨的環境。不過，財政司快將離職，這個任務當然落在下一任的財政司曾先生的肩上，我不知道是否要等五年、七年、十年抑或十五年才能得到解決。

主席先生，最後，我與其他同事一樣，要向財政司致謝，特別是財政司這數年與我們在本局共事時，均有諮詢我們的意見，我要向他致謝。相信當他退休後返回蘇格蘭的故鄉時，偶爾想起香港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蹟，也會感到自豪，但他亦應知道香港人待他與他的家人不薄。不過，我希望財政司知道，我會懷念他，他是我敬仰的一位公務員。我更欣賞他在退休後沒有加入本港的商界工作，因為我覺得高級公務員加入商界會有利益衝突，甚至往往予市民官商勾結的印象。當然，有些人不可能離開香港，要留在香港工作，但我希望所有的退休官員必須自重。主席先生，接着而來的最後 800 天過渡期會非常動盪。我當然希望麥高樂爵士退休後生活愉快，我更希望新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好運，也希望香港人好運。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林鉅津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除了被公認為四平八穩之外，亦給人一種強烈的政治現實感，明顯是爲了要預算案順利通過立法局而設計。在稅收的寬減和民生的支出上，都很明顯地爲各政治派系「分餅仔」。對於財政大勢，我認爲在目前香港幾個大命脈正在轉變的形勢之下，財政預算案應該作一些特殊的評估和指引。我所指的大命脈主要包括 5 點：

- (1) 香港工業式微外遷，工業用地拍賣無人問津引致工業所創的財富縮減；但四十出頭的傳統手作工人面對轉業困難，失業人數增加，將來必然影響福利支出；
- (2) 香港經濟轉型遇上本地合適的服務人手不足，輸入勞工又困難重重，商賈難以大展鴻圖；
- (3) 九號貨櫃碼頭施工無期，但轉口業又面臨附近鹽田港廉價貨櫃場明年全面投入服務的競爭；
- (4) 銀行借貸進入高息期，還要面對取消利率協議所加劇的競爭；
- (5) 股市大幅滑落，同時香港又引入港人不熟悉的新金融工具。

凡此種種，都會深遠地影響本港未來幾年的經濟動向和財政發展。我認爲政府下星期作回應時，須要提供具體數字，用以評估來年各項經濟的前景。

爲滿足各政治派系要求而所分的「餅仔」，從各方反應來看算是頗「得體」，基本上政府是以經濟增長的收入，加強在民生上最迫切的支出。我相信社會各界人士會認同這種做法，所以我會支持今年的預算案。

我今次的發言，主要針對幾個不大明顯但又非常重要的範疇，要求政府正視：

第一是毒品問題，總督已經承認了過去的策略不見成效，今次財政預算案應該從新調配資源去對付。其實，一向緝毒掃毒的做法只是治標，治本的工作應從教育着手。但這方面的支出每年只有 200 萬元左右，等於治標費用的四、五分之一。反觀毒販，單從海洛英所得的利潤，起碼每年 4 億元，可以供他們推廣販毒的業務。目前，進行治本工作的志願機構的經費是由社會福利署審議，卻由保安科代爲爭取。一向保安科就不承認毒品是香港的大問題，所以替社會福利署爭取禁毒資源時，態度素來並不積極。今年所爭取到的資助，就只有要求的十分之一。有些機構要靠社會福利署的剩餘金錢來過日子，社聯今年在這方面的經費就不足夠請一位主任，更毋須考慮聘請其他的助理和文員。明年的經費是毫無把握，去年肯屈就的職員，今年亦相繼辭職。在這方面，政府應該在今年財政預算中，仿照預防愛滋病的辦法，成立一個反藥物濫用基金，可以仿效外國由充公得來的毒販財富撥入，估計基金只需 3 至 4 億元就足夠，每年自動滾存，用利息或增值去推動禁毒教育，推算每年會有數百萬元可支取的經費，這才是長遠解決資源問題之道。

我在聖雅各福群會的工作，證明在香港實況之中，預防疾病是促進健康和節省醫療支出的有效方法（政府亦同意）。這兩年來，我多次指出政府推行老人保健的步伐太慢。到聖雅各福群會要求參加保健者的輪候期足足十個多月，供不應求之勢早已形成。但是政府在南山村的老人診療所，雖然收費是我們組織的三分之一，可是在一年服務 3800 人的目標之下，去年四月至年底的 8 個月之中，只有 690 人接受服務。形勢是聖雅各福群會其門如市，而南山村則門堪羅雀。箇中關鍵，我看是因為政府模式中資源與服務形式脫節。這可以用具體數字去證明：市民去政府診所看病，每次只付 29 元，就算去私家醫生處就診，診金連藥費，亦大約只需 120 元一次。不過無病的老人去南山村檢查，服務形式和有病看醫生一樣，也沒有防病必須的驗血環節，卻要付 220 元，消費者無法看得出箇中價值。雖然這等診療所還有太極班之類的支援服務，但這些活動在公園友好幫助下進行，反覺價廉而有趣得多。政府必須從用者角度把資源與服務重新配搭，否則那 7 間老人健康中心全部落成之後，只會淪為職員織冷衫的場所！

在醫療資源上，我認為政府必須確立一套完整的服務哲學，明確釐定一般醫療與罕有疾病醫療兩者的目標資源與取向。今年預算案有個新項目，是「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耗資 8,000 萬元。我去年指出，一般醫療經費是以小本醫多人，這方面必須給予足夠保障，每年跟隨醫療通脹及市民需要來增加，給予大多數病人所需的照顧。但是有少數病人患有較為罕見的病症，需要高科技治療，這是以大經費治少數人，原則上要作適當安排。但不能對醫大多數病人的小本有所侵蝕。所以我曾經要求為高科技醫療設立獨立預算，每年按經濟情況而定總支出，按個別病情緩急去定先後，今年的「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是正確的開始。至於何種病症應該在香港自行培訓技術，何者需要到海外就醫，必須就個別病症考慮，達致較高成本效益。8,000 萬元的金額應該按香港的經濟情況調整，並且配合個別醫院的籌款計劃，連同支付個別病人的高昂醫療物品，例如人工關節，以解決目前棘手的「逐項收費」問題。

至於醫管局的支出，我素來覺得藥物和儀器的比例偏低，醫療通脹高速增長是因為新儀器新藥物的價錢飛升。今年醫管局內藥物和醫療的支出仍然只佔其總支出的 17%，顯示醫護人員的薪酬支出跟醫藥與新儀器的通脹幅度相若。醫管局成立之後，前線工作人員倍感吃力。醫管局明年增加的 1800 人之中，有四成不是前線工作人員，對直接治病的工作沒有減輕。我去年呼籲醫管局人手精簡化，已經判給外面經營的部門，例如洗衣服人手，須要整頓。今年遇着新主席上場，銳意按私營機構的模式進一步提高效率，考慮精簡行政人員正合時宜，亦是政府控制醫療通脹的可行方法，使能多留些資源用在改良藥物和新儀器方面，直接惠及病人。

今年預算案中，有一項我認為最無道理。政府去年在毫無科學根據之下，肯定了當時所有新舊醫院的焚化爐不合規格，甚至不惜拒絕發牌給全新落成、全港最大的東區尤德夫人醫院醫療焚化爐，白白浪費納稅人幾百萬元。取而代之以興建一所中央醫療焚化爐。又在多項美國科學研究證實家庭廢料與診所廢料有相同傳染力之下，一口咬定診所廢料須要付款給特別運輸公司去收集。這種做法必然促使醫療成本增加，而且冒着在運輸過程中增加細菌傳染的危險，把廢料運到屯門集中處理。美國的研究就充分顯示，越是複雜昂貴的醫療廢料處理方法，越是打擊病人正確處理醫療廢料的意欲，造成更多非法棄置的反效。

果。醫管局曾經按政府指示，用實物去計算將來的醫療廢料數量，發現廢料總產量不及顧問公司所估計的三分之一，顯示將來焚化爐不能以顧問公司的估價達到收支平衡。不過政府仍然照原來的數字去設計，並準備在今年簽署興建該焚化爐。這座焚化爐的設計，完全缺乏科學根據，卻是符合將會承建該焚化爐的顧問公司的興建能力，將來會否很快受淘汰，亦屬未知之數。這所斥鉅資只為顧問公司而興建的焚化爐，看來會成為以前「海水化淡廠」的「廢料化氣廠」翻版，增加醫療成本，加重市民和病人的負擔，是全個預算案之中最差的一着。

在收支平衡上，我同意政府在各方面壓力之下堅守理財的底線，不讓支出增長超越經濟增長。我亦同意政府在這底線之上，財政有盈餘是不該花光，而是應該照預算案第 5 段所強調，把盈餘留在納稅人口袋裡。財政司應該認真考慮自由黨提出的擴闊稅階的建議。我不同意馮檢基議員剛才倡議增加利得稅，因為不少外國經驗顯示利得稅率越高，長遠的總稅收便愈少，原因是投資會轉到其他地方，反而增加了本地逃稅避稅的問題。所以，世界的潮流是降低利得稅率，去爭取增加總稅收的金額。

主席先生，自由黨倡議「經濟主導，關注民生」，我關心的是公共資源用得其所；李鵬飛議員昨日指出，工商業蓬勃發展會令香港市民受惠。經濟發展會為香港帶來更多用於民生的資源。這樣才是改善民生基礎的關鍵。

「分餅仔」遊戲其實包含一種協調藝術，沒有任何一方會完全滿意。但如果能夠減省無謂開支，連分餅仔時掉出來的餅碎也兼收並蓄的分給各人，相信可以令到各方面的滿足感再大一點。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杜葉錫恩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文世昌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就文康、藝術、保護文物方面發言。政府在去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曾白紙黑字發表對藝術及文化發展的承擔，矢志推動文藝發展，並且說保存及保護香港的文物及歷史遺跡，可惜我們只要看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可以充分證明這只不過是講一套，做一套。既然文康廣播科承擔了推動藝術及文化發展的重大使命，而施政報告亦已承諾會投入大量資源，政府又為何要削減文康廣播事務的撥款，導致文康廣播科的人員比以前更加減少，影響工作計劃的開展和進度？

此外，文康廣播科強調增加對視覺藝術及文學藝術組織的支持，是來年工作重之一，可惜在這方面撥款只增加 600 萬元，很難想像這連通脹都追不上的 600 萬元，是否真正增加呢？文康廣播司曾經公開強調，電影不是粹純的藝術形式，而只是各種藝術形式的綜合體，又說電影是工業，要自己照顧自己，因此，我們看到的是政府每年只是撥款辦好電影審查，或修訂電檢條例。文康廣播司還將電影藝術定性為商業、商品，是非藝術，這只是顯示政府及文康廣播科對藝術認識的貧乏。如果說電影有票房收益，而被視為一種工業，這樣文學作品有賣書的收益而又是否只被視為出版工業呢？如果政府可以資助一些另類文學，又為何不可以資助一些有藝術價值的電影呢？諷刺的就是，當布政司在外國推廣香港形象，大搞國際外交時，利用香港著名影星大出鋒頭，而對於本港嚴肅而又認真的電影工作者，他們只是渴求政府一些實質的支持，政府卻充耳不聞。多年來，業界倡議的電影發展局，據說就是因為政府的高官和高層沒有共識而又被束諸高閣。政府縱然資源有限——我們很明白應該有方向和有底線，也不可能資助每一個範疇——但在取捨的時候，政府的理據亦要能服眾，不應該既說要推廣藝術發展，又對某些重要的藝術範疇完全漠不關心，甚至袖手旁觀。

接着我想談談保存古物古蹟。預算案在這方面撥款比去年增加 4%，明顯反映政府並不打算擴展對古物古蹟的工作。但事實證明加速搜尋及保存古蹟的工作已經到刻不容緩的階段，無論是政府或私人所擁有的深具歷史價值的古舊建築物，都在發展經濟的大前提下一一被拆卸，令香港成為一個沒有記憶、毫無歷史感的城市。

香港市民的物質生活已達國際水平，但市民在精神生活上，尤其是歷史意識方面，卻非常貧乏。這要歸咎殖民地政府過去對古蹟保存及修繕工作之不足，逐漸剷除了香港的歷史面貌。與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淵源的青山紅樓，究竟能否成為法定古蹟的歷史公園，就要看政府在這方面有否足夠的誠意，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要總結這個財政預算案對文化及藝術的撥款，可以說連追上通脹這象徵式的增加都沒有，如果政府對文化藝術的發展仍然抱如此短視的見解，長此下去，香港文化藝術的前景只會更加令人憂慮，更加無從可以發展，遑論突破或者起飛。

政府在古物古蹟保護的工作不足，更加使我們警覺到，政府對自然保護和自然保育都是乏善可陳的，因為我們知道自然環境及天然資源是市民重要的財產。為了建設整個社會的大型工程，隨着香港的經濟起飛，我們其實已經犧牲很多美好的自然環境，現在很多人都已清楚看到，破壞大自然而得到的發展，將來或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可以彌補我們所失去的東西。我們應要以「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兩方面去配合持續經濟增長。可惜到現時為止，香港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環境保育方針，只是沒有系統和零碎地執行所謂的保育工作，各部門並沒有制定一致的環境政策目標，部門與部門之間亦沒有系統和具體明確的保育政策。保育政策不是紙上談兵，它其實是一個極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動才會有成效的策略，政府不可以以為成立了環境保育基金後，就可將責任推到民間團體、民間組織，由他們去推動。我懇請政府在未來的預算案及來年財政撥款，提供必需的資源，令香港保育政策真正能夠徹底落實。

我只想用郊野公園作例子說明這一點，郊野公園的存在和監管，其實是保育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環。一九九三年「全港發展策略」中已列出 14 處有潛質地點可劃定為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可惜政府稱因財政資源不足，在新的財政年度，沒有可能把這 14 個有潛質地點劃成新的郊野公園。但我們看看資料就知道，如劃定該些郊野公園進行管理，只需 218 位人員，費用約為 2,600 萬元。在 5 年內的資本性開支為 8,000 萬元，經常性開支為 250 萬元。如果以 5 年計算，對現在有不少盈餘的政府來說，所需的金額其實是非常少，但對市民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資產及非常重要的休憩及戶外資源，我希望政府可以正視這個問題，在來年確實增加發展郊野公園的撥款。尤其是望穿秋水的港島西區龍虎山的郊野公園和大嶼山北的郊野公園，市民其實很渴望政府能夠早些撥款，使到有資源能夠將這兩個地方成為市民可以享用的郊野公園。

財政司麥高樂爵士亦在今年總結政府的理財哲學，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名詞，就是「共識資本主義」。在預算案的首頁，財政司說明「這種共識，是我們明白到必須鼓勵自由進取及競爭，同時促進公平及扶助有需要者」，財政司似乎認為香港是古典經濟學派的典範，透過自由競爭，達致經濟繁榮。這種思維其實與「積極不干預政策」一脈相承，但可以講比積極不干預政策有進步性的，就是說在一個不完美的市場環境，政府希望透過一些措施，「促進公平及扶助有需要者」。但香港政府在經濟上參與的角色是保守的，只希望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但卻忽略了在經濟發展至今天的香港，政府的政策不應單只是監守遊戲的公平，而應該影響遊戲的結果。我們試看香港中小型企業面對國際市場強大競爭，政府除了在稅務上提供較低的稅率外，我不知道政府作了甚麼來增強中小型企業的競爭力。在基本研究方面，香港遠遠落後於其他地方，尤其是鄰近國家，而政府一直將科研促進經濟發展放在一個非常低的優先次序。對於一些服務業例如電影業、旅遊業，政府完全沒有長遠的政策去令這些行業進一步發展，而他們在面對困難時，政府亦說不出可以提供哪方面的援助。

至於政府的社會政策方面，「扶助有需要者」仍然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實際上不少失去競爭能力的老年人極需要政府的扶助，卻得不到太多的回應。因為經濟轉型而喪失競爭能力的工人，亦不見得政府對他們有很多的扶助，反而港府的輸入外勞政策使他們憂慮飯碗不保。本人真的希望財政司麥高樂爵士及候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在「協調共識創繁榮」的口號下，多扶助基層市民及缺乏競爭能力的小市民。「協調共識」不應只限於官府及商界；而「創繁榮」的成果亦應該讓廣大市民分享。

李家祥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

誰謝誰，誰該謝

立法局每年多謝財神，但受「禮」的財神，卻不可以因此沾沾自喜，奢望議員會「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就算是交足了功課。本局的評論仍然是彈多讚少，似「界分」多過代表公眾向財神道謝。難得的是財神本身仍然落落大方，將這個不健全的政制現象，力證成爲一種「進步」，更開宗明義地反過來在預算案中事先向議員致謝，收買好感。四年以來，不知其他議員對財神爺這些稱謝有何感受，但本人多少也覺得有些「受之有愧」。

爲香港創造財富的並非政府，亦不是議員，而是辛勞的市民，尤其是工商界。他們不單創造財富，亦爲政府斂藏盈餘。以往財政司都不忘殷勤多謝他們的貢獻。但麥高樂財神只記得多謝「鬧」他的議員，而候任財神在宣布任命後第一件事，就是向女記者送花，只顧政治學問，而完全忘記了市民及工商界的真實貢獻，最值得多謝，所以先扣 5 分。

今年預算案之準，和這四年間的中期預算變化之大，形成了強烈對比。但預算不準亦並非全是壞事，尤其是對將來儲備所作出的預算。港人常比喻本港工商業爲會「生金蛋的鵝」，原來預計生兩打金蛋，現時生了 3 打，本來應該「讚」也來不及，還如何來苛責呢？

偏偏本局就有如此本事，蛋裏面挑不出骨頭，就不妨「鬧」隻鵝食得糧（利潤）多，蛋（政府支出）生得不夠大，不夠圓，連負責看鵝的財政司都不放過，去年財政司就可能是多少受了影響，對議員客氣之餘，背轉面便向我們市民中最勤奮、最有生產力的小眾納稅人「喊打」，將稅基收窄，要夾心階層和高收入人士加重稅務負擔之餘，更搬出要打擊「避稅」這頂大帽子，以新法例去針對這類人士在現時合法情況下慣用的服務公司，加強「壓榨」付款的能力，今年雖然已沒有那麼兇，但在政治上「欺善怕惡」，仍然要再扣 5 分。

言聽計從，正中紅心

除此之外，財神對本人在諮詢期間所提的建議，差不多可說是完全「言聽計從」，預測盈餘數字「正中紅心」，原本應值 100 分滿分，扣了 10 分，現在也應輪到解釋一下得 90 分高分的原因。

在財政司諮詢議員期間，本人基於本港的財政儲備豐厚，中港兩地政治在短期間可能出現不明朗，中國經濟在宏觀調控下有放緩趨勢，再加上當時中美貿易商討問題上出現的緊張關係，所以，力主在理財策略上應盡量以「保留實力，不變應萬變」爲基本原則。

政府支出方面，本人提出加強資助學前教育服務培訓，要求對福利服務資助的實質增長不少於 10%，提高兒童綜援金及維持對營舍服務的合理資助等，政府在各方面都全部一一兌現。

作為一個講道理的議員，答案對，就當然不應賴帳。對本人代市民提出的合理訴求得到積極回應，在此我一向財政司致謝。然而，本港的社會需要，並非停滯不前，市民的訴求還是會「一浪接一浪」的接踵而來。就是在財政預算案的諮詢期後，即九四年十一月中至現在，本人亦如其他議員一樣，對支出項目增加了期望，但本着公道的精神，本人將不會用這些事項，來作為批評今次預算案不足的武器。本人認為更合理的做法，就是議員將這些在諮詢期間後才公開提出的訴求，清楚劃分，在今次辯論中明列出來，作為一九九六年預算案應優先考慮的事項。就本人而言，已公開了的要求包括：

- (1) 對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的互保基金及改善未來 3 年綜援金計劃，注資不少於老年金原來所提出的 100 億元；
- (2) 加速社會福利白皮書在增加家庭服務範圍下所訂的目標，將個案工作人員的數目提升以應付日漸增多的需求，將他們要應付的個案數字減低到 65 個以下；
- (3) 盡快提供每校一社工，幫助青年人應付日益嚴重的吸毒、黑社會和情緒困擾等問題；
- (4) 每校增添一名全職負責課外活動的老師；及
- (5) 提高幼兒服務員的培訓及薪酬，以達至與合格幼稚園教師統一水平。

車轉低波，平穩過渡

不少議員形容預算案為平淡無奇，其實預算案中，亦有給予市民一些意外驚喜，近者，是政府大手筆的 25 億元撥款，用以購置樓宇作為福利用途，加速服務的提供，值得替市民稱謝。中期預測更顯示出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財政儲備將會高達 1,510 億元之鉅，較去年預測多出 310 億元多，反映出近年來的經濟實質增長強勁，未來 3 年的預測仍然樂觀。如果只以「平淡」來形容這些突出的顯示，我相信本局便應先反省一下，是否政治上的短視，容易令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財政司發表了預算案後的當日，本人立刻以「轉低波，方便港府下車，中方上車」為比喻作出回應。財神的進取遠見，中期預算制訂的功夫精心細緻，對現時緊密的理財策略交代全面，在堅厚的財政力量作為穩定人心的條件下，把握時機，提出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中國政府的詳盡建議，更獲得中國政府正面回應。這些前瞻的方案，由一位無奈「公務員要本地化」而被迫退休的財政司來提出，更顯得麥高樂爵士的氣量過人，未因離任在即而失卻為港人「盡心盡責」的忠誠，理應被視為公務員的典範，應為市民賞識。

堅守理財策略，平實中見真章

本年度預算案有些意外驚喜，有進取遠瞻的方案，但都不及財政司刻意的平淡無奇，平淡無奇才是最能表現他「堅守理財策略」的「真正章法」。財政司不厭其煩地詳細描述整個財政預算過程，鉅細無遺的去重申、確定他的財政預算策略，更高度強調那是「明確和前後一貫」的，經過考驗的「共識資本主義」，再加上近乎「刻意」的「墨守成規」，在本年度的預算中來個跟上年一般的「依樣葫蘆」，是平淡無奇嗎？還是「轉低波」，好讓各人看清楚他持以成功的秘訣，留個「深刻印象」，再請大家不要「輕舉妄動」。

港人重視安穩，必定期望中方不要在未能充分掌握本港的自由經濟運作之前，妄作改革。循規蹈矩，再加上大量儲備，就是平穩過渡九七的最佳保證。熟悉工商管理的議員，都必深明此理。至於其他凡事都信奉改革的議員，相信財政司和本人都一樣，希望他們在未來兩年多，深思才後行，不要在九七未到之前，已先將這些由不少專業官員多年的心血累積下來的寶貴經驗，一套已證實有效可行的整體理財哲學，去皮拆骨。

共商預測，增進信心

運用預測技術，作為對未來經濟的窺視，肯定風險滿途，從以往4年的中期預測變化之大可見一斑。其中基本工程時間表的推遲，在中國經濟帶動下，本地生產總值的強勁實質增長，地價的大起大落，都令預測數據大幅失準。但若了解在自由經濟社會的體系中，預測只不過是一種用來展望以及評估未來的工具，以助應付出現不明朗的情況時，可作出快速應變，其意義便是重於在制訂過程中的宏觀啓示作用，到最後的結果準確與否，反而是屬於次要。

在此大前提下，本人提議港府應盡早向中方公開本年度所制訂的中期預測資料，並邀請中方參與共商制訂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七年預算案的中期預測部分，令中方有機會及早了解本港經濟的未來宏觀圖像，「自由經濟」以及與「計劃經濟」的具體不同之處，中英在商討賣地計劃、機場鐵路等財務安排事項時，中方亦會對這些安排的延誤對本港整體財務的中長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清楚掌握。當然，港人以及海外投資者更期望中港雙方能最終就中期預測達成較一致的看法，讓他們跟中方一樣，能夠對本港的前景有更清楚的啓示，更有信心地去策劃投資。有關的合作，肯定有助穩定過渡期間的經濟發展。

值得順帶一提的，是兩項與預測有相當關係的論點，是本人早在一九九二年的預算案辯論中已提及的：

- (1) 國民生產總值(GNP)：港人有鉅額財富藏於海外和珠江三角洲，以「本地生產總值」去量度港人的財富實質增長及付稅能力，有可能會有持續低估的傾向，而政府亦在一九九三年同意研究制訂國民生產總值(GNP)作為另外參考的指標，預計應在一九九五年底有初步結果。本人期望會在一九九六年的預算案中兌現。

- (2) 機場核心計劃作為一項獨立記帳項目：原則上政府已接納了本人的提議，除政府注資部分外，將該計劃的收支部分在預算案之外，由臨時機場管理局作獨立帳目處理。但這項極重要的計劃，除了在一九九二年六月時曾經向本局提交過一次較為全面的商業計劃預算(Business Plan Summary)外，就由於中英雙方在財務安排上未能達成協議，再沒有向本局作出進一步全面交代，事情發展到現在，恐怕那預算已是面目全非了。本人要求財政司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快為這項預算案中未能有所交代的重大計劃，向本局提交修訂的商業計劃預算，尤其是該計劃注資的可能時間差誤，沿線批地計劃，以及其他商務收入的部分等，對現時中期預算所可能產生的重大經濟影響。

政治表現，貴乎真誠

去年辯論中，我曾經說過財神手執千億元去實現「夢想」，但其實這也是「吃力不討好、費煞思量」的苦差。

辛勤的納稅人和工商專業人士是「生金蛋的鵝」，其實他們並不真的要接受言謝，只要「飽食糧足」便能多產金蛋、與民分享。雖然財政司只是個看金鵝的人，但4年間有條不紊，悉心照顧，功勞自在人心，本局代市民向他提出真誠的致謝，理所當然，並無難處。希望本局各位同仁，都能夠就麥高樂爵士的最後一份預算案，付出多一份真誠，少一份政治表現的衝動，在他落車之時，破紀錄的為他保一個全票，並祝麥高樂爵士和夫人，在下車的地點，找到充滿歡樂健康的生活。

代理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李永達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我代表民主黨談論財政預算案中有關房屋的問題。

今年財政預算案房屋部分，各種建議能否解決正在輪候公屋，在私人樓宇捱貴租的人士，又或住在臨屋、寮屋、天台屋的人士住屋方面的需要？

大眾都期望房屋科的成立，會加快土地供應及房屋興建，令輪候冊上的家庭能早日獲得上樓；並且監察樓市的運作，使樓價回落到一般家庭能負擔得起的水平，這些是我們拭目以俾的。

首先，我們認為房屋科有責任監察公營部門及私營機構單位的供應情況，一旦發現供應不足時，盡早採取行動以謀求解決辦法，以及監察樓市，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干預。在九四年，新建樓宇數目是34170個單位，空置的數目是40413個。可見空置的單位數目比新的單位供應數目還要多，對於此情況，政府往往以「不干預市場運作」為理由，而不採取措施對付空置樓宇的情況。政府對於空置單位沒有實施任何懲罰措施或干預措施，即使政府對所有樓宇徵收差餉，對於資本雄厚的發展商來說，實在微不足道。

發展商想出方法逃避政府訂下的規定，待樓市轉旺時才推出發售樓宇，是十分容易的事。例如地產商可將建築樓宇的施工期拖長，令他們能控制推出樓盤的時間。當政府想出一些打擊樓價及炒賣樓宇的措施，地產商就想出更多的招數對付這些形同虛設的措施。如政府再不想出辦法堵塞漏洞，即使進一步增加私人樓宇供應，亦只會徒勞無功，解決不到樓價高企的問題。

另外，房屋科預測九五年及九六年的私人樓宇產量，分別為 26000 及 27000 個，遠不能達致以往政府訂下來的每年平均生產 35000 個私人樓宇單位的目標。產量不足，以致私人房屋供應不足，是一向導致樓價高企的原因。我們期望新成立的「跨部門房屋工程行動小組」能加快發展房屋計劃，達致每年供應 35000 個私人樓宇單位的目標。我希望財政司及房屋司在下星期的回應中，向我們解釋未來實際能否達到這個目標。據悉這小組正在加快審批 19 項涉及約 32700 個單位的工程計劃。但未來兩年仍是私人樓宇的低產量期，即使這小組努力朝着此目標工作，私人樓宇的供應將會依然緊張。因此，我們認為政府除了要大幅增加土地供應，提早將土地推出拍賣外，還要實施四點措施：(1)在市區內為重建樓宇的建築期設置時限；(2)確保建築商依照時間表施工及完工；(3)密切注意內部認購的情況；及(4)增加對空置樓宇採取干預及懲罰性措施，增加空置的成本。我希望政府能對這些問題及建議作出回應。

財政司在他的演辭中說到住宅物業價格已從一九九四年四月的高峰回落，計至今年一月中，平均跌幅約為 14%。但財政司承認住宅樓宇價格明顯仍為一般市民難以負擔的，樓價仍然高企，而政府沒有採取任何特別的措施來處理。對於這個情況，政府不單只沒有提出更多具體措施去應付，更斬釘截鐵地宣布政府並沒有計劃對樓市作進一步干預，對於財政司的說法，我們實在不敢苟同。首先，政府在去年六月推出的打擊樓價措施，僅令炒家的炒樓成本增加少許，當時我已批評過該等措施是軟弱的建議，絕不能說這些措施已「杜絕」了投機炒賣活動。另外，連財政司亦親口承認，即使樓價較去年高峰期下跌了 14%，樓價依然高企，是一般家庭不能負擔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的樓價仍較九三年一月的樓價高出 37%。可惜的是，財政司不單沒有重申打擊樓價的重要性，反而在未諮詢本局和市民的情況下，宣布將打擊樓價措施凍結，仿如「入土為安」。明顯地，物業市場在受到財政司的鼓勵下而再度熾熱。財政司可以看看，現時有很多人再次排隊輪候購買樓宇，這種樓價見底的羊群心理，與預算案打擊樓價措施的軟弱立場，不可說是沒有關係的。政府在此是否可以不做任何事呢？政府事實上應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在九五至九六年的賣地計劃中，撥出較去年更多的高密度住宅用地。既然政府認為增加土地供應是長遠調節樓價的經濟手段，政府必須落實這個承諾，我希望政府在回應時對明年批地作出一些預測。

財政司在預算案說明，樓價高企是通脹高企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卻宣布打擊樓價措施停止，這種做法有如「搬起石頭砸自己腳」一樣。我想問財政司，他仍想樓價高企，通脹高企還是希望樓價回落，通脹回落，抑或如現時一樣三心兩意，立場不定？

代理主席女士，最近很多中方人士、預委會成員及地產商對市區填海問題提出強烈質疑，他們表面說是擔心海港安全環保問題，但我認為真正原因是他們想遏抑本地土地供應增長，使他們已擁有的土地儲備價值大大增加，他們是以私人利益去反對香港填海工程計劃，我有一點疑問，這些填海工程已在多年前開始規劃，而有一些已完工，為甚麼到現在才說這些填海工程因跨越九七而要諮詢中方？

這明顯是將「中方有權過問港府事務」無限上綱及透過中方政治干預，達到剝削中下層，而只會養肥地產發展商及資本家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希望政府以長遠土地供應為原則，不要屈服在中方及預委會壓力之下。

公屋和居屋的供不應求，在本局已辯論過多次。可惜在上次立法局動議辯論出租公屋的土地供應時，政府表示要經評估後才會作增撥土地的決定。但要知道長遠房屋策略所訂直至二零零一年的自置居所目標，現時仍欠 38 公頃土地以興建房屋單位。假如房委會得不到這些土地，除了不能達致房屋策略所訂下的二零零一年的自置居所的目標以外，亦會影響公營租住單位的供應。

至於在二零零一年前增建 141000 個出租公屋單位的做法，到九七年亦只能解決輪候冊上四分之三家庭的住屋需要，即是到九七年最少有 19000 戶還未獲安置。不要忘記，輪候冊上每年新增家庭最少 1 萬戶。據估計到二零零零年可能有 10 萬戶還在輪候上公屋。即使長遠房屋策略能如期推行，輪候冊上的家庭一般都要等上 5 年至 10 年才可「上樓」，可見長遠房屋策略實不足以應付現時房屋的需要。

房委會在今年尾，便會制訂二零零一年後的長遠房屋策略，如政府再逃避現實，曲解需求的意義，則低下階層市民輪候公屋及樓價高企的問題，只會永無休止地辯論下去。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必須制訂以公營房屋為主導的長遠房屋策略。

我們希望政府在計算需求的時候，能夠更為準確，不要有意地壓低入息限額來遏抑需求；亦不應將申請比率有意地降低。若然將這種 *come-forward rate*（即申請率）偏低的做法一而再地遏抑的話，我們只會面對這種一減、再減、三減的房屋需求的計算方式。當然，我們永遠也不能計算出一個真實的房屋需求數字。我希望財政司與各位同事想想，由一九七二年麥理浩勳爵推出十年建屋計劃至現在，已經歷了 23 年。若到二零零零年我們仍未能解決輪候登記冊人士基本住屋需要，究竟這問題須談論多少年才可以解決？我建議房屋科應制訂服務承諾，說明需要多少年才可以滿足輪候登記冊上不同人士的不同需求。另外，二零零一年後的長遠房屋策略影響深遠，涉及廣大市民福祉，我建議房屋科應在制訂工作前多作諮詢，不要閉門造車。於此，本人要求當局不要罔顧低下階層的住屋需要，令香港市民在二十一世紀仍然要活在擠迫、環境惡劣、或價錢難以負擔的居所。

代理主席女士，我要代表青衣選區居民多謝財政司、運輸司、庫務司、經濟司、工務司及規劃環境地政司，我未曾在發言時多謝這麼多人士，他們一直非常留意本人及陳偉業及青衣居民對青衣交通所提出的要求，財政司今次落實了青衣複製南橋盡快興建。我對於

這項建設非常重視及多謝政府落實此項工程。這個建設的落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紓緩青衣對外塞車，這裏我希望政府能盡力監督 3 號幹線市區段及機場鐵路，使能加快完成，而同時留意減少這些工程對居民的滋擾。

代理主席女士，最後我反映一下民主黨的同事對財政司的讚許。財政司諮詢有關財政預算案問題的會議，我每次也有出席。雖然財政司較為不苟言笑，但對議員的建議及不同意見，亦能細心聆聽，並以開放的態度考慮。雖然有時候有些難題使財政司愁眉深鎖，但看來未有使財政司前額的頭髮大幅減少，而現時的頭髮仍相當茂密，我希望財政司能以一個青春的樣貌及心境返回蘇格蘭退休。

我在此亦祝賀候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並對曾先生的開放及積極態度，表示十分欣賞。唯一使我擔心的，是曾先生的理財哲學更為保守，經常大力緊握水喉。希望曾先生能夠手下留情，對小市民在實際福利需要上給予更多的滿足。

代理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唐英年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有人說，麥高樂爵士能擔任這一任財政司是他鴻運當頭，既無股災風雲，經濟增長亦有強勁的走勢，而且盈餘充盛、儲備大增；不過我認為這一任財政司很難當，因為有人要「糧倉豐盛」，亦有人要「福利先行」；譬如去年，財政司推行減免稅務的措施，受到連日炮轟，到今年，香港經濟一開始便見隱憂，財政司較為審慎的預算案又被批評為「行騎樓底亦要帶鋼盔」，由此可見，財爺之難，並非難在「巧婦難為無米炊」，而是難在「順得哥情失嫂意」。

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幸福並不是必然的，過去幾年西方各國飽受經濟衰退的影響，而香港卻能獨享繁榮，主要是因為中國近年經濟迅速增長，同時帶動了香港的商業、金融、貿易和其他服務性行業，可是大陸經濟增長已經開始放緩以打擊通脹，香港的轉口貿易亦首當其衝地受到影響，只要我們細心端詳本港與大陸的轉口貿易額，就會發現大陸雖然仍是本港轉口貿易的最大夥伴，但增長已經不復往年那麼迅速！當然，長遠而言，中國若能抑制過熱的經濟和通脹，而又不引致經濟急劇衰退的話，當然是香港之福，但我們總不能在現階段「有風駛盡帆」地享用了多年努力儲下來的成果。

其實，財政司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已經找到了一條出路——還富於民之餘，仍保持有充裕儲備，以備必時之需，正如其收支預算案封面的副題一樣：「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這種荀子學說的精神正好在「充裕儲備」和「福利先行」的兩個極端之間，取得一條中庸之道。在荀子的學說當中，這位儒學先賢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觀，用現代的角度來看，我們大可以將之理解為「人定勝天」之大無畏精神，

我很高興財政司亦抱有此種態度 —— 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在九五年的經濟展望當中，「開始是比較令人悲觀的」，而且我們必須面對「通貨膨脹將會停留在比較高的 8.5% 水平」，除此以外，經過多年的蓬勃興旺，香港的經濟現正進入一個調整期，中國的宏觀調控措施、利率走勢、股市樓市發展，以及過渡期內的種種不明朗因素，在在影響着我們的經濟增長，故此，財政司雖然相信「九五年的商業前景大有可為」，但依然沒有大開水喉，這顯然是一種不掉以輕心亦不過分悲觀的務實態度，亦充分解釋了其控制政府公共開支不得高於整體經濟增長的積穀防饑理財策略，對於這種策略，本人是絕對理解並且深表支持的，要「人定勝天」，當然要「未雨綢繆」，這個說法，也許能為財政司在「低波行車、方便落車」，或者「行騎樓底亦要帶鋼盔」等批評之中討回一點公道吧！

我會形容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一份「平淡中見溫情」的財政預算案，特別是在健康護理方面，財政司注資 8,000 萬元用作加強健康教育及為少數罹患罕見疾病的病人提供資助，亦新增加了供養弱能人士免稅額，這雖然被人批評為「花費小小聲大大」的措施，但也不失為雪中送炭之舉；香港不是福利社會，但對於老弱傷貧者，我們亦須伸出援助之手，政府對此亦應責無旁貸。

同樣責無旁貸但政府卻充耳不聞的，就是本局對於提高公援金至 2,500 元的呼喚，我對政府以「時間不足」、「未經理性討論」以及「過分簡化的看法」作為否定本局提高公援金要求的理由，深表遺憾！

雖然財政司強調很多議員的建議都已納入預算案的範疇內，並希望我們能抗拒誘惑，不要只把焦點放在未被採納的項目上。但我仍是要表達我對預算案的一些批評 —— 因為這些都是社會人士和議員們多年來不斷要求的項目 —— 除了公援金以外，學前教育亦是一個談論已久而未有落實的課題，雖然政府已經宣布預留 8,000 萬元於今年九月資助學前教育，但眾所周知，該 8,000 萬元撥款是來自教育署的內部節省，那麼隸屬於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幼兒中心工作者又怎麼辦呢？我們不下一次聽到政府官員聲稱劃一學前教育標準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但進度如何呢？是否難到一籌莫展呢？每年四、五月便是學前教育工作者與學校續約的季節，所以時間急迫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再拖延只會令幼師和護理人員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現在已有業內人士擔心政府遲遲不公布細則以技術性問題作為拖延撥款的手段，我希望政府能夠在四月底之前以實際的行動回應這種不安的聲音。

此外，對於預算案中冷落了未來的工業發展，我亦感到非常失望，今年撥作工業資助基金的 2.6 億元之中，有 5,000 萬元是用作推展與中國有關專家共同進行的研究項目，另外 8,300 萬元則用作資助去年已經批准但仍未獲撥款的計劃，其餘的 1.27 億元今年就足足要資助 30 至 40 個新計劃，簡直是杯水車薪。

其實，香港的經濟結構發展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台灣、韓國、新加坡的競爭力如波濤澎湃，香港則由昔日的獨領風騷到今日的叨陪末座，說到底也是由於在經濟轉型期中，我們缺乏了一套長遠的、明確的工業政策所造成。當別的國家磨拳擦掌地大力發展高科技密集的經濟計劃時，我寄望我們的政府能收起現時這種不知是漫不經心、抑或是力不從心的態度，盡快釐訂一套長遠的工業政策，加強本港在亞太地區的經濟競爭力。

我非常感激財政司能開創在編製預算案之前，接見各黨議員收集意見的先河，並希望新任財政司能繼往開來，在奉行市場經濟、自由競爭與推動社會服務、保障福利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繼續香港一直以來享有的繁榮成果。

最後，我必須向麥高樂爵士致以由衷的謝意，特別是他在任內穩健而平實服務態度，我更希望財政司在卸任之後，能享有愉快而舒適的退休生活，特別是當你在蘇格蘭享用價廉質優的紅酒之時，會想起我們這班立法局中的舊拍檔，須要用較昂貴的代價方能擁有與你同樣的享受！

代理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狄志遠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在此，我響應李永達議員的呼籲和像其他議員一樣，再一次多謝財政司麥高樂爵士對香港的貢獻，雖然，我認為麥高樂爵士最後一份的財政預算案只是平平無奇，但他過往幾年在制訂預算案時，能夠聽取立法局議員及各界人士的意見，從而將市民的意願及要求與政府的工作拉近。以新界北的社區建設為例，財政司是有聽到我們的意見，撥出款項，使一些重要建設得以落實，這包括興建北區醫院、落實深圳河治理工程及加速興建大埔北區中學等。這種開明的處事手法，值得我們讚賞。

回到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希望做到「節用裕民」，我可以說預算案是可以做到「節用」但並不「裕民」。當然，中國人的理財哲學是十分重視積穀防饑的，我們不願意見到政府任意揮霍，但如果錢是用得有價值的，我們也不應吝嗇，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實在使人感到太過「節用」而有一點「吝嗇」，以致一些重要的社會建設及服務未能得到撥款落實。如果政府能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進一步改善民生項目，是有助紓緩香港貧富懸殊的不良現象，但可惜，預算案對低下層市民的民生改善所做的並不足夠，與市民的要求

仍有距離，這包括提高綜合援助金額、推行老人保障計劃、成立中央公積金及改善醫療和公營房屋等。對於上述要求，政府仍採取「拖字訣」，這點實在令人失望，明顯地，政府是未能體恤低下市民的困苦，還富於民。

對於民生改善，我想就教育服務及新市鎮發展提出意見。

主席先生，今年教育政策經常開支撥款超過 300 億元，這個項目雖然為各項公共政策組別之冠，但其實質增長只為 4.9%，仍及不上本地經濟實質增長。

今次財政預算案對教育的改善並不多，主要的發展是跟進《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但我希望指出，教統會報告書的建議祇是教育界要求改善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們希望在其他方面亦有所改善，因此教育界對於預算案未就學額不足、浮動班、母語教學、一校一社工、課程改革等重要問題作出改善，實在感到失望。

在今年的撥款中，稍為令人欣喜的是財政司承諾會預留款項資助幼稚園教育，以令幼稚園有能力聘請合乎資格的教師及鼓勵教師接受訓練，但我們對於政府到今日仍未公布有關資助計劃的細則感到擔心，擔心資助計劃能否在今年九月的新學年落實推行。我們認為如果要落實今年推行幼稚園資助計劃，時間已十分緊迫，有關方案必須在今年四月初公布細節，使家長、教師及學校能盡早作出安排。

另外，我們對於政府長期忽視幼兒中心的改善感到遺憾。過往多年，幼兒工作者都要求改善工作人員入職條件及薪酬待遇，但可惜政府對於這些合理建議無動於衷，以致浪費不少時間，現在幼稚園方面將作出改善，政府又表示資助幼稚園會對幼兒中心帶來影響，為推行資助幼稚園計劃設下關卡，這種拖拖拉拉的態度使我們感到不滿。我們強烈要求政府要盡快落實幼稚園資助計劃，並同時改善幼兒中心工作人員的入職條件及薪酬待遇，使各項改善計劃於今年九月同步進行。

主席先生，民主黨十分關注支援第五組別學校的工作。政府在九二年成立了「支援取錄第五組別學校之工作小組」，並發表有關報告書及建議。可惜，過去幾年，報告書的建議都未有好好執行，我們認為最要原因，是教育署缺乏有系統的支援隊伍及沒有足夠資源配合。

我們注意到教育署目前在 10 間中學試行「校本課程剪裁試驗計劃」，這項計劃的效果理想，取得一定的成績，因此明年這項計劃將會擴展至 70 間中學。因此，我們促請政府應該增聘足夠支援人手，並改變現時從中學借調教師的做法，轉為聘用合約僱員，令有關試驗計劃能更順利開展，發揮最大效用。另外，我們亦要求政府撥出合理資源，落實支援第五組別學校工作小組所作出的其他各項建議，使能更有效地協助成績稍遜的學生得到有效的發展。

主席先生，由於政府規劃不完善，新市鎮過去多年都出現嚴重欠缺學額的情況。為令到新市鎮學生不用長途跋涉往區外讀書，有部分學校都會因應教育署的意願，開辦額外班數及每班增加學生人數，以提供更多本區學額。

以大埔及北區為例，大部分中學正開辦多於標準數目的中一班級，另外在九五年新學年，北區有 10 間中學及大埔有 9 間中學將會超額收生。我們認為，對於地區學額不足，政府難辭其咎，新市鎮中學須要額外開班及增加每班人數，政府應負起一定的責任，對這些學校應提供額外資助，以減輕教師的教學及行政負擔。

對於特殊教育，多年來都為政府所忽視。現時，教育委員會成立特殊教育工作小組，具體研究改善特殊教育的方向，並於短期內完成有關報告書，因此，我們促請政府應預留款項，以便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建議，能夠有資源配合得以盡快落實推行。

主席先生，我是來自新界北的民選議員，希望就北區內新市鎮的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並望政府能正視及加以改善。

加強新市鎮家庭服務

新市鎮因為社區設施不足，因而引發不少家庭問題，例如夫婦不和、家庭破碎及青少年問題等。要解決問題，除推行補救性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在問題未發生時，加以預防，而政府推行發展性及預防性的家庭服務並不足夠。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在 19 區設立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利用現時社區中的人手和資源，擴大多元化家庭活動。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更加期望政府能總結過往一年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的運作，如果成效顯著，應進一步擴展，另外政府亦應撥出資源，資助一些志願機構推行類似的家庭服務。最終，我們要求每一個屋邨能設立這一類的家庭服務。

改善新界東北交通問題

新界東北現時面對的交通問題包括中港運輸頻密而引致的交通擠塞、噪音及環境污染問題、人口不斷增長而引致區內及區外交通設施不足問題，特別是對外巴士服務，這些交通問題，政府似乎未有積極面對，我們期望政府在資源運用及政策安排上，能解決上述問題。

改善鄉郊服務不足情況

鄉郊區人口正不斷老化，居住環境也變得惡劣，但政府並未對鄉郊居民提供服務，特別是老人及兒童服務，我們要求政府重新檢討為鄉郊居民提供服務的策略，以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

徹底改善新界西北區水浸問題

多年來新界西北發生多次嚴重水浸事件，造成重大財物損失，這暴露了新界渠務和規劃上的問題。我們很高興見到深圳河治理工程現正動工，但我們仍期望政府對其他主要河道進行徹底的改善工程，這包括梧桐河、雙魚河、林村河等。此外，要加強每年清理河道的工作，這樣才可全面解決新界西北的水浸問題。

主席先生，今次是麥高樂爵士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但我們期望他以開明態度制訂預算案的做法能夠延續下去。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胡紅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政府創造新詞的能力每令我驚訝不已。有了「共識政治」之後，現在又來一個「共識資本主義」。除了用「資本主義」代替「政治」之外，港府的管治模式又是否有一點點兒實質的轉變呢？

到底「共識資本主義」是甚麼意思？是否遇到爭議便退縮，只按照大家能達致共識的最低標準行事？是否對意見採取聽而不納的態度？

主席先生，我相信自由進取和競爭，亦支持一個低稅率而簡單的稅制，更堅信香港政府應該為商業界提供優良的基礎設施以作支援，但在市場運作事宜方面，則應讓最清楚有關情況的商界人士作出決定。

然而，另一方面，我卻又無法理解，何以自由進取和競爭的精神卻沒有用於「助人自助」的原則上，以培養自力更生的精神。

香港並不是福利國家，但香港社會以至香港政府都耗費了過多的時間，來討論這方面的事情，令人害怕香港會變成過份依賴福利。當然，要減低福利方面的開支，最佳方法莫過於推動每個人，令人人都像企業機構一樣，積極爭取，力爭上游，從而激勵本港唯一的資源——本港的人力資本。

主席先生，我剛才的說話，明顯地是一個引介，讓我可以解釋我提出平等機會條例草案的原因。這項條例草案背後的原則簡單不過——讓每個人都能享有同等的機會，就如商界要求的一樣。商界要求有機會打入市場，又要求公平的競爭環境，亦要求撤銷貿易障礙和清除偏頗之處。商界又要求有合理的回報。

何以有人會因為是女性、曾經離婚或者是天主教徒而遭剝削從事某些工作的機會？何以有人會因為種族問題而不能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

女人是否到了 35 歲便真的腦筋遲鈍？香港政府似乎真的這樣想。不久之前，政府的招聘廣告要求投考文員的申請人須介乎 17 至 24 歲之間。私人機構也是一樣。招聘廣告充份說明了這種可怕的想法。然而，港府不認為這些廣告有何不妥當——既不承認有問題，亦拒絕立例禁止年齡歧視。

我們有人失業，但我們的政府卻說必須輸入勞工；我們有職位空缺，但很多年紀稍大的婦女卻被摒諸門外，不能申請這些工作。

財政司指出，有助對抗通脹的因素是工作人口有令人歡迎的增加。一九九三年工作人口的增幅為 2.9%，而一九九四年則為 3.5%。去年工作人口增加約 100000 人口。既然如此，港府便應立例禁止任何人任意將他人拒於工作行列之外，這樣既可增加工作人口，亦能減少通脹攀升壓力，並更符合情理。

一個不含歧視成份的規管架構，能夠營造一個人盡其材的環境，而人力資源正就是香港唯一的資本和資產。此舉亦有助於減少輸入勞工和本地工人失業並存的不正常情況。這樣除可為同工同酬鋪路之外，亦能推動個人奮發工作，努力出人頭地，從而激發自力更生的精神，並減少福利方面的開支。每當個人就業機會遭受剝奪，社會便需要付出代價。

我促請財政司及政府將預算案中對香港的描述付諸實行：「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開放、重用能者的社會；任何人士的成功，只會激勵他人效法，而不會引起妒忌。」同時，「人人都可憑自己的本領力爭上游。」對商界和個別人士而言，政府須確保「我們能夠維持一個可創造繁榮和促進競爭的環境。」擁有強大原動力的工作人口，必能為本港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積極投入的工作人口亦自必會期望獲得公平的待遇。

主席先生，其中一群生活艱苦的人，就是那些飽受慢性疾病及長期頑疾煎熬的病人。假如他們沒有獲得任何財政援助，以作手術、特別治療及購買醫療用品之需，他們的生活可真是苦不堪言。雖然領取公共援助的病人可以申請撥款資助某些醫療項目，但並無領取

公援的病人卻甚至無法獲得所需的醫療服務。由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的撒瑪利亞基金可以提供一些援助，但是據我所知，現時連撒瑪利亞基金亦已耗盡。有些病人會努力工作幾年，冀盼能儲得足夠金錢，購買一個人造關節，但到頭來，卻發覺通貨膨脹已將他們的儲蓄蠶食，儲得之數僅足以支付舊價。

對於這群努力自力更生的人士來說，要生活就得苦苦掙扎求存。我在此懇請當局制訂具體措施協助他們。我希望薪俸稅的供養弱能家屬免稅額可以照顧到這群病人的手術、治療及購買用品所需的費用。我亦要求當局考慮根據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給予他們援助。我同意梁智鴻醫生的看法，8,000 萬元的撥款實在是不足夠。我促請財政司考慮成立一個醫療貸款基金，向那些有固定工作但卻未能追上通脹的病人提供免息貸款。稍伸援手起碼能幫助他們以現價購買一個人造關節。

醫療費用不斷上升，政府應與保險公司展開商談，提供標準及基本的醫療保險服務，並鼓勵市民開始自行購買醫療保險，這才是明智之舉。或許，保金亦可以在計算薪俸稅時予以扣減。當局亦應考慮採取稅務優惠計劃，鼓勵企業機構作出投資，發展供給弱能人士使用的產品及服務。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我想在此表明，我同意夏佳理議員的意見，就是應該增加一項房屋免稅額。

至於香港的科技發展方向，我贊成增設一所香港工業科技中心，以及採取全面的改革措施以保護知識產權。對於提供撥款用以發展科技及成立應用研究中心，促進與中國研究機構的聯繫，本人亦深表歡迎。香港再不是昔日的廉價產品製造基地。香港如要繼續保持領導地位，必須採取各樣的增值措施，例如發展先進科技、專門技術、自動化及資料快速傳遞等。同時亦要發展本地商標、設計版權的工作，以至設立有效而可靠的管理及服務系統。在這些方面做一些額外的工作，必會為本港產品帶來額外的銷量。

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一個世界級服務中心的地位，雖然稍遲了一點，但仍不失為一項值得歡迎的工作。唯一令我稍感失望的是，財政司並無詳細指出推廣的目標為何，以及如何進行推廣工作。

總括而言，我希望在此補充一點。儘管保障範圍狹窄而實質內容亦已弄得乏善可陳，我還是希望現在稱為強制性公積金的退休計劃，能夠儘早推行，並且不會有性別或年齡歧視。

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謹祝財政司的退休生活猶如財政預算案一般穩健。

謝謝。

涂謹申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代表民主黨主談談財政預算案關於保安方面的支出問題。

第一，是關於警隊警力及控制架構的檢討。3年來，保安事務委員會一直追問政府檢討的結果，與有何財政承擔需要支出，希望早點和我們商討，讓我們提供資料和意見。可惜3年來，一份文件也沒給議員參閱，我卻想事件最終也要揭露，到最後財政預算案要撥款時，多少也要給點資料吧。奈何到了財政預算案要撥款實施檢討的建議，到現在一點資料也沒有。我的結論是，這在財政預算或撥款來說是一個不合常規的程序，議員沒有足夠資料去支持或不支持那些建議，令我們十分為難。

第二，是分區的警力及巡邏的覆蓋面。我們似乎看到在灣仔、東區、油尖和葵青這幾個警區的警力，在過往連續兩年的實際人手比編制少了10%。我們亦明白，有時是需要靈活調配，但這兩年來，我們看到元朗、屯門的長期調動比編制有更多的人手，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跨區的互相調配，還是根本實際顯示警隊整體人手不足夠？尤其當我們沒有很好的理由來看今次財政預算案的答覆，是減少了巡邏的覆蓋(beat number)，所以不禁要問，其實是否人手不足夠呢？另一方面，亦沒有處理到有1500個警察任何時間都有機會休假或進行訓練，這方面的人手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的。

第三，我想說效率方面，似乎不同的警區有不同的表現。我觀察了一段長時間，了解到指揮官和領導階層的領導和表現是很重要的。我已經是第二年年要讚深水埗，同一個指揮官，同一數目的警員，發揮的效果可以達幾倍，令到無論滅罪委員、區議員、立法局議員和街坊首長等，都稱讚不已，因為他們令到整個區的同一數目的警察，日日行動，夜夜行動，每一個小時也行動，無論是掃蕩毒品，隨着便掃蕩「黃色錄影帶」，有時掃蕩勒索保護費（收陀地），總之是天天都有行動。我覺得政府，尤其是警隊，應考慮對不同警區指揮官的表現進行評分，甚至詳細檢核他們的工作成效。近期市民很開心見到，亦要稱讚警方的反黑大行動，做得相當好，令到很多區的黑社會分子也躲藏起來，這是應該繼續的。但在此可看到，似乎在九四年的巡邏方面，比起九三年檢查身份證的次數，竟然由二百六十多萬次，上升至九四年的三百八十多萬次，增加達120萬次。當然，這可以說與犁庭掃穴或反黑行動有關，但我們實際上也應看到這是否有效運用資源，或純粹只是在街上作例行檢查。從工作成果中可以看到這是少少的浪費，因為在去年透過檢查身份證而截獲的受通緝人士，只有7000人左右，但今年即使增加了120萬次的檢查身份證及街頭截查，只是截獲多1000名非法入境者或可疑人士。

第四，我希望政府亦要考慮減少警隊一些和警察主要職務無關的工作，我是第二年促請政府減少這類警務，例如拘捕無牌小販等。九四年協助拉小販有 12771 人，在這方面用了很多人力(man-hour)和令到巡邏地域空虛，因為每次掃蕩無牌小販，回到警署，便要進行落案等程序，花費數小時後才可回復巡邏，造成浪費。另一方面，我們亦應將一些違例泊車等事情交由交通督導員處理，進一步文職化，令到更多人可以執行紀律性任務。

第五，加強訓練，我認為最近多次開槍、脅持人質事件，顯示這方面的動感射擊及危機應變訓練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亦希望加強訓練警員處理家庭暴力、虐待兒童及性暴力案件的能力，以及一些介乎民事和刑事的糾紛，例如非法收樓和迫遷等，很多時警察會當這是民事而掉以輕心。

第六，歡迎增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調查課和毒品調查課人手，以及去年大幅加強在學校附近的反黑行動及在大嶼山增設新警署。

第七，防止罪案組今年用了很多資源勸諭銀行以外的高風險商舖，加強保安。該組探訪共 2151 間商舖，只有 9.81%即 211 間，願意加強保安。須知他們如加強保安，對我們遏止嚴重罪行很重要。我希望政府若運用了資源勸來勸去，苦口婆心，他們都不做的話，應考慮立法令他們依從。

第八，民主黨同意預算案內所說打擊罪案的一些優先項目，包括暴力罪行，特別是持械行劫、毒品罪行、三合會罪行、青少年犯罪及有組織罪行。去年通過有組織及嚴重罪案條例，最近全面實施，期望政府有了這新的法例，雖然是資源不變或有所增加，成績應是顯見的。我在此也呼籲市民與警方合作，提供資料。

第九，是政治部人員的遣散和保障。在此，我促請政府不要吝嗇金錢，原則是很重要的。當財政司在蘇格蘭享受他的紅酒時，有很多政治部的探員，為數 1000 名以內（其實現在申請中只有幾十人而已），可能在香港面對中共政權的迫害，或者盤問和拷打，究竟我們政府對這班人的道義責任去了那裏呢？

第十，在青少年罪行方面，警方必須聯同教育署及社會福利署提供多些針對性宣傳及家庭輔導服務和教育服務，並希望加強警司警誠輔導工作資源等。

最後，我想談一談獨立的警察投訴課，在最近見報的一宗牙醫被毆打案件中，有關裁判官在審案時指出，現在投訴課未能令人信服，甚至一些緊急案件也未能即時調查。現在的做法顯然欠缺公信力，也未能令市民信服投訴課耗用資源後真能查出真相。這樣等於枉花了資源，我從運用資源的角度來看，整個投訴課是應該獨立於警隊之外。

根據最近的廉署調查報告，70%市民擔心九七問題會令貪污問題進一步惡化，這是市民非常關注的問題。事實上，九四年比九三年的舉報貪污數字，無論公營機構或私營機構，只不過輕微增加。除了與選舉有關的投訴之外，其實貪污數字只是輕微增加。當中投訴警察貪污上升較嚴重。廉署情報亦顯示，小集團或如十個八個警員的區域式貪污開始出現，這是一個貪污逆轉趨勢。我同意政府加強廉署人手打擊公營部門貪污，尤其是紀律部隊。

但我們亦要看一看效率方面，廉署一年耗用數以億元計的公帑，我相信對整個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保障是不多的。但看一看數字，我們其實應反思一下究竟是否值得？以九三年而言，有關防止賄賂條例的檢控個案只有70多人，有56人定罪，24人獲釋；而串謀罪行差不多是2比1，即22個被判有罪，12個獲釋。在公營部門內因貪污而遭定罪的25人之中，有14人屬於紀律部隊，換言之，有時我們也要看清楚數字，雖然廉署或者市民亦很擔心講出來，但我們看回數字，如果說整個紀律部隊有14人是被成功檢控，究竟我們在考慮調撥資源時是否應該要謹慎一點呢？

同時，我們亦要留意一下可能濫用權力的問題。近數月有市民說，見到廉署檢控差人、懲教署或者其他紀律部隊的人員，多次進行的行動。拘捕的數目是很龐大的，每次行動便與報章記者一齊，拘捕的人士數以十計，但最後，成功檢控的只是幾個人。我便不禁要問，比對之下，幾年前的效率似乎便好點了，那時拘捕的數目只是十個八個，但檢控的亦有數個；但現在是否有點造勢的感覺，拘捕的時候便一整隊，幾十人呢？所以要很小心濫權的問題，同時亦會影響警廉關係，以及打擊一些盡忠職守的紀律部隊人員的士氣。最近調查發現接近三分之一的市民相信廉署曾經濫用權力和曾經有不公平的調查，這個數字是令人不安的。回顧數字，大約有十分之一的被捕人士最終是遭受檢控，所以在這方面我希望亦須要留意。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落實檢討委員會的一些建議，增強透明度和監察，亦有助公帑的運用。

至於青少年濫用藥物與吸毒的問題，最近總督召開了一個高峰會議，但同一時間亦講及投入3,000萬元來進行這項工作，但我要說清楚其實這是誤導的，因為很多現有資源是包括在內，換言之，其實政府根本沒有額外用3,000萬元的資源，關於此點，我看到很多人都被誤導，我希望政府要解釋一下，究竟有多少額外資源是落實有關的行動計劃，而不只是將原本有的都用下去。另一方面，我亦很不滿政府遲遲未能多些資助宗教團體辦的戒毒工作，其實他們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拘泥於所謂不能資助宗教活動的理由，其實，現在很多其他的範圍都是資助中。如果政府奉這原則為金科玉律的話，我希望政府可否彈性處理，例如成立一些基金解決問題，另外亦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加強教育和宣傳的工作。

非法勞工和移民的問題。今年，人民入境事務處會增加 46 人，成立一支所謂特遣隊，但是絕對不足以對付這個問題，因為非法勞工的問題特別嚴重，包括外籍傭工非法工作、持雙程證人士非法工作、逾期居留人士非法工作，這個數字相當重要，亦與市民的現實生活起着重要的關係，如果當政府令到市民覺得這些外籍傭工、持雙程證人士搶走他們的工作時，這種怨憤會累積成很大的問題，會是很危險的。同時政府亦要加強資源監察輸入外地勞工計劃，使到僱主不可以濫定一些不合理要求，或者無理解僱本地工人以輸入外地勞工，應該增加人手巡查和檢控，特別針對僱主方面，考慮立例加重刑罰。

在此，民主黨不同意政府不檢控一些首次非法入境來港工作人士，以解決監獄擠迫的問題，我們擔心失去阻嚇力及傳遞錯誤的訊息。積極的做法，反而是可以考慮與中國互換囚犯，將非法入境者遣返中國繼續服刑。

此外，我希望保安司能夠盡快作出承諾，既然越南能夠每個月收回 1800 名越南船民，我希望不論人力如何困難，不論資源如何困難，也要竭力達到每月 1800 人的目標，以及盡力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收回聯合國欠下我們的 10 億元。至於其他方面，我相信不夠時間說了，我盡量以書面向公眾發表。

謝謝主席先生。

楊孝華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作為旅遊界在立法局的代表，我歡迎財政司本月初在財政預算演辭中承諾會檢討現時酒店地積比率的上限。自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旅遊業一直面對房間供應量不足的困境，而且亦有不下 10 間酒店先後在這兩年間被改建成商廈或拆卸。對發展商而言，興建寫字樓當然可以有較大的地積比率，投資回報和投資年限都更加吸引，然而對酒店業的前境卻大有負面影響。而且，酒店房間供應量亦限制了訪港旅客的增長，受損的不止是酒店業，甚至是旅行社及零售業，甚至會波及的士司機等等很多行業。為了整體旅遊業的未來發展，政府應該為旅遊業所需的各項基本建設訂出目標。我相信新機場投入服務可以刺激龐大的客運量，令其大幅增長，不過如果缺乏足夠的酒店房間，香港又如何去接待增加了的旅客呢？因此，我認為政府必須在今年內完成檢討現時酒店地積比率上限的工作，鼓勵興建酒店的投資，加上 3 年左右的發展期，新機場開幕的時候，香港就才有足夠的房間去應付急速增長。

有很多客觀的因素及理由去支持我要求政府檢討及放寬酒店地積比率的上限。事實上，決定一個地方的地積比率從宏觀上是看城市規劃，看某地方可否建造某種建築物，但從微觀角度上看，某一個地盤可否建酒店或者住宅樓宇或商業樓宇大致上有 3 個因素：

一、地點的渠道設施是否足夠；二、地盤附近的道路交通設施是否足夠；及三、人口密度，即那幢大廈的密度，其實人口密度亦決定渠道及交通設施是否足夠。住宅物業由於人口集中，對渠務及道路負荷亦都更重，因此政府根據這理由訂出了住宅樓宇地積比率最多只十倍的原則。目前，香港的酒店在建造原則上是依照住宅樓宇地積比率而訂其上限。但商業樓宇則最高是 15 倍，即是 1 萬方呎的地可以有 15 萬方呎的建築面積，我是要求政府將地積比率放寬給酒店時，要將酒店與商業樓宇的 15 倍看齊，而不是 10 與 15 之間的一個中間落墨的數字。理由主要有 3 個。從人口密度來說，第一，如果大家有住過酒店的話，酒店房間都是套房，面積比起普通住宅房間大。第二，入住酒店房間的人每晚應該最多兩個人，而有時是一個人佔一個雙人房，何況在淡季時酒店有 20% 的房間是空置的。第三，香港有很多酒店辦一些所謂公寓形式的酒店，租住這類房間的住客多是旅客，他們其實是長駐在香港，統籌他們在東南亞的業務的商業人員，他們經常往外地公幹，很多時不在房間住，所以我覺得，評估一間酒店裏面的人口密度時，就不應與一般的商業樓宇相提並論，根本不可以與太古城、康怡花園相比的。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以商業樓宇現在的 15 倍去訂出準備放寬的酒店地積比率。

在檢討酒店地積比率上限的工作上，我希望政府可以比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中裏所講的再進一步，因為在報告裏，他只說有意向要檢討，但沒有說檢討多少倍，亦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時間表，我覺得這工作不可以等待超過今年年尾，最好是今年夏天完成，而我知道在旅遊界、酒店業已經進行了很廣泛的諮詢，所以我希望很快見到結果。

在交通基建方面，我要求政府在興建道路及計劃時要顧及旅遊界的需求，在一些旅遊點例如尖沙咀、中環及銅鑼灣的購物區，或者觀光勝地，很多時道路設施都不足，旅遊車缺乏停車和上落旅客的地方。現時在這些地方正是缺乏了照顧旅客的道路設施，所以旅遊車找不到地方停泊，旅客要花很多時間才到達目的地，影響他們在香港花錢購物的時間。大家亦知道，香港每年 600 億元的旅遊收益差不多一半去了購物，我們應該給旅客多些機會在購物區用多些錢。

在交通運輸方面，政府的數字顯示，九五至九六年度用在基建運輸方面的公共開支約有 112 億元。昨天聽到有些議員批評這是負增長，當然政府曾經解釋過，支出負擔減少是由於很多個發展項目都批給私人集團發展經營，所以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可以節省。我覺得讓私人集團發展公共設施當然是值得鼓勵，但不等如政府可以以此為藉口，減少自己的承擔。此舉有一個弊處，就是如果是私人經營的交通運輸設施，他們大多從自己的直接回報率和使用量去考慮，而比較少考慮到間接的收益，例如一條公路，如果有地方給旅遊車停下來給旅客觀光的，縱然對項目本身沒收入，但對香港其他行業例如旅遊業卻有間接收益。所以我覺得當政府考慮這些基礎設施工程時，應考慮到不單是那項目本身的直接收入，亦都考慮對其他行業的間接收益。

第三，就是很多議員講過的勞工短缺問題，現在香港的確出現有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工找不到人做，旅遊業是其中一個，酒店業也常常覺得很困擾，未必請到足夠的適合人員去做工作。檢討這兩年來政府大力進行很多再培訓計劃，但政府資料顯示，有 4 萬人經過再培訓計劃訓練，其中有 5000 人是由所謂在職訓練再培訓出來的，其他 3500 人是通過各種課程去培訓的。

在上星期幾天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中，政府本身亦承認這 5000 個在職再培訓學員所動用的資源，平均比傳統的培訓方式低很多。甚至有一位政府官員答覆某一位議員說，以動用資源培訓出來的每名學員計算，真正效率比傳統高 40 倍。所以我覺得政府在再培訓計劃上，是否應該在資源分配和撥款方面加重在職再培訓所佔的比重？而在這方面，旅遊業和酒店業是最歡迎在職再培訓這形式的，因為可保障受培訓的員工，即時找到工作。

關於文康廣播方面，政府一向都是比較低調處理的，可能文康廣播，尤其是文化、體育等，無論政府官員也好，甚至議員也好，都覺得這些不是很可以撈到政治本錢的東西，所以大家都不十分重視。不過，文化藝術和康樂活動的確可以提高市民的生活及文化的水準，對整個社會的文明面貌，都有良好影響。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調撥足夠的資源去促進發展這範疇，令到市民的生活多些色彩，我要求政府起碼要做到兩件事：

- (1) 對於一些志願團體所營辦的康樂和教育營地，希望政府繼續對它們提供足夠津貼，以免它們因為缺乏經費而被迫關閉。這些營地其實可以提供一個理想環境給家庭或者青少年建立和諧的關係，對減輕家庭問題及青少年問題是有幫助的。
- (2) 我希望政府可以增加對香港電台的撥款和資源，既然認為香港電台公司化已經不是近期一個須要討論的問題，我覺得的確要對香港電台提供足夠資源，令它可以製作更多高質素節目給市民欣賞及享受，尤其是自從有線電視啟播以來，除了部分自己製作的節目之外，有不少節目都是香港電台計劃只是提供給原本的兩家電視台播放的，我不希望要「炒冷飯」才可以在有線電視提供足夠的香港電台製作的節目，所以希望在這方面香港電台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去繼續發揮其創作，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去選擇多些好節目去看。

主席先生，我亦希望財政司退休之後，能夠時常回顧香港，看到我們欣欣向榮，亦希望他的接任人能夠如過去幾年一樣，實行一個審慎、對社會有貢獻的良好理財哲學。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陸觀豪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上星期新加坡國會辯論政府財政預算案，連年財政盈餘成為兩派爭辯的焦點。一派主張政府盡速積聚更豐厚的盈餘。他們認為盈餘是「政治資產」，且歲入盈餘對國內生產總值比率連年下降，而累積盈餘亦只相等於每年入口總值不足一半，未算龐大。故此，政府不應慷納稅人之概而應積穀防饑。另一派則質疑政府究竟還要「收起多少把傘」，他們認為連年盈餘非因經濟成長所致，而是苛捐雜稅。況且，以政府目前富裕的財政狀況來說，繼續維持龐大的盈餘不但無必要，且對經濟不利。故此，政府除應輕徭薄賦之外，更要增加照顧鰥寡孤獨老弱，造福國民。

對香港來說，財政盈餘的爭論，可謂老生常談。較諸獅城，香港更得天獨厚，理財有道，加上財政司彷彿有枝魔術棒，點石成金，年復一年，化赤字為盈餘，故財政赤字絕無僅有。根據財政司在九二至九三年度預算案的中期預測，以後四個財政年度都會出現數十億元的赤字。實際結算是已連續兩年錄得龐大的盈餘，而九五至九六年度預算赤字亦較當年中中期預測為低，最後結算時都是盈餘居多。

其實政府連年財政盈餘超乎預算，其根由如出一轍。經濟增長總是較預期為佳，帶來額外的歲收；而開支向受嚴格控制，加上建設工程不時有延誤，令歲出總較預期低。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之下，盈餘自然會超出預算，而赤字預算亦轉虧為盈。去年度財政盈餘與原來預算相符，其實是因資產價格通脹備受遏抑，股市地產明顯調整，影響歲入所致。

明乎上述道理，今年度財政預算案的二十多億元赤字實不足掛慮，與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亦非不一致，招來口誅筆伐，更令人費解。其實在概念上，量入為出或量出為入是一分為二，二而為一。箇中要點是歲入受客觀條件的規限，徵賦不能超越經濟能力所承受的水平。

財政司在預算案演辭中提到其預算策略有四個要點：

第一：控制政府開支增長在一段期間不得高於整體經濟增長。

第二：實踐以往的承諾，但絕不承擔力有未逮的新項目。

第三：維持充裕的儲備以應付不可預見的情況。

第四：在整體經濟及財政狀況許可之下，輕徭薄賦，寬減納稅人的負擔。

由是可見，本港公共理財的基本理論，既非量入為出，亦非量出為入，而是「量力而出」。在小政府大國民的信念之下，以中期預測為基礎，控制政府未來開支與經濟增長同步，再在可動用的資源內按年訂定歲出的優先次序，實踐承諾。至於歲入的來源，則衡量當前經濟實力，並配合其他政策的目標，按年調整分攤賦稅的責任。這即是財政司提出，在市場經濟及福利安全網之間求取平衡的「共識資本主義」。而且在政府精打細算下，歲入每每超越歲出，積聚充裕的儲備以備不時之需。

在這條預算案公式中，最具爭議者莫過於何謂充裕儲備。況且，政府經常利用財政手段以達致政策目標。在預算案演辭中，財政司不厭其詳地反覆強調，鑑於過渡期的不明朗因素，本港需要強大的儲備作為緩衝。但既然政府認同藏富於民，以物盡其利，那麼九七年預計儲備高達 1,500 億元或等於當年歲出的八成又是否偏高呢？

今年度的預算案主題是「協調共識創繁榮」，財政司並引《荀子》〈富國篇〉文中，「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兩句，作為政府理財哲學的精神。或許財政司以為荀子也認同其維持龐大儲備水平的主張。

其實荀子「足國之道」在於「節用以禮，裕民以政」。所謂「禮」是政治綱紀，社會制度。貴賤、長幼，以至貧富、輕重均有客觀準則。國有疆界，土有肥脊，地盡其利，人盡其才，各司其職，從事生產，多勞多得，衣食不愁，收支相抵，積蓄所餘，這就是綱紀制度的效益。因此，「節用」並非墨子所鼓吹的知慳識儉思想，而是支配有道，毫不浪費。在這方面荀子提出兩點：其一是裁減冗員，所謂「士大夫眾則國貧」。其二是輕徭薄賦，即「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

至於「裕民以政」，「裕民」者是使人民生活富足，荀子一向主張治國要滿足百姓之欲求。富國強民之道，其實不外乎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因時制宜，所謂「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能富裕百姓，家家有積餘，國自富強。

故此，「善藏其餘」並非藏餘於官而是藏餘於民。「下富則上富」就是這個道理。荀子認為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富裕人民而朝廷不取分文，造福百姓而朝廷不徵徭役。「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國家怎算富強？因此，若財政司以為坐擁龐大盈餘便是「善藏其餘」，則可謂謬之千里矣。

主席先生，本人絕對支持政府維持寬裕的財政儲備，但過猶不及，如果「水浸」庫房，又怎會是理財有道？況且，政府如何保持儲備的購買力亦費煞思量。積穀防饑，固然有其必要，但藏而不用，亦有穀等於無穀。

至於以財政手段達致政策的目標，最典型的實例，就是對賭、飲、吹三大害寓禁於徵。至於成效如何，大家都心中有數。問題是若不相應調節其他稅項以平衡收支，則會變成暴斂。建議中的交通政策措施的後果，極可能是「庫房肥而車照塞」。

不過，還富於民並非是大灑福利。正如荀子所批評，「冬日為之饘粥，夏日與之瓜麩」，以博取一時之讚譽是譁眾取寵，絕非長久之道。多位議員在發言時都批評政府吝嗇增加福利、教育、房屋等民生開支，但如果政府真的——「從善如流」，則變了項項優先，那還有預算可言？大家當然清楚了解，羊毛出自羊身上，要擴大福利網，便要擴大稅基，但若個個都抱着可出自其他羊身上的心態，那還有羊毛呢？

通脹高企，是近年市民大眾最關注的問題，而政府對此似束手無策，更備受議員再三批評。財政司在其演辭中提出三個有助於在未來日子繼續對抗通脹的因素，但基本問題是通脹會否回落到低水平？

本港經濟向以貿易為主導，經濟增長及通脹本來有明顯的高低循環。在強勁出口帶動之下，經濟增長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內部消費擴大，導致通脹壓力加劇。成本上升，再加上市場吸納力轉弱，令出口增長放緩，經濟增長回落，內部消費退縮，通脹壓力消除，生產成本下降，出口回復強勁。在這個出口／消費循環中，本港經濟其實是通過輸出通脹來自動調節的。

近年工業生產不斷北移，以利用中國大陸的低成本以增加出口競爭力，而本港則加強發展服務行業。在兩者相輔相承之下，本港近年均能維持 5% 左右的經濟增長，但通脹則持續偏高在 10% 上下。不過，亦令到本港經濟的成本價格結構起了基本的變化。

由於出口環節的成本價格結構脫離了內部環節的成本價格結構，故本港通脹對出口價格幾乎無影響，加上出口環節對市場的盛衰有更大的適應力，令原來的調節機能基本上失效。持續平穩增長及偏高通脹現已經替代增長／通脹的循環。事實上，只要實質工資增幅持續上升，通脹對整體經濟來說是不受歡迎但維持增長的一個必然代價。若遏抑需求，自然有助通脹回落，但亦可能導致經濟增長下跌，反得不償失。「在野易，在朝難」，未知抨擊政府打擊通脹不力的人有何實際有效的方法呢？

主席先生，今年度財政預算案，表面上平淡無奇，既無大幅加稅亦無大幅減稅，各項開支亦因循既定原則。但財政司的演辭則包涵着好幾個重要的理財策略。影響深遠，值得議員同事及經濟學者詳加分析。政府既要鼓勵自由進取及競爭，又要促進公平及匡扶老弱不幸者。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共識平衡，其實有待進一步探討。無論偏倚那一方，對本港未來發展都不利。

如果「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財政司的座右銘，那麼〈富國篇〉文中，「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兩句，相信就是「共識資本主義」的精髓。

主席先生，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是財政司麥高樂爵士離任前所發表的最後一份。麥爵士並不墨守成規，能廣納民意，擇善固執。任內不單寬減市民稅務負擔，更連年有餘。本人亦藉此機會歡迎曾蔭權先生接任財政司一職。作為首位本地官員肩負此重責，曾先生可謂任重道遠。本人深信，以其才智一定不負眾望。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順祝麥高樂爵士榮休後生活愉快，身心康泰。

黃偉賢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這份預算案是現任財政司麥高樂先生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但縱觀全篇預算案可說是乏善足陳，充分體現了麥高樂先生的保守理財作風。我今次會代表民主黨就預算案中的交通部分發言。

在整份預算案共 114 段中，提及交通問題的部分只有兩段，分別是 40 及 68 段。交通是市民非常關注的問題，所佔篇幅卻相當少。究其始末，相信與總督的施政報告有關。因為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跟施政報告來辦事，施政報告說得愈多的問題，財政預算案中的撥款便愈多，施政報告不提，財政預算案肯定也不大提及。我們覺得總督作為施政的決策者，在以往幾年中給予市民的印象是並不重視交通問題，而且也不清楚了解交通擠塞問題的嚴重性。在其施政報告中，較少提及交通問題，所以預算案也相對地較少談及撥款。政府亦一直未有長遠及大規模的交通規劃，難怪香港市民日夕為此而叫苦連天。

財政司預測至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財政儲備會達到 1,510 億元之鉅，較基本法規定的 250 億元儲備高出六倍，而港府更預計到一九九九年，連特區政府土地基金全數計算在內，總儲備會達到 3,610 億元。有如此龐大的儲備，當然使市民和投資者對未來特區政府打下一支強心針，但我們亦不禁懷疑政府會否為了要留下一筆強大的儲備

予特區政府，而將本來應該用來改善現時本港社會及市民生活的開支遏抑或拖延實施，導致本港缺乏足夠的基礎建設或社會設施去應付未來的需求，使市民辛苦勞碌賺取的收入得不到應享有的同等服務，導致生活質素下降。我這樣說並不表示我反對為未來的特區政府預留儲備，而是擔心政府為了要預留強大儲備而把一些應該早已實施的基礎建設和社會服務拖延落實，導致現時的建設及社會服務遠遠追不上香港市民的需求，而只等到環境已惡劣至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時，才作出一些補救措施或臨時過渡措施。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完全未能達到政府應有的防患未然的角色。

交通規劃

首先，在交通規劃方面，政府向來採取的態度是異常保守及缺乏前瞻，這在新市鎮的交通規劃尤為明顯。政府其實早已有計劃將本港市區人口遷移至新界新市鎮，此舉一來可紓緩市區擠迫情況，二來亦可發展新界偏遠地區，而政府的如意算盤便是要使新市鎮能自給自足。可惜，政府在新市鎮提供就業機會、基礎建設、社區服務、學校、醫療服務等方面卻未能配合人口遷移，導致新市鎮居民天天要來往新市鎮和市區上班、上學，對新市鎮原本已不甚完善的交通網絡造成龐大壓力，交通擠塞無日無之，市民叫苦連天。其實，這些問題早可避免，可惜政府迂腐不堪，亦缺乏勇於承擔的精神，一定要等到人口發展到某一程度，才肯投入資源再發展下一階段的基礎設施和社區服務。但發展這些基礎建設需要一段長時間，在這一過渡期間，政府卻要市民繼續忍受嚴重交通擠塞所帶來的惡果，三號幹線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三號幹線的規劃早在十多年之前已提出，政府卻一拖再拖，完全漠視新界西的發展，亦嚴重低估了中港兩地運輸的增長，以致屯門公路每天出現大塞車，使居民及貨運業人士一同受苦。至今年政府才將三號幹線交由私人財團發展，雖然如此，但因為要在一九九八年才可完工，居民及貨運業還要多捱幾年塞車之苦，當中的經濟損失真不知如何計算。

政府這種對長遠規劃所採取的保守態度絕不可取，所以我要求政府興建西北鐵路時，應及早預見屯門區居民的需求，將西北鐵路的終點站由現時構思的屯門北伸延至屯門市中心，免再加重現時正飽受壓力的屯門市內交通網絡的負擔。事實上，將總站伸延至屯門市中心所需的資源，假如接納民主黨建議，將兆康苑至新發村一段屯門河鋪設上蓋來行走鐵路，據政府初步估計，只需多用 20 億元。以目前香港財政狀況而言，完全可以負擔得來。

交通擠塞

交通擠塞已成為目前本港最頭痛的問題。去年運輸科為交通擠塞問題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可惜，在這份財政預算案中，我們見不到政府有何具體行動或誠意去解決日益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港府曾承諾會分 5 年撥款 300 億元興建新道路，本以為這是政府下定決心解決交通擠塞而下的一個決定，誰知今年的交通支出卻是負增長。政府的解釋是很多重大工程，例如三號幹線及西隧都已由私人財團承包，不必再在公眾的荷包掏錢。能夠利用私人財團的資源發展交通當然是好事，但私人財團應該只起輔助作用，而不能取代政府的角色。因此，政府不應以此為理由，逃避興建更多運輸網絡的責任來減少支出。

在上述 300 億元的交通預算中，只有 160 億元是用在非機場核心工程，而在 160 億元中，亦只有 50 億元，即原來 300 億元的一成半，用在解決市區的交通擠塞問題。但所謂市區，並不包括現時最擠塞的中環、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等市中心區，亦未見政府會撥出更多資源興建停車場，解決泊車位不足的情況，使非法泊車、或駕駛者因找不到泊車位而在路上不斷繞圈，加重路面擠塞的負面影響。雖然政府年前已開始對本港泊車需求進行研究，但有關報告卻遲遲未能完成，而有關官員也曾承諾會在去年年底公開該份報告，但有關方面一拖再拖，由去年年底推說要到今年二月，但較早前又再說在今年中才能完成。我想問一問政府，究竟政府有沒有決心解決交通擠塞呢？

或者政府會回答說，今年政府已打算撥出 10 億元興建青衣複製南橋，以紓緩青衣的交通擠塞問題。但我必須指出，如果政府肯早幾年撥款興建青衣複製南橋，現時青衣居民已經不需要受塞車之苦，但現時政府才答應興建，到九八年完成工程時，青衣居民已經塞車塞到麻木了。其實政府處理交通問題，根本就不應以一個「解決塞車」態度入手。解決塞車已是事後「補鑊」的方法，最重要是要對城市發展有一完整的長遠規劃，使交通不會落後於都市和人口發展，這才是上策。政府應要從中汲取教訓，面對現時的困境。民主黨要求政府從速撥出足夠資源，落實解決交通擠塞問題。

渡輪政策

在制訂措施解決交通擠塞問題時，政府往往將焦點放在陸上交通，而忽略了渡輪亦能發揮一定的作用，直至現時，本港仍未有一套完善及長遠的渡輪政策。政府在處理渡輪問題時，亦只集中處理往離島航線的渡輪，但其實行走本港市區的渡輪亦有一定歷史及一直發揮輔助陸上交通的責任。譬如來往中環至尖沙咀，或中環至屯門等渡輪服務，每天就有不少市民使用。而汽車渡輪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擔起了紓緩過海隧道擠塞的作用，可惜因填海關係，導致碼頭搬遷，取消了部分汽車渡輪的服務。民主黨認為，本港三面環海，政府其實一直未有完全發揮渡輪在紓緩交通方面的作用。政府應該從速制訂一套長遠的渡輪政策，並對渡輪服務在各個新市鎮可能擔當的角色進行發展研究，令到市民在選擇交通工具時，能多一個選擇，從而發揮紓緩陸上交通擠塞的作用。

中港基建

中港兩地的交通隨着中港兩地貨運及貿易的高速發展而頻密起來，而在去年來往中港兩地的汽車及貨車超過 750 萬架次，因此，如何協調中港兩地的道路網絡發展，使兩地都能得到最大益處，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可惜，過往一些鄰近香港的中國城市，只本着自己的利益出發，單方面提出，並企圖落實其接駁香港的道路計劃，這使香港長期處於被動的位置。中港基建協調委員會成立，我們感到高興，並希望這個委員會能有效地發揮協調兩地的基建發展。但委員會成立至今仍未見有具體成效，據說雙方在很多問題上仍未有共識。我們希望中港雙方在這個問題上衷誠合作，以整體利益為基礎，共同發基建項目。

交通安全

接着，本人想談一談交通安全這個問題。其實很多道路擠塞，都是因為嚴重或輕微的交通意外而導致。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去年全港發生了 15000 宗交通意外，造成的傷亡人數高達二萬多人，情況可謂十分嚴重。造成交通意外的原因，一是開車太快、跟車太貼又或是不小心駕駛，這些情況其實可以避免，政府亦有責任減少這些交通意外。不過，政府對減少意外的工作似乎未盡全力，即使有關醉酒駕駛的條例草案已提交立法局，及有關強制後座乘客使用安全帶的議題將於下星期在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上討論，但面對嚴重的交通意外數字，政府實應着力多做工夫，對付罔顧他人安全的道路使用者。同時，亦應多作教育宣傳，教導大眾明白道路安全的重要。政府在道路安全教育方面所作的工夫，本人多年來都批評為「門面有餘，實效不足」。政府一直都喜歡舉行嘉年華會及以演唱會來進行教育宣傳的工作，我就不相信找來一兩位天王巨星舉行一兩次演唱會或嘉年華會，大派禮物，使參加者，嚴格來說，只是歌迷高興一輪，就能叫公眾明白交通安全。政府應考慮利用深入一點的方法，教育大眾，以免資源用去，卻沒有實質效用。

至於海上交通問題，又有愈趨嚴重的情況。近日不斷有船隻在本港海域發生撞船意外，這可能是由於本港不斷進行填海工程，使海灣收窄而導致水流轉急的影響。為了確保本港海上交通的安全，本人促請政府檢討現時海上交通安全的政策。必要時，可將限制船隻速度的範圍由現時的維多利亞港擴展至本港其他海域範圍，以策安全。此外，我們不時會看見在渡海小輪的航道上，有漁船作業的情況出現。小船在航道上停留，自然會影響海上航道的安全，而漁船留下的繩纜、漁網及其他垃圾，又會影響船隻安全，特別對於一些高速渡輪，影響更大，海事處實應在這方面多做點工夫。如果人手不足或設施不夠，那麼政府絕對有責任增加撥款，以確保渡輪乘客安全。

本人謹此陳辭。

黃宏發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發言支持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二讀的動議。

這一份是財政司麥高樂爵士的第四份，亦即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很多同事在昨天及剛才都已說了很多讚美及祝福的說話，這些我都完全同意，我不想再重複多說。我謹在此祝他退而不休，因我知道他已選擇在返回故鄉後繼續服務人群。我也祝賀曾蔭權先生繼任財政司。香港可以說是深慶得人，但際此過渡時期，我也要祝他好運。

昨天林貝聿嘉議員說可以將這份預算案比喻為一杯雜果冰，我覺得不以為然。我覺得這份預算案似乎並沒有火花，大家的辯論也不太激烈，所以說得較為貼切一點，這份預算案好比一杯白開水，一點刺激也沒有。既沒有酒精，也沒有咖啡因；不是咖啡，也不是茶；沒有糖，也沒有鹽；不冷又不熱，所以各黨派和議員都沒有太激烈的言論。話雖如此，自由黨傾向於指出或指責民主黨搞福利、搞分裂；而民主黨又傾向於指出或指責政府和非民主派人士偏幫資本家等。

主席先生，財政司麥高樂爵士創造了一個新詞，即在第三段說得很清楚的「共識資本主義」。我簡單打一個比喻，所謂資本主義，是做一個大的餅，可以促進自由、進取及競爭等。而共識，我很奇怪，因我不知道這詞如何得來，不過，我想大概是分餅的意思。這個餅要分得平均一點，大致上可說是社會公義。不過，我不知道共識怎可以令分餅會平均一點，抑或是相反的解法，即分得平均一點就可以少些「拗撬」，所以大致上都是正確的。如今財政司創了這個怪詞，雖然昨天有議員說以後學術界可能有很多討論，但正如前財政司夏鼎基爵士創造了「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同樣令人感到糊裏糊塗。如果不干預，又怎樣積極呢？意思可能是不干預主義可以產生積極和正面的後果。做個更大的餅，就是中國古語所謂「患寡」；分餅分得平均一點就是「患不均」。自由黨給人的印象是「不患不均」，這只是一個印象，自由黨並不完全是「只患寡，不患不均」；而民主黨給人的印象是「不患寡，只患不均」，好像分得平均一點就可以了。兩者可能都是錯的，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既患寡，亦患不均」，所以希望兩派以後辯論時收斂言詞，否則，香港很難有共識政治。

主席先生，剛才陸觀豪議員引用管子的說話，我進一步引用〈牧民篇〉的說話，「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句說話似乎像說整個經濟，但我認為可以分兩個層次來看。第一個是社會整體的層次，整個社會應該豐裕一些，所以經濟必須增長。不過，社會上亦有個體的層次。在個體層次上，意思是指窮人須受到扶持和扶助。麥高樂爵士在第三段內說得很清楚，我們須扶助有需要的人，這是財政司「共識資本主義」所界定的一個意思。原來財政司的意思是「既患寡，亦患不均，更患苦痛」。這些苦痛是鰥寡孤獨廢疾者的苦痛，多謝陸觀豪議員剛才引用了《禮運·大同篇》的說話。這也正是我一向所信奉的卡爾·波普爵士(Sir Karl POPPER)的見解，他認為政府應該「以減少苦痛作為優先施政原則」“minimize suffering as priority”。主席先生，預算案內的確有「以減少苦痛作為優先施政原則」這成分，例如新增了一項 11,000 元的供養弱能家屬免稅額，這就是一项新猷；大幅增加單親人士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祖母免稅額；實施了總督一九九四年施政報告內的承擔，例如各項福利設施的建設以及福利設施的名額等。下星期的財務委員會會議將有一份文書，是購買私人物業作為社會福利用途，政府可說是已經開了步，亦可說是肯定了一個原則。但問題在於這是否足夠，會否在施政過程中，出現了錯失良機的現象？我只想舉數個簡單的例子談談。

第一，是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當日我在本局提出動議，要求政府增加 90 公頃土地，興建出租公屋單位，以滿足需求。我的意思很簡單，因為施政報告承諾增建 141000 個單位，請大家留意，是增建。但原來政府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只是用了房屋委員會的建屋目標，即興建 146000 個出租公屋單位，但在興建過程中，卻拆卸 105000 個單位，換句話說，只增建了 41000 個單位。這樣做法，天台木屋、寮屋、臨屋和公屋擠迫戶居民的苦痛又如何解決呢？當然，這並非財政司本身的責任，我希望政府聽了這番說話之後，會仔細考慮。如果不更正該項承諾，則明顯是騙人的說話。

第二，何敏嘉議員在同一日提出有關輸入勞工的條例草案，技術上是人民入境事務（修訂）條例草案。當日我沒有發言，亦投了反對票，不支持該條例草案。但事實上，輸入勞工令很多香港居民在就業上受到苦痛。這「就業苦痛」很簡單，就是被人搶了「飯碗」。我不知道應否輸入勞工，又或應輸入多少。大體來說，我覺得有些行業似乎在本地不能找到勞工，譬如漁業，所以我支持輸入漁工，又或某些特定行業輸入勞工，甚至一般性輸入勞工也可以，但最主要的問題是政府必須確保因經濟轉型而失去工作的本地工人，在接受再培訓後，可以獲得優先聘用。我認為勞工處本地就業方面的職能須予加強，甚至法律權益方面也要加強。否則，無論僱主是否真的刻薄，但他們顯然是經濟動物，必定會聘用較便宜的勞工。政府若不嚴加管制，便會造成就業的問題。

我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衣食住行之中「住」的問題；第二個是「食」的問題；接著的第三個問題與衣食住行無關，我想談論的是老人金問題，這是老、病的問題，也是有關鰥寡孤獨廢疾者的問題，因為老人家很多時都可能是鰥寡孤獨廢疾者。本局在三月八日會議上有兩項動議，一項是教育統籌司提出的要放棄老人金計劃，取而代之要實行強制性私營公積金計劃。當時我發言反對，在此不再重複我的意見和論據。我支持楊森議員的動議，即對政府收回老年退休金計劃，感到遺憾，並促請政府重新考慮這事。我認為老、病問題是一個急切的問題，應該立刻解決，而亦只有老年退休金計劃才可解決這問題。如果政府在兩項動議都獲得通過後，一意孤行，堅持只進行強制性私營公積金的話，我認為政府根本完全沒有照顧到鰥寡孤獨廢疾者的老、病問題。

最後，我想談談「行」的問題。劉健儀議員在二月十五日提出動議，有關改善交通擠塞情況的諮詢文件，我當時沒有發言，但我是支持動議的。雖然我同意應優先興建西北鐵路，但大家不要忘記，沙田、馬鞍山和將軍澳就像以前的筲箕灣一樣，「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大圍站現時已非常擠塞，兩條隧道也相當擠塞。在這情況下，我認為馬鞍山鐵路建至大圍，再由大圍接駁出九龍這項工程應列入優先處理範圍。將軍澳鐵路亦應獲優先處理，因為雖然將軍澳距離觀塘不遠，但觀塘距離其他地方卻相當遠。

主席先生，我不想用太多時間，因為已經接近八時正。我剛才主要引用了管子〈牧民篇〉的「衣食足，則知榮辱」，但衣食足不是說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整個經濟的富裕，而是一定要令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也能分享富裕，所以「既患寡，亦患不均，更患苦痛」，是鰥寡孤獨廢疾者的苦痛。卡爾·波普爵士所說的減少苦痛，應該是香港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原則。主席先生，我呼籲大家共同攜手，創造一個更好的明天，創造一個正如總督彭定康先生所說的更具關懷，更溫文，更富有的香港。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田北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本人在此恭賀財政司爲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提交了一個審慎的財政預算案——一個僅因應通脹而作出調整的預算案。我感謝他力拒來自社會福利的壓力，沒有看誰發出最大的聲音便隨便給予幫助。既然財政司引述了《荀子》的說話，我也來引述財政司自己的說話：「要撮述本港這段期間取得卓越成就的秘訣，…我會認爲這是由於我們對或可稱爲共識資本主義的信念。這種共識，是我們明白到必須鼓勵自由進取及競爭，同時促進公平及扶助有需要者」。

爲了強調起見，讓我將重要的句子再說一遍：「鼓勵自由進取及競爭，同時促進公平及扶助有需要者」。

助政司對香港成功的秘訣，掌握得恰到好處。但問題是：鑑於今時今日香港的政治氣候，他的繼任人能否保持這種平衡？我希望他做得到。只是我恐怕到了九月，當以社會福利爲主導的民主黨成員和他們的支持者在本局取得大多數議席後，新任財政司不單是當「沉默的羔羊」，而是可能要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

主席先生，現在生意經營殊不容易。公司要面對劇烈競爭、通脹攀升、工資上揚、美元疲弱、利息高企、九七疑慮、租金高昂、勞工短缺、愈來愈多的管制以及各個壓力團體所提出極其苛刻的要求。很多行業都在迅速萎縮，有些甚至不再在香港出現。一九九一年，製造業僱用合共 63 萬人，三年之後僱用人數，只得 43 萬 8 千人。現時的失業率僅爲 2%，主要原因是工人無法勝任需要更高技術的工作。由於無法以具競爭力的工資聘得足夠人手，一些工廠已經遷往他處。財政預算案中完全沒有任何對策可以扭轉這個趨勢。

我建議財政司要多花點功夫刺激自由進取的精神，但對於「促進公平及扶助有需要者」，即一般人所說的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則應該多點交由市場自行調節。

財政司掌舵 4 年期間，成功地使 50 萬人獲得豁免繳交薪俸稅。不過，此舉令稅基進一步受到侵蝕。同時，負擔愈來愈大的人所得到的援助卻愈來愈少。結果，商界需要以繳付用戶費用或利得稅的形式，對政府收入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建議財政司可以將公司利得稅減低 0.5% 或 1%，對生意經營者給予少許稅項寬減。這項減稅措施只不過會令庫房收益減少 17 億元而已；這對於財政富裕的政府來說，也只是區區小數。但投資者對本港經濟的信心會因此大大增強，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這筆錢本身的價值。商家會視之爲一個有財政盈餘的政府決意要鼓勵自由進取的一種表示。他們亦會因此確切知道，政府並不只是聆聽那些要求增加社會服務開支的人的說話，而忽略其他人的聲音。

財政司愛把香港描述爲一繁榮興盛、量入爲出、和衷共濟的城市。但現時來說，這樣形容香港未免有點兒過於美好。原因何在？這是由於有一些力量正在擾亂這和諧的情況，令香港變得入不敷支。到了九月，要求政府讓步的壓力，也會愈來愈大。

這個過程已經展開，工會和民主黨成員希望政府無論如何，擱置名額僅為 25000 人的輸入外地勞工計劃，他們並沒有理會本港的每年通脹率幾達 10%，而速成這個通脹率的原因，是因為本港 10 年來的失業率從未達到 3% 以上，而按世界標準來看，這比率已算是全民就業了。全民就業令僱員大佔上風，結果是香港的商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

本局一位議員即將提交一項動議，要求進一步增加工人的福利。僅僅在兩個月前，勞工顧問委員會被迫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調高。最近，政府亦在兩年內第二度對肺塵埃沉着病賠償基金的徵款進行修訂。本月初，本局亦通過了一項採用強制性私人公積金計劃的動議，逼使僱主額外繳付僱員薪金的 5% 作為退休保障。此舉亦肯定會對做生意的人有所影響——尤其是做小生意的人。這件事所帶來的信息是，積極分子會大派用場，而商界必須承擔所有額外的費用。就此畫上句號。

同時，我們在亞太區的勁敵新加坡卻沒有這些煩惱，而且表現遠較香港出色。新加坡的通脹率只及我們的一半，而本地生產總值卻差不多是我們的兩倍。原因何在？其一是新加坡靈活處理輸入外地勞工計劃，新加坡的工作人口只有我們的一半左右，但從外地輸入的勞工的數目卻是我們的 4 倍——即 10 萬對 25000。其二是新加坡政府能夠抵禦工會的壓力，而且新加坡的工會勢力幾乎等如零。其三是共識資本主義在新加坡已經有長足發展，而在香港則備受壓力。

香港政府的政策是要給予外地勞工等同香港僱員工資中位數的工資，雖然最低工資實際上已經足夠。這種做法對本地的僱主和僱員來說都是不公平的。政府應該准許僱主給予外地勞工較本地工資為低的工資，他們才可以負擔得起給予本地工人較高的工資。很多時候本地工人的工資較外地勞工為低，我在此表示反對。給予外地勞工較本港工資偏低的金額，並不表示要剝削他們。無論外地勞工在本港所得到的工資有多少，這個工資的數目也會比他們在祖國所能夠賺取的工資高出很多倍。當他們退休返回祖家的時候，那些工資便可能等如一筆小財了。但香港的工人卻要在這裏生活和退休，而這裏的通脹永無止境的不斷攀升。

主席先生，政府習慣將積極份子的要求轉嫁給商界承擔。正當我們之中，許多人愈來愈沒有能力去給予更多的時候，我們卻必須勉強答應承擔各式各樣的福利保障。我建議現在是時候讓政府考慮減輕商界人士部分的負擔，實行「共同分擔責任」制。主席先生，真正富裕者不是商人而是政府。財政司預期到了一九九七年，政府庫房的儲備不計土地基金在內，也會累積至 1,500 億左右。到了一九九九年春季，本港的儲備連同土地基金在內更可達至 3,610 億元。

政府實在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釋它為何不可以伸出援手，以抵銷工人所要求的更多福利。直至目前為止，政府都拒絕接納這個建議。強制性私人公積金計劃是其中一個例子；肺塵埃沉着病賠償基金是另一個例子。

商界人士昔日倚賴這個行政主導政府，擔當調停人或仲裁人，但恐怕很快，情況將不再會是如此了。我不會將此形容為「殺掉會生金蛋的鵝」。但如果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只可猜想或恐怕香港大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對於將來的日子，我心存疑慮，在此提出警告。財政司說我們必須富同情心，我絕對同意。同情心是幫助社會上較為不幸的人和真正有需要的人，但不包括向坐房車而且有司機代勞的老婦人發放 2,500 元。我反對我們的同情心被某些政治組織利用，這些政治組織最關心的只是爭取選票，而不是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商界應該受到鼓勵，而不應受到懲罰。一個審慎的財政預算絕不能忽略這一點。

主席先生，政府沒有以稅項寬減的形式去激勵商界。政府聲稱所給予的，包括一幅只供少數人使用的工業專用場地以及透過工業及科技發展局撥出 3 億元，作研究和發展之用。可惜這些撥款現在都已落在專上學院手上。工業及科技發展局的撥款，大部分已撥給科技大學、理工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是無可否定的。不過，這方面的資助是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的。我建議工業及科技發展局的資源應該少些用於學術研究方面，而應該多些直接用於工業研究和發展。

我同時相信應該動用多些資金，就香港轉型成爲一個服務中心進行推廣。隨着香港演進，我們需要更完備的金融設施，例如銀行服務、交通運輸、保險服務等，以及提供這些服務的白領人員。由製造業淘汰出來的工人必須接受更完善的培訓，才能擔任新工作和技術性更高的工作。我們不錯要照顧專業人士的需要，但也不可以忽略其他的工人。

最後，主席先生，財政司在過去四年一直表現出色，值得一再稱許。他固然具有卓越的才能，但他也非常幸運。他幸運之處是因爲他在一九九一年履任的時候，商業信託銀行倒閉危機剛剛結束，自此本港再沒有出現重大的金融災難。他另一個幸運之處，是利森工作的機構是新加坡霸菱，而不是本港霸菱。財政司在本年八月退休，而不是在九月後，當新一屆立法議會上場而可能摒棄他堅信的哲學之時退休，這也是他幸運的地方。

我亦謹祝財政司伉儷退休後身體健康、一帆風順。我深信他倆也會祝我們立法局的工作事事順遂。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主席（譯文）：曹紹偉議員，我在 4 分鐘內便要中斷你的發言。

曹紹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經過 30 年的努力建設，香港人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驕人的成就。在創造財富的歷程中，港人積極投入，充分發揮所長，使本港在國際市場能進佔重要的席位，成功的人士，今日都能分享成果。不過，在繁榮的背後，大家可以愈來愈清晰地看到一個冷酷無情的社會現象——「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有一位大學經濟系教授曾經對我說，他非常熟悉以往三任財政司，他們分別是夏鼎基先生、彭勵治先生和翟克誠先生。這三位前任財政司向這位教授解釋他們的理財哲學，他們不約而同都是緊守一個態度，便是「不須做任何大家認為對的事，只要不犯錯便可以」。這種任由市場自由發揮的施政態度，便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幸運地，這種世界上獨有的理財之道，加上港人勤奮靈活的創業精神，再適逢中國經濟開放的有利環境，各種因素組合起來，竟然成功地在香港開花結果，令我們的經濟欣欣向榮。

我相信成功不是永恆的，如果社會環境改變，政府的理財哲學亦應該作出適當修改，才能與時並進。到九十年代的今天，香港已經由一個發展中的地區達致富裕的地步。九七臨近，本港的政治氣候亦急劇轉變，港府作為開明的獨裁者的殖民地「管治模式」已不被市民接受。自九一年立法局開始引入直選議員後，政府的施政及傳統理財方法確實已起變化。麥高樂先生能順應時勢，在制訂預算案過程中積極諮詢及回應立法局及社會人士的要求，財政司這種改革執政的態度是進步的表現，故此能獲得本局同事的普遍接受。

主席先生，香港在經濟上的成功並未能惠及普羅的市民，不公平的社會現象比比皆是。財政司今次預算案中倡議「共識資本主義」，即是在市場經濟及提供完善的福利安全網之間求取平衡。這個口號聽起來是一個理性而進取的路向，但當細閱預算案內的建議時卻發覺是乏善足陳。

麥高樂爵士及候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曾多次高姿態地介紹他們所謂健全的「理財方程式」，就是嚴限公共開支的增長低於實質經濟增長之下，所以在改善民生及福利的開支並未有突破性的改進。再者，財政司更巧妙地引導市民相信政府在低稅率之下，仍可在未來的兩年內累積盈餘至 1,510 億元，而到一九九九年，預測盈餘的滾存連同土地基金計，總儲備將會高達 3,610 億元，繪畫出一幅美好的圖畫。

財政司引用《荀子》〈富國篇〉中所說的「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為健康的理財之道，使納稅人覺得盈餘是應該儲起不用，使有需要幫助的人士只可望梅止渴。可能麥高樂先生是英國人，對荀子的學說所知有限，也許他不知道荀子亦曾指出「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因此主張滿足人民的要求。既然香港有豐厚盈餘，港府理應正視市民的要求。

財政司表面上是積極回應，但實質是堅守保守路線，面面俱圓，是太極高手。

主席先生，我認為「共識資本主義」應包含下列兩個大方向：

- 一、有策略地發展本港的經濟，以進一步創富；
- 二、透過增加稅收獲得更多經費，以改善民生及提高福利。

晚上八時

主席（譯文）：現在已屆八時，根據會議常規第 8(2)條的規定，本局現應休會。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如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2)條的規定，以便本局可完成今晚的事務。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曹紹偉議員：中國的開放及發展令香港直接受惠，雖然總督在施政報告及財政司在預算案中多次提及其重要性，但到目前為止，港府仍未有一套長遠及全面的發展策略，以協助本港工商業的發展，本人促請政府盡速研究或落實下列工作目標：

1. 制訂中港的發展策略及時間表，尋求中國政府的共識及支持，使香港的發展與珠江三角洲的發展互相配合，達致相輔相承的作用；
2. 立即從新檢討新界西北部的發展規劃及土地的運用；
3. 盡速落實西北鐵路、伶仃洋大橋、深港通道等大型中港基建項目，先強化運輸網絡，經濟發展必會受惠；
4. 制訂高瞻遠矚的經濟政策，增撥經費作研究及積極扶助本港工商業發展，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就業。

港府在達致創富及積存龐大盈餘的情況下，仍可透過擴闊稅基及適當地加稅，作改善民生及提高社會福利，使普羅市民得以共享繁榮成果。港府應下定決心，撥出更多經費，致力完成下列已獲「共識」的工作目標：

1. 致力打擊通貨膨脹，避免市民的消費能力及積蓄被通脹侵蝕，而長年的高通脹率亦不利經濟的健康發展；

2. 促進就業，維護本地工人優先就業，改善及加強再培訓計劃，及嚴限濫用輸入外勞，以保障市民的收入；
3. 撥出更多土地及經費作增建公屋及居屋，進一步遏抑樓價，使市民安居；
4. 盡速建立退休保障制度，放寬及提高老人退休福利及援助；及
5. 逐步放寬及提高綜合援助予有需要的家庭及人士。

主席先生，香港人已經有一個共識，便是祈求「經濟繁榮、全民就業、共同創富、分享成果」，這亦是每一個人的豬年願望。要實現上述共識，我認為不能再單靠過往那一套「積極不干預政策」及傳統保守的理財哲學。政府必須採取更積極進取和敢於突破的態度，制訂一個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

總督於每年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都會引起社會人士的廣泛討論。我期望政府摒棄過往獨裁的管治模式，因應市民的要求，逐步改革，再由財政司將改革目標，演繹成一份積極進取的財政預算案，以使執行。

我期望候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在理財方法上不是只懂「蕭規曹隨」，而是以進取的態度，在保持香港社會繁榮之餘，同時改善市民的民生及福利。

對於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我的評語是了無新意，並未能正視市民的困難，更未能照顧市民的共識，我原先打算投棄權票。但是，既然今次只是一個致謝動議，亦是麥高樂先生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作為送給麥高樂先生一份退休禮物，以及鼓勵候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認真地改革港府的理財之道，滿足市民的期望，實現港人的共識，我決定對動議投贊成票。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相信財政司在今天晚上會很珍惜我和李卓人議員的發言，因為在我們致辭完畢之後，他可能未必會再聽到議員就他的預算案發言。

主席先生，民主黨各議員已先後就預算案收入及各政策範圍支出部分，發表意見。本人現在代表民主黨作總結發言，而內容主要會就財政司所強調的「共識資本主義」理念，提出民主黨的看法。我們認為預算案除了應就具體收支項目作辯論之外，也須在理念層面作出雙向交流。

財政司在預算案演辭中，將過去政府的理財哲學，歸納為 7 項主要原則，當中包括藏富於民、量入為出、有限政府、負擔社會基本責任及維護公平而有秩序的市場等。財政司認為以上原則，經過政制開放的考驗後，社會對此並不存在太大分歧，因此可以稱之為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社會共識。

其實，財政司所作的歸納，是過去港府的管治原則，間中稱為自由放任政策，有時亦稱為積極不干預政策。這一套行之已久的政府公共財政哲學，在西方國家也會找到同道。八十年代西方新保守主義抬頭，如英國戴卓爾夫人主政時代，面對政府財政超支負荷的危機，於是重新提出有限責任政府，將公營部門福利服務私營化，重提個人與家庭責任。當時他們亦認為要依此來重建社會共識，但這些意識形態工程到現在還沒有成功。甚麼是有限政府？甚麼是政府基本責任？到現在仍爭論不休。

因此，當財政司聲稱政府的公共財政哲學已成為共識時，我心裏不期然產生疑問。因為這套管治原則，雖然在香港行之已久，但卻沒有受到政治考驗。主要原因就是政府並非由選舉產生，而議會也只是局部開放。在一個不民主的憲制架構內，行政主宰一切決策，要挑戰這些公共財政原則，根本辦不到。我相信假如「共識資本主義」要受到真正考驗，可能要等待行政與立法機關全面開放，屆時我們才可以下定論。

現在，我們先就「共識資本主義」理念內，較有爭議部分作出討論：

首先，甚麼是有限政府？香港歷史證明，有限政府的界定是一個變動的過程，我們不能以教條主義角度來詮釋。六十年代政府的責任只是濟貧，使來港難民不致露宿街頭餓死。七十年代是麥理浩爵士社會建設的時代，十年建屋計劃開始為市民提供低廉的公共房屋，九年強迫免費教育逐步實施，使適齡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主席先生，七十年代的有限責任與五、六十年代比較已起了質的變化，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出現很大轉變。因此九十年代有限政府的責任是甚麼，相信只有經過政府與市民的對話，掌握社會脈搏，才能互相界定角色與責任。退休保障的辯論，正是有限責任界定失敗的典型例子。綜合社會援助水平、貧窮線如何制定，都是九十年代政府還未與社會達致共識的議題。

從歷史角度而言，香港的成功其實如果倒過來看，是政府社會責任擴展的結果，而不是收縮的結果，更非由壓縮公共開支所達成。

我們無法想像，假如沒有七、八十年代政府社會責任的擴展，今天香港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當經濟發展後，社會福利、教育、房屋、醫療等服務不斷擴展，通過公共支出達成社會資源的更合理分配，通過教育促進社會流動性，為經濟進一步擴展提供人力資源，消解香港社會內部矛盾，香港才有今天的成果。因此，我們必須以一個發展的角度去理解政府責任，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它都有不同的內容。民主黨一直所強調的，就是這種發展概念，我們不會脫離現實、無限量地要求政府擴大公共開支、大派免費午餐。但同樣我們也不會接受用僵化的教條主義態度來理解有限政府的責任。

相信各位還記得，七十年代，我們爭取教育資源，擴展專上教育。九十年代的今天，我們的討論焦點已是教育質素，而不是數量，這正好作為理解政府社會責任不斷發展的一面。概括而言，民主黨認為政府的責任和角色是隨着社會變遷而改變，政府的基本責任和角色是推動經濟發展、改善市民生活、促進社會公平機會、改善市民生活、促進社會公平機會、發展民主政制、維持法治和加強社會團結。

主席先生，香港殖民地政府這外來政權到今日仍然維持一定的支持與信任。我們明白，殖民地政府的認受性基礎是在於它促進經濟發展及擴展社會功能，當中兩者缺一不可。

對於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我們也同樣認為不能完全視為金科玉律，香港過去之所以能維持量入為出，是有一定的環境因素。在不民主體制之下，政府行政權力集中，所以港府的理財原則，可以因循運作下去。但隨着政制開放，公民意識加強，市民對政府的需求愈來愈高，在此情況之下，政府有需要運用靈活的政策，在經濟資源許可下，執行政府責任，以符合市民的需要。

主席先生，總結而言，從香港今日的經濟成就來看，政府公共財政管理成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同時更重要的是政府隨著經濟成長，社會進入不同發展階段，適當地運用公共資源、擴展政府的社會責任、製造競爭機會、促進社會流動、調和社會矛盾，這才是共享繁榮的根本所在。因此，有限政府，並非指政府施政原地踏步，而是要藉着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推動社會發展。

民主黨認為要建立共識資本主義，只有通過民意代表充分參與，將民間聲音充分反映，與政府反復討論，才有真正達成共識的一天。

最後，主席先生，我和民主黨成員曾多次與財政司討論財政預算案。財政司的開放態度，令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財政司麥高樂先生以及我本人都將踏上人生新階段，希望他和我一樣，以平常心和積極樂觀的態度，輕鬆上路。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致辭：

謝謝主席先生，謝謝留下來的議員。主席先生，在細讀財政預算案時，我感到自己回到大躍進時期的中國，因為預算案只是「報喜不報憂」，把香港形容得好像「甚麼問題也沒有」。經濟表現好、中港貿易蓬勃、通脹受控制、儲備及土地基金豐厚、社會開支足夠、稅制健全等等，真是全港一片好景。財政司在字裏行間流露了一派自滿的驕傲。但我希望

在此告知財政司，你筆下的香港並非真正的香港。你只看見上流社會的香港，而全不知民間疾苦：通脹長期高企、貧富差距擴大、工人失業及轉業困難、社會老化但缺乏退休保障、住屋、交通問題的困擾等等，整個財政預算案卻隻字不提，企圖以喜去蓋過憂。

眾多問題中，財政司最不應迴避的是香港的就業前景問題，因為這是涉及所有受薪者賴以生存糊口的問題。可惜，財政司及港府一直不肯面對，躲在全港失業率 2% 背後，作為支持勞工短缺及全民就業的理據。不過，上星期公布的最新失業率 2.5% 為我們亮起就業的紅燈，何況職工盟一直認為統計處的失業統計偏低，未能將被迫不就業而回歸家庭主婦行列的婦女勞工及弱能人士計算在內。因此，真正的失業率必定超過 2.5%。但姑且以 2.5% 失業率去分析，這失業率數字就是過去 7 年的最高數字，反映就業問題的嚴峻。現時已構成就業危機的因由包括：

第一、輸入外勞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直接堵塞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而打擊面是全面性，下至雜工、上至專才都無一倖免。這是因為輸入的外勞人數並不是田北俊議員所說的 25000 名，而是在 25000 名一般勞工之外，還包括九六年將會有的 27000 名機場外勞、1000 名國內專才、1 萬名國企僱員、4 萬名海外專才、無統計數字的在港工作的英國人、再加上 13 萬家庭傭工等。港府經常表明自己的政策是要僱主優先僱用本地工人，但自己卻監察不力，容許部分僱主以諸多留難見工者的手段，將見工者排諸受僱的門外，隨着便可成功輸入外勞。

第二、非法勞工的湧現可能比合法輸入外勞影響更大，因為他們的工作條件肯定更差，而數目更是無從控制及難以估計。

第三、構成就業危機的因由是現在大機構為加強自己的競爭力及控制勞工成本，紛紛開展減磅行動。例如電訊集團的精簡人手計劃，將人數在兩年內減少 2500；中電集團企圖透過凍結工程師薪金，使部分員工自行辭職；駕駛學院近日亦開始裁員行動。相信這將是未來幾年的趨勢，製造一批又一批的失業者。

第四、製造業繼續北移使製造業工人進一步被淘汰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令人更擔憂的是服務性行業工序的北移，而隨着通訊及電腦的發達，這是容易不過的事。因此，職工盟估計未來幾年服務性行業工序將陸續北移，令到服務性行業工人也開始被淘汰。

面對以上 4 個威脅本地工人就業的因素，政府卻一於不聞不問，視若無睹。長此下去，失業、半失業率不斷被推高，勢必影響社會安定，就業危機將成為跨越九七的計時炸彈。我希望財政司能對就業危機問題作出積極回應，而不要採取短視的鴛鴦政策。我重申，要真正令本港出現全民就業，政府必須撤銷輸入外勞政策，並嚴厲執法，杜絕非法勞工，並且盡快制定禁止年齡歧視法例，以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權。就業危機的根源，我認

為是政府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政策。香港過分倚靠服務性行業而放棄製造業，將迫使香港走向產業空洞化的光景。當中國成功發展本身的服務行業後，便是香港產業空洞化的時候。因為屆時香港將失去目前有利的位置，但是我們的製造業並沒有接續發展下去。港府現時若不立即採取積極行動，如其他三小龍一般，開始計劃我們經濟的發展方向，待產業空洞化來臨的時候便已太遲。因此，我希望現任及候任財政司不要掉以輕心，否則，後悔莫及。

財政預算案另一個主要敗筆，是在對通脹問題的曖昧及表現出一副「懶理」的態度。政司預測九五年的通脹仍會停留在 8.5% 這較高的水平，並且以為這個水平令人不安及失望。可是，我看不出財政司今年在對付通脹上有積極進取的措施，他還聲言政府在打擊通脹上已取得相當成果。事實上是否做到呢？當然不是。

首先，造成香港通脹持續高企的禍首之一，就是港府的「三高政策」，即高地價、高樓價及高通脹。雖然港府在去年六月推出第一階段遏抑樓價措施後，住宅物業價格已從高峰回落一成左右，但正如預算案中也指出，今年一月的價格較九三年一月的價格仍高出 37%，與家庭入息中位數比較，明顯較以往幾年更令一般市民難以負擔。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樓價回落只是初見成效，財政司就已經「喊停」，說「政府沒有計劃進一步干預」，「讓市場力量自行發揮」，到底政府是天真到期望市場能夠自行調節，抑或「投鼠忌器」，唯恐繼續貫徹遏抑樓價措施，會引來各大地產商的反對，進而動搖其「高地價政策」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財政司提到利率上升及移民回流增加勞工供應作為遏抑通脹的有力因素，但財政司忘記了，這兩個因素都與政府無關，並不能算入港府打擊通脹的措施，但港府卻對自己作為製造通脹的罪魁隻字不提。今年各樣公共事業紛紛加價，原因不外是利潤不足，政府全部照單全收。所以我不明白為何田北俊議員說政府沒有鼓勵商界，反而是懲罰商界。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政府實在是偏袒商界。這些公共事業利潤增幅全部遠超通脹，但它們仍然年年加價。今年已加價或即將加價的公共事業及政府重要收費共 10 項，例如，九巴的加幅是 7%、地鐵及輕鐵的則估計是 7% 至 9%、中電是 9.6%、港燈 3.6%、的士 11%、水費 7% 至 15%、大老山隧道 68%、差餉 12% 等等。換言之，將通脹壓力轉嫁給「打工仔」及消費者。

政府處理加價申請暴露了官商勾結的面貌，港府只知保護大資本家免被通脹蠶食利潤，卻任由毫無議價能力的「打工仔」承受通脹的惡果。在這種情況下高呼遏抑通脹已取得成果，與掩耳盜鈴無異。

在這項政策下，通脹層層轉嫁，向下侵蝕。地產商轉嫁工商界，工商界轉嫁消費者及其僱員，最後政府的「三高」政策，侵蝕低下層市民的生活質素，並造成勞資雙方遏抑工資及反遏抑的衝突，地產商卻可置身事外而自肥。長此下去，香港的經濟繁榮將毀於這些謀取暴利的地產商手中，使殷實商人及勤奮的「打工仔」受害。

接着，我會談到社會需求的問題。浸會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鄧樹雄博士，曾在評論港府政策目標與準則時表示，政府一直強調理財的金科玉律，政府開支的增長率，不能較經濟增長率為快，然而卻沒有談開支的優先次序問題。他說政府爲了興建新機場的龐大費用，擠掉了其他項目的資源，但政府有沒有因應社會的需要，重新釐訂開支的優先次序呢？當前最迫切莫過於解決香港人口加劇老化及因以往積累多年的財富分配不均而導致今日的老人退休保障問題，但政府竟袖手旁觀，反映港府只曉得「抱殘守缺」，死守有關「金科玉律」不放，卻不肯因應社會需要，而檢討修訂政府開支與經濟增長率掛鈎的問題。

何況，目前有財政儲備 1,510 億元，顯示港府絕對有足夠資源去應付社會需求，財政司卻像「守財奴」般不去動用儲備。「善藏其餘」的佳句實是掩飾財政司「未能善用其餘」的失敗。香港不是沒有資源而是政府過分保守及「孤寒」，未能物盡其用，實踐政府承諾照顧社會有需要人士。

我希望在此援引財政司及社會福利署承諾在九五至九六年度達到的目標，跟社署預測同期的實際需求作比較，看看相差多遠：

- 家務助理服務隊仍然短缺 11 隊；
- 對弱智人士、自閉症兒童極有幫助的臨床心理學家，仍然短缺 14 名；
- 日間幼兒服務仍然短缺 3714 個名額；
- 老人中心仍然短缺 53 間；
- 老人服務中心短缺 8 間；
- 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短缺 8 間；

一系列的數字，我沒有時間讀下去，但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均出現短缺的情況。

同樣，勞工處亦是限制社會開支的犧牲品。工業安全事關人命，但工廠督察一直只有 250 名，負責巡視危險地盤、全港的工廠及酒樓食肆。其中最可恥的是只有 3 名督察負責全港的飲食業。面對一年 200 人死亡的血淚控訴，港府仍「勒實錢袋」，不肯增加資源。請問我們仍須犧牲多少工人呢？關乎工人「飯碗」的工人轉業問題，亦得不到應有的資源，勞工處就業輔導組只增加了 3 個職位，又怎能應付急劇增加的需求？又怎能監察僱主優先聘用本地工人呢？即將成立的職業性失聰基金，政府也只答允撥款 1.15 億元。對於工會要求將追溯期推前至八七年，使更多受害人得以獲得合理賠償，以及把賠償額調增至 100% 而非 60% 這兩項要求，政府始終是「耍手擰頭」。

此外，財政司無視社會不同階層人士一致要求改善老人綜援金的聲音，只說政府會在九月完成有關檢討報告後作出調整，而假惺惺地表示將預留款項作檢討後用。我認爲這不過是採取「拖字訣」。當庫務司答覆議員有關質詢時，已講明預留款項不足，就不能完全依據檢討執行而要再等九六至九七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在我們不知須留多少的情況下，政府的預留承諾就變爲空言。

老人家既得不到合理的綜合援助，政府復出爾反爾放棄老年退休金計劃，令急需援助的老人家希望幻滅。其實，政府藉詞老人金計劃得不到立法局支持，盡現政權狡辯偽善的一面。社會上民意及立法局內主要三大黨派均支持老人金計劃，政府因中方反對而「放軟手腳」，臨尾放棄計劃，使支持老人金計劃的人士均極度憤慨。現在更要脅公眾及立法局，若不選擇強制性私營公積金的話，政府不會再推行任何退休保障計劃。這是一個聲音要履行社會責任的政府的行徑嗎？

我本想同時談及稅制的問題，但由於沒有時間，唯有把時間留給最後的結論。

總的來說，財政司麥高樂先生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是港府既定政策的延續。他提出的共識資本主義公共財政哲學與積極不干預本質上並沒有分別。我認爲他的所謂「共識」只是「官商」的共識，而非「官民」的共識。政府拒絕提高老人綜援金就是最好的例證，亦是對共識資本主義最強而有力的諷刺。

最後，我在此呼籲全港市民不要做「沉默的羔羊」，應對財政預算案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我希望港府在制訂來年的財政預算案時，應全面檢討以下項目：

- (一) 政府開支不得超越經濟增長的金科玉律；
- (二) 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及其動用；
- (三) 從拉近貧富懸殊的角度檢討稅制；
- (四) 經濟及就業前景；及
- (五) 打擊通脹的措施。

我亦呼籲立法局內對老人金問題與我有共同立場的同事，對這份財政預算案投以否決一票，作爲爭取實現老人金計劃的具體行動。這似乎與李家祥議員呼籲的全票通過「唱反調」，但港府仍有時間返回老人金的軌道。這樣，全票通過相信並不困難。

謝謝主席先生。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晚上八時二十九分結束。

